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機會與侷限：在台草根印尼移工組織的發展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Organization in Taiwan

指導老師：夏曉鵬教授

研究生：王慧儀

2015年8月

摘要

隨著香港移工草根運動的萌芽和發展，菲律賓移工組織 APMM 開始有計劃性的在台灣進行組織移工的工作，透過豐富的草根組織經驗，慢慢組織台灣的印尼移工並且成立 ATKI-Taiwan。移工組織企圖以集體的力量爭取權益，並改變社會結構中受壓迫的權力關係。然而，在台灣「外勞」勞動體制下，除了面臨惡劣的勞動環境和勞動條件，制度性的壓迫讓移工組織難以團結，使得移工組織者在進行組織工作時面對各種局限和挑戰。本研究試圖整理並呈現台灣印尼移工草根組織的抗爭行動，發現草根移工組織的政治教育工作決定了組織的發展。作為協助移工草根組織的介入者或組織者必須時時刻刻創造更多的機會，讓移工擁有站出來發聲的機會。

謝辭

感謝亦師亦友的白綺在我寫論文期間提供我兼職工作以及住宿，讓我可以一邊照顧家裡的經濟，和完成論文。佩瑤、前老闆李德偉，扮演大哥角色的楊凱斌，給我無限的支持。也感謝依霖和貝倪，當我再次回到台灣時對我短期的照顧，消減了我許多焦慮。

遠在印尼的 Ganika、Retno，ATKI Jakarta 的朋友 Jen、Iwenk，Ipang、以及參與 2013 年 WTO 而結識的草根組織者朋友，ATKI-HongKong 的 May、Rendy、Sailo、Eni、Sring，認識她們是人生的大收穫。APMM 的 Ramon、Aaron、Rey、Norman、Janet、Butch 和 Bethune House 的夥伴們，感謝他們在我離開前為我舉辦了歡送會

特別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夏曉鵬，給了我運動的理念和組織工作的原則，彷彿走過一趟運動洗禮的路程；而我的偏執總叫她失去耐心，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改不了的壞習慣，也經常讓她失望。論文寫作過程中，總是在逃避寫作，這樣的逃避來自於我對組織工作的不知所措。但是老師仍然堅持要我把承諾扛起來，她給我犀利的批評，成為我完成論文最大的推動力。感謝信行和阿肥老師也給了我無限的鼓勵。

台灣的大馬幫江雪、康偉、光銘、明越、華丹等，以及社發所各位同學，尤其是經常聽我鬼打牆的子輝和麻雀、經常借宿的 566、以及不斷鼓勵的目尼、小馬祖、小眼、小花及時送上關懷的佳玲大師姐，還有善良的陳炯廷和 Haluku。最萬萬沒想到楚君，特意前來為我慶生，還有台灣社運圈關心移工的朋友娟萍、唐曙、英達、家雋、姿華、佩芬等人，還有南洋姐妹會的姐妹們、台權會的逸翔和 Eeling、四方報的朋友。勞權會願意借出辦公室空間，星期日休假時間還被迫到辦公室來開門，陪同一起參與活動，真的是一大感激！也感謝 Alex，感謝他陪伴

走過前面一段路，讓我曾經擁有驕縱的日子。

遠在新加坡的國中好友美蘭，經常透過 Whatapp 不厭其煩的接收我焦慮的情緒。感謝她，論文最後時期的陪伴。特別感謝小卓一邊照顧蓉蓉一邊替我看論文，提供我意見。

感謝大恩人蔡培慧，在人生低潮期總是有她送上深刻的關懷和勉勵，與她過去在上課短短路程中的聊天，成為了我面對人生的鼓勵。感謝阿亮老師曾經的關懷和慰問。

最感謝還是家人，當初大姐容許我一句話：「人生無常，就是要趕快做自己想做的。」讓我可以任性的繼續我對運動的實踐。感謝老爸經常忘記這個多年毫無訊息的女兒，還有在我最苦難的時候收留我的企鵝妹妹。義無反顧幫我買機票的弟弟。家人往往給了我最好的支持。

這本論文生產過程讓我面對了生老病死；家中兩位新成員的出現，照顧大、小寶變成我最大的鼓舞，老爸中風進院，都讓我時時提醒自己一定要完成論文。

非常遺憾的無法讓堂弟阿鐘來得及看到我走到這一步，也無法在他離開人世間前及時給予更多的照顧讓他放開心胸，減少對這個世界的恨。每天想起他時，總是遺憾沒來得及告訴他這個世界仍然充滿著無限可能和希望，祈禱他能夠在另一個世界得到解放。

阿鐘，安息。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6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6
1-1-1 對組織群眾的嚮往和疑問.....	6
1-1-2 「她們怎麼可能做的來」.....	7
1-1-3 不自由的行動者.....	9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2
1-2-1 移工制度的壓迫.....	12
1-2-2 移工抵抗的能動性.....	14
1-2-3 移工運動主體的形成.....	15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8
1-3-1 實踐式研究.....	18
1-3-2 深度訪談.....	20
1-3-3 文本分析.....	22
1-3-4 研究局限.....	22
第二章 台灣印尼移工社群組織.....	24
第一節 印尼政治的發展與變化.....	24
第二節 印尼移工社群的多元面貌.....	26
2-2-1 移工自主團體的出現.....	26
2-2-2 移工社群內部拉扯的力量.....	29
第三節 跨國移工運動的形成.....	30
2-3-1 ATKI-HongKong 印尼移工運動的崛起.....	30
2-3-2 ATKI-Taiwan 的成立.....	33
第三章 草根組織的發展與行動.....	37
第一節 移工的覺醒.....	37
第二節 組織的發展.....	39

3-2-1	ATKI-Taiwan 組織的形態	39
3-2-2	實驗會員大會.....	41
3-2-3	被壓迫者的批判教育.....	44
3-2-4	勞教課程	46
	第三節 弱勢發聲.....	49
3-3-1	處理勞資爭議.....	49
3-3-2	組織文告	53
3-3-3	網路媒體	60
3-3-4	「對話」作為抗爭.....	61
	第四節 集體行動.....	64
4-1-1	文化抗議行動.....	64
4-1-2	第一次自主發起的集會	66
	第四章 自主移工組織結盟的契機與困難.....	70
	第一節 不同國籍移工組織的合作	70
	第二節 印尼移工團體結盟的契機.....	72
	第三節 官方勢力的「收編」	77
	第五章 總結.....	80
	第一節 移工組織的啟發	80
	第二節 反省與成長	81
5-2-1	身份的局限	81
5-2-2	組織經驗的參照.....	83
5-2-3	轉譯者的角色.....	84
5-2-4	移工團體之間的張力.....	85
	參考文獻.....	86
	附錄.....	8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1-1 對組織群眾的嚮往和疑問

筆者曾經參與馬來西亞¹的學生運動組織——《馬來西亞青年與學生民主運動，簡稱學運》，該組織主要以改變以種族政治劃分的國家體制，反對貪污、腐敗的政權的激進組織。學生組織主張關注弱勢群體，進行草根組織工作，組織群眾力量。為了壯大多元族群政治的力量，以往社運領袖都選擇進入政黨進行議會鬥爭。過去許多參與社區組織工作，主張草根組織的學運夥伴也紛紛投入，選擇了政治改革路線。

2008年大馬的選舉，已經進行六年抗爭的「白小運動」²面臨組織上的停滯，必須接受「已經快撐不下去了」的現實，讓白小村民不得不選擇用政治談判來解決白小學校關閉的問題。另外，正在組織社群居民反對建立高壓電纜的抗爭運動，社區組織者最後選擇以競選的方式，以當選當權後的政權勢力來阻擋設立高壓電纜的計劃。筆者對此心中不斷存疑，難道真的無法依靠群眾的力量改變社會，組織群眾後仍然無法讓抗爭成功而必須仰賴政治權力？

2009年，筆者來到世新社發所，試圖想從社發所創所人成露茜所擬的十六字箴言：「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找到答案。在社發所，透過夏曉鵬老師認識菲律賓人民草根運動的力量。在實習課中也到香港移工組織

¹ 筆者出生於馬來西亞，並且長期關心政治。

² 白小為一間被馬來西亞教育部關閉的華文小學，村民站出來極力反對形成運動。

實習，見識到菲律賓和印尼移工由下而上的群眾力量，形成跨國的移工運動。在 ATKI-HongKong³的實習，看見她們以非常有系統性、有步驟的組織模式進行群眾教育工作，舉辦各種活動、培訓課程、議題宣導及倡議、街頭演說，訓練更多的印尼家務工成為能夠承受獨立自主的組織者。這些印尼家務工組織者或幹部都表示她們在未參與組織前曾遭受雇主和仲介的壓榨、沒有休假、苛扣薪資等，最後選擇逃出雇主家尋求庇護，而住在庇護中心時接觸了移工組織，逐漸的瞭解自身的權益以及移工的議題，也加入與參與組織工作。ATKI-HongKong會長Ganika⁴認為：「我們（組織）不只是幫助她們，也教育她們，而她們找到好的雇主後，會回來（組織）協助其他的移工。」

這樣的情景，使筆者對組織群眾產生了嚮往，也開始思考實現的可能性。究竟要如何才能對移工進行教育，提高他們的政治醒覺？回到台灣後，筆者更想試試看印尼移工組織 ATKI-Taiwan 是否也有可能形成集體的力量，進行抵抗，改變台灣的勞動體制？海外移工組織在其中又扮演什麼角色？香港移工運動的組織方法和經驗是否能夠用在 ATKI-Taiwan 上面，是否就會讓移工形成運動的主體？

1-1-2 「她們怎麼可能做的來」

2011年3月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夏曉鶻教授進行「亞太婦女、法律和發展論壇」(Asia Pacific Forum On Women, Law and Development, APWLD⁵)的計劃，以焦點團體的方式，訪問在台外籍勞工的處境。筆者在夏曉鶻老師的引薦認識 ATKI Taiwan⁶和APMM（亞太移駐工作團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的執行

³ 香港印尼籍外傭組織。

⁴ Ganika 在 2012-2014 擔任協會主席，契約滿期後回到母國。

⁵ 亞太區域女性組織的跨國網絡，以研究、培力、倡議等方式推展亞洲女性運動。

⁶ ATKI 是印尼文縮寫，其全名為，*Asosiasi Tenaga Kerja Indonesia di Taiwan*。英文全名為，*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中文譯名是在台印尼移工協會，簡稱印工協。2012年在印尼移工團體舉辦的移工研討會，ATKI HongKong 把組織改名為 *Asos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以突顯海外移工的主體，而並非沿用主流社會所俗稱的「勞動力」，組織簡稱則繼續

長Ramon Bultron。同時，筆者也協助APMM執行人口販運防治法在台灣落實績效的調查，訪問台灣外籍勞工的處境以及發掘被人口販運的案例。因此，筆者漸漸涉入和關注移工的議題。為了執行訪問移工的工作，筆者也經常出席ATKI-Taiwan每個月的聚會活動。

筆者在第一次的聚會中，ATKI-Taiwan 的幹部和一群移工在台北 228 公園聚會，他們互相分享在台灣工作的處境以及面對的問題。ATKI-Taiwan 的組織幹部教育移工應有的權利，並且鼓勵他們多參與組織。在參與的過程中，發現 ATKI-Taiwan 的組織幹部、活躍成員多半從事家事服務勞動的工作，而她們多數處於無法休假，或一個月只有一次休假機會的狀態，卻能利用僅有的時間組織其他的移工。

在人口販運防治計劃下建立的非政府組織網絡平台，會定期開會分享各團體處理個案的經驗，討論處理個案的手法、提供的服務或保護當事人的方法等等，試略從中找出台灣政府對人口販運防治法的機制所導致的問題。討論過程中，筆者發現台灣團體協助的外籍勞工被化為一堆的數據和經驗分享的個案，他們身上充滿「受害者」、「被協助」、「被救援」、「無法求助」的標籤，不但是失語，更是需要被代言的一群弱勢者。筆者在接觸個案的過程中確實看到不少外籍勞工被勞動體制壓得動彈不得、難以求助的事實。縱然如此，筆者也觀察到這些受壓迫者的勞動者本身具有訴說的能力，甚至擁有解決問題的動能性，掌握各種利益分析的盤算來應對所面對的種種問題。以 ATKI-Taiwan 為例，儘管移工的休假有限，但一些能動性較強的幹部選擇參與組織，嘗試協助其他移工。當筆者在平台會議分享 ATKI-Taiwan 進行協助個案和組織移工時，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卻回應：「那麼高層次的事情，她們怎麼可能做的來！」這位工作夥伴把組織工作視為是高層次的工作，也質疑底層移工參與組織工作的能力。

這樣的回應讓筆者又勾勒出對組織群眾的疑問。是否台灣的勞動體制把移工

沿用 ATKI 的縮寫。新名稱的翻譯也比較符合英文名稱 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 in HongKong。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ATKI HongKong 的更改組織名稱充滿政治性、進步性，重新定位移工在社會的位置。

壓制得動彈不得，造成移工的抗爭必須由非政府組織代言？移工自主團體是否真的很難組織起來進行抗爭？

從這個過程中，筆者看到了移工的能動性與非政府組織視外籍勞工組織無能的落差現象，也認識到台灣民間團體對移工自主團體的忽略與輕視。另一方面，筆者也疑惑，究竟 ATKI-Taiwan 一個月一次的聚會，進行教育和組織工作的模式，是否能夠形成組織抗爭的可能？

1-1-3、不自由的行動者

在台灣的外籍家務工無任何勞動法規的保障，不但受到移工政策的壓制，成了國家為填補社福政策的缺口而引進的廉價勞工，工時長，甚至24小時待工，無法獲得法規保障的休假。長時間被監控、限制行動、扣押證件及薪資等，他們獨自面對惡劣的勞動處境，加上家務工多為女性，在封閉的家庭容易受性騷擾及性侵害等（藍佩嘉, 2008）。以往的學術研究所呈現的印尼籍女性勞工，除了面對外傭政策的壓迫外，在仲介市場的種族化論述的操作下被刻劃為乖巧、聽話、高度配合、鮮少爭取權益的一群，合理化其對移工的高壓管理和監控(藍佩嘉, 2008)。印尼家務工的「順從」和「不會反抗」被認為可以放棄休假或被使喚進行額外的居家工作，勞動處境較為劣勢（藍佩嘉，2004；Loveband，2004）。私人家庭作為勞動場域，不同於工廠勞動者的勞動力，使得外籍家務工具有不可見性(invisibility)的特性，處在被隔離的工作場域，能夠參與雇主家之外範圍的活動機會是非常有限（Rahman, 2005）。外籍家務工面對勞動制度的壓制，工作領域的私密與封閉的特殊性，讓她們難有集體集結（龔尤倩，2002），更被視為「無法被組織」（unorganizeable）的一群（Ford, 2004）。

一些學者認為周休是外籍家務工必須與管理權力進行鬥爭的一個重要場域。對於移工來說，休假只是能夠讓移工脫離雇主的控制，也能夠讓移工透過外出獲

得社群網絡，在面對問題時不至於陷入孤立的狀態，另一方面在休假時進行休閒活動，也能夠讓移工得到喘氣、放鬆的機會（吳挺峰，2002；陳秀蓮，2010；藍佩嘉，2008）。然而，由於台灣外籍家務工不被納入台灣勞基法的保障，也沒有每週休假的權利。上述移工研究多數指出勞動體制對移工的壓制導致移工難以形成集體抵抗。筆者也不斷思考移工面對社會客觀環境的結構，移工的抗爭是否只能等待勞動體制經過修法的改變之後，才有可能開啟了移工組織的發展的一天？

筆者與ATKI-Taiwan的相處發現，即使外籍家務工不像產業移工能夠用激烈的手段來進行抗爭，但他們仍能在不自由的勞動體制捆綁中，進行日常生活的爭奪戰，爭奪時間與空間，創造參與組織的機會。

「Heng⁷，我有朋友在南投經常被帶到去不同地方打工，她已經打了1955，她非常的勇敢，她要抗爭下去，直到換雇主為止。現在她要怎麼做？怎麼辦？我已經安撫她很久了，她還是很害怕，現在人在仲介哪裡，很害怕手機會被搶走。」

Inayah 非常樂心於投入服務個案的工作，經常一邊工作一邊用手機廣結朋友擴大社交圈，電話的另一端是一名剛認識的同鄉，Inayah 不斷的說服朋友要加入組織，鼓勵移工朋友勇敢站出來爭取權益。筆者每次與她通話討論個案時，都會聽到她幫阿公翻背、餵藥、按摩的聲音。此時的她不能固定休假，也無法自由外出參與組織。

Sherry 亦無固定休假，因籌備次週的活動偷溜出來與我們開會而被雇主責罵與刁難。回家後她溜到樓梯間，用哽咽的聲音對我們訴苦著，話說完就立刻收起哽咽的聲音繼續與我們開會。組織會議時，Devi 參與到一半突然不能發出聲音，想發言時就偷偷走到廚房或雇主不注意的地方，悄悄說幾句話，然後又默默的進行家事勞務的工作。

⁷移工朋友多數稱呼筆者 Heng。

Atin 為了參與組織培訓活動，卻又無法把阿嬤放置在家裡一個人外出，最後只好把看顧的阿嬤帶到活動現場。由於路途遙遠，帶著行動不便的阿嬤從家裡出門。活動進行中，Atin 非常焦慮阿嬤的狀況，無法完全放心參與活動。結束後，Atin 拖著疲憊的身體帶著阿嬤顛簸的回家。

以上這些圖像都深深烙在我心中。外籍家務工要出門不是簡單的事情，需要承擔各種風險，但是被捆綁的勞動條件並未奪走她們參與組織的機會。她們使用各種策略和方法讓自己有機會與外界接觸，並在雇主家中擠出時間和空間來參與組織工作。筆者在接觸 ATKI-Taiwan 的過程中，組織者 Atin 不斷強調：「沒有休假是個問題，但是參與組織是個人的主動性 (initiative)。」筆者驚嘆這些外籍家務工對組織參與的耐力，也開始思考為何移工會如此堅持於組織工作？他們的信念又如何形成的？ ATKI-Taiwan 又如何進行教育工作讓受壓迫的移工有更多醒覺進而參與組織工作？

另一方面，從台灣的移工勞動體制來看，ATKI-Taiwan 仍然面對客觀條件，身處在不自由的勞動體制捆綁中，以及多重壓迫。ATKI-Taiwan 的經驗也真實的告訴我們：外籍勞工並不是沒有抵抗的能動性，而是在擁有反抗意識的情況下，如何產生更多的行動。即使外籍勞工無法像一般人或全職組織者那樣自由的行動、進行組織和教育群眾的工作，移工作為行動者，仍能形成集體的方式試圖對抗社會結構的捆綁並要求變革。

從這篇論文中，筆者試圖回顧 ATKI-Taiwan 的發展，重看以往我們走過的歷程，分析移工在什麼條件和什麼情境之下促成什麼樣的行動，又有有那些是沒辦法達成的。筆者認為，唯有檢視眼前台灣移工草根運動的重重關卡，在具體的組織工作上移工自主團體如何克服問題，找到台灣移工草根組織值得參考的經驗。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2-1 移工制度的壓迫

台灣在剛開放外籍勞工時引進的多數為來自菲律賓的移工，到了 2001 年印尼外籍勞工超越菲律賓的外籍勞工人數，印尼外籍勞工人數逐年增加，至 2014 年已將近 18 萬，佔移工人口的最多數（勞動部, 2014）。

由於國家的高度管制，移工的引進、限制配額、以及繁瑣的申請程式，使得移工與雇主必須依賴仲介，增加仲介在過程中的獲利。除了接收國的客工制度之外，母國進行勞動力輸出政策(labor export policy)，系統化的把龐大勞動力輸出到特定國家的勞動市場。菲律賓政府便以「勞力出口計劃」解決國家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以系統化、制度化的方式進行勞動力輸出，以國家作為招募及發放合法證件的單位——POEA(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從中以收取課稅及各種申請費用，並強制要求移工將部分薪資所得匯回菲律賓，成為國家收入來源 (Bultron, 2008)。

1980年代中期印尼政府開始效法菲律賓開始實行勞動力輸出政策，對海外勞工採取高度干預的手法，制定相關法規頒發許可證給私人仲介公司，進行相關招聘、訓練及管理相關業務，輸出勞動力以確保國家外匯及其他收入來源 (Ford, 2006)。1980年蘇哈托 (Suharto) 政府開始正式管理勞動力的國際遷移，將至海外的勞動力整合至五年發展計劃，鼓勵印尼人民至海外工作，減少國家的財政赤字 (Hugo, 1995)。1997年印尼政府受到金融危機及國內政局動盪的影響，導致經濟受創，失業問題嚴重，使印尼政府積極進行勞力輸出，以作為緩和國內失業壓力的方式，並且為國家賺取客觀的外匯財源 (Catharina, 2008；引自劉淑菁, 2012)。國家部門之間在移工政策制度上，競逐獲取利益，透過制度設計規定的各種費用由移工來支付 (王宏仁、白朗潔, 2007)。一方面，印尼政府制定了海外就業政策以及相關部門單位執行審核的機制，同時管理職業訓練中心以及仲介公司的招攬、媒合的工作，同時制定海外勞工的相關法規。另一方面，國家扮演管理仲介的角

色，主宰仲介公司的執照以及制定條規約束。印尼法規第39條/2004⁸，強制性海外勞工必須經過仲介公司取得到海外工作的機會，不得自由選擇工作地點、對象或工作類型⁹，即使已經有海外雇主願意聘僱者都必須經過仲介公司代理才被視為合法。國家在法律上賦予仲介公司強大的支配權¹⁰，進行勞動力的買賣，對外籍勞工進行決定及分配外籍勞工的工作條件。這種單一招聘管道¹¹，導致移工必須支付高額仲介費、服務費及政府設定的其他規費、處理檔等，以及各種隱藏性費用。外籍勞工必須支付高額、高成本的仲介費方可出境工作，面臨層層剝削。根據移工的經驗，母國仲介公司會提供一個選單，福利條件越好、加班越多的工作，仲介費相對比較高。

台灣對引進外籍移工採取是短補充人力的客工制度，如；配額管制、工作證及保證金等的，控制移工的數量和分佈(藍佩嘉, 2008)。在高度管制人口流入的制度下，以及繁瑣的申請程式，必須經過重重關卡的聘僱制度，使得移工與雇主必須依賴仲介，增加仲介在過程中獲利。相較其他亞洲國家，台灣的移工政策相對嚴苛，盤問歇性非永久性的勞動體制：限制工作年限、限制工作領域、不得自由轉換雇主、限制流動(曾熾芬, 2004)，這些限制使得外籍勞工缺乏議價的自由，進一步強化雇主、仲介對移工的宰制，使移工被束縛在固定的勞動關係中(藍佩嘉, 2008)。

美其名保障移工的機制卻設立了重重關卡和制度束縛，嚴重控制自由流動。國家對外籍勞工的輸出與輸入都進行大量的介入和操作，以系統化及龐大人口數被輸出入到特定國家的勞動市場。雙邊國家機制和利益團體的運作過程，促使移工處在夾縫中(王宏仁、白朗潔, 2007)。

8全名為：Undang-undangan Penempatan Perlindungan Tenaga Kerja Luar Negeri，英文：Law of 39/2004，第 24 項；政府規定每位海外勞工必須透過職業訓練中心（也被稱為仲介公司）。

⁹多數由仲介公司或職業訓練中心安排，到香港的女性多數從事幫傭、照顧小孩的工作，而到台灣的多數被安排照護的工作。到台灣工作的印尼男性則從事工廠工必須支付較高的仲介費，否則只能選擇較高風險卻仲介費用較低的工作，如：船員。

¹⁰在我接觸到的個案當中有些表示他們來到台灣後深深覺得被欺騙，工作環境、工作內容、以及薪資等等與仲介公司所提供的資訊不符。

¹¹ 印尼語稱為：Satu jalur pintu，單一管道。

1-2-2 移工抵抗的能動性

「工人之做為主體，在與生產與管制的機器抗爭時，這個抗爭的主體既是肉體也是靈魂，既是一種記憶也是一種投身」。(Touraine, 1996: 329; 引自丘延亮, 2002: 18)

一些針對亞洲婦女移民/工研究指出，她們並非完全被壓迫；跨界流動的過程中也展現她們的主體性 (Piper and Roces, 2003; 夏曉鶯, 2008)。台灣也有一些貼近移工，以他們作為主體，研究移工的能動性和抵抗行動，探討移工作為被壓迫的群體，為何選擇站出來進行抵抗以及選擇抵抗的策略或方法。

李易昆 (1995) 作為一名社工並且在前線工作上協助移工，從個案分析出移工在面對被壓迫的環境中選擇不抵抗抉擇的因素；移工在面對雇主的剝削與不合理的勞動體制，擁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加上而採取不抵抗的行動。李易昆 (1995) 認為移工面對勞動體制缺乏法規的保障、仲介費…等等，都是移工面對惡劣環境時選擇噤聲的最大因素。李易昆的研究過於強調勞動體制的壓制，難免落入移工一旦進入勞動法體制就幾乎動彈不得，以及只要改變勞動法規就能夠改善移工處境的思維，局限了我們對移工抵抗的想像。

另外，一些研究指出，休假是移工形成抗爭的重要條件之一。吳挺鋒 (2002) 從文化角度探討移工的宗教信仰成為抵抗資源的可能性。他認為不同國籍的宗教信仰對於形成抗爭呈現不同的模式。菲律賓籍移工多信仰天主教，週末到教會禱告有助於移工建立社會網絡的社會空間，形成集體互助的社群。如同陳秀蓮 (2011) 指出，移工爭取休假權所爭的不只是休假，而是爭取一個參與社會的空間，讓個別勞工能從私領域解放出來進入組織行動。休假，是移工獲得建立自我的重要時間和空間，也是作為抵抗捆綁和掙脫雇主控制的鬥爭。移工在休假時，脫離雇主的控制，讓移工能夠有機會建立社群網絡。

劉淑菁 (2011) 則研究台灣印尼家務工對宗教的踐行所採取的策略以抵抗台灣環境對文化與宗教的不友善，鬆綁雇主對其宗教踐行的控制。該研究呈現出，

沒有休假的外籍家務工之間相互交換訊息、提供資源與協助，形成互助團體，或社群網絡，集體的力量讓她們能夠抵抗雇主的控制，繼續她們對宗教的踐行。移工的聚落除了在休假時得以形成之外，科技的方便性也讓移工能否夠在虛擬線上形成群體，並且進行活動。許家雋（2014）針對印尼移工組織的研究指出回教穆斯林團體蓬勃的發展，能夠聚集許多移工參與。由於移工散佈各地無法進行實體聚會，透過電話或網路形成虛擬社群，規模可達數百名移工。這些宗教團體擁有很強的動員能力，不但能夠舉辦大型佈道活動或經常籌募款項協助印尼家鄉的建設，雖然組織成員多數在線上但是卻也展現強大的組織性。印尼移工的組織能力展現在他們能夠透過電話門號以一人帶五人通話，再與另外一人帶五人的小組連線，這種連線方式可以達到數百人。台灣的印尼穆斯林移工所形成的集體抵抗，有別於菲律賓移工於週末在天主教堂聚會。印尼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進行閱讀可蘭經的活動，形成虛擬的聚落，持續著他們在印尼的宗教信仰，形成一個我們「看不見」的集體力量。印尼穆斯林的文化踐行，抵抗台灣社會對穆斯林文化與宗教的不友善，雇主甚至在生活管理上進行種種的限制。他們在面對惡劣的環境，或文化上衝突，移工都能夠採取行動策略去應對，其能動性展現出他們對體制的不屈從，並且發展出另一套抵抗的力量。從此我們可以發現，移工形成群體的模式並不只是局限在休假時的聚落所形成的週日社群，手機或網路的聯繫可讓移工不至於完全處在孤立無援的狀況。

筆者對於移工社群的觀察發現，台灣有不少移工自主團體，經常聚集，但是形成群體並不一定有抗爭的意識去改變社會結構的壓迫。劉淑菁（2011）也指出，移工建立社群網絡雖然有足夠的能力去反擊雇主、仲介的干預，去抵抗其環境對文化與宗教的不友善，鬆綁雇主的控制，但是卻缺乏足夠的集體力量去撼動政策結構的影響。

1-2-3 移工運動主體的形成

從個人的主體意識到社會運動或集體抗爭的形成過程，亞蘭杜漢提出「主體」概念是個人（或集體）成為行動者的建構過程，這種形成的過程又被稱為主體化；

挑戰既有社會秩序的社會行動和精神運動；它同時是社會性的（因為它討伐壓迫性的社會關係），它也是文化性的（因為擴展自由的價值和尊重個人存在）。」

（Touraine，2002；引自丘延亮，2002: 40）。簡言之，亞蘭杜漢「個人主體」轉化為「歷史主體」主要概念是，個人作為行動者能夠意識到自身受壓迫的處境，從自身對社會結構的抵抗，轉化為集體的抗爭，反轉社會對群體的壓制，爭取社會根本性的改變。「個人的主體」(personal subject)轉化成為「歷史的主體」(historical subject)。「就是一個社會性運動由反抗權力的抗爭進向為更合理的社會發生的過程」(引自丘延亮，2002：29)。Hsia（2009）提出縱然亞蘭杜漢強調「轉化」的形成對社會運動的重要性，但是他並沒有針對個人如何變成行動者作出進一步的解釋。

Hsia（2009）研究跨國移工運動的形成過程，香港移民/移工組織從一開始合作舉辦文化活動交流活動，慢慢的把合作方式提升到針對香港政府制定對移工不公平的政策舉辦遊行抗議行動，集結各國籍的移工共同爭取權益，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跨國移工運動，並且串聯成立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AMCB）。她指出社會運動的上升必須經過「社群主體」的轉化過程。香港移工草根運動從各國籍的移工組織的成立，逐漸發展成不同國籍的移工組織成立聯盟，進行跨族群的集體抗爭，以改善移工處境的集體抗爭。過程中，香港各國籍、族群的移工群體，看到了群眾工作的重要性，也學習菲律賓草根組織模式（grassroots organizing）投入組織群眾的工作，由下而上組織群眾，形成跨國移工運動的力量（Hsia，2009）。

從香港跨國草根移工運動的經驗，我們可以看見移工草根組織必須經歷一連串轉化的過程，逐漸型塑出移工集體的力量。夏曉鵬（2006）以長期蹲點培力與組織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和南洋台灣姐妹會，讓新移民形成具體行動，邁向

主體化的過程中，先透過「社群主體」的形成，再邁進歷史主體。夏曉鶯的研究對弱勢群體培養醒覺意識形成行動者，從個人主體轉化成為歷史主體提供具體的方法。「個人主體」轉化成「社群主體」，再轉化成「歷史主體」的過程，在組織方法上必須需先從滿足群眾的「實用性需求」，再轉化到「策略性需求」的「歷史主體」。

群眾的主體意識從來不是登高一呼就能得到群眾起來抵抗社會的壓迫，而是需要一段長遠的教育工作。組織者對於組織群眾的意識，通常是看到社會不公平的事情，例如貧窮問題、勞工問題等，透過組織提供的教育，瞭解得更清楚，也就是說，如果光是看到社會不公平而缺乏背景知識與組織過程，群眾不見得能夠自然而然成為一個組織者（吳佳臻，2008：75）。同樣的，移工作為組織者的培養需要經過一段長期的教育、組織的過程，吸取不同的抗爭經驗和知識背景才能成為一個能夠領導組織的組織者，即是擁有主體的行動者。吳佳臻（2008）提出台灣移工集體抵抗形成的可能，分析在台灣的菲律賓移工組織如何克服客觀環境的限制進行集體抵抗。她指出，移工的政治意識並非完全空白，有些扮演組織者的身份，組織移工。菲律賓自主團體的領袖大部分都有組織經驗，甚至參與過菲律賓人民抗爭運動，而這些經驗以及菲律賓經常成立組織的傳統，形成移工在台灣進行組織面對諸多困難但是仍然有許多菲律賓自主團體活躍的現象。這些擁有豐富抗爭經驗的菲律賓移工組織者透過豐富的人民抗爭組織經驗，把過去組織群眾的方式組織其他的移工，克服社會結構對組織的壓制，發展跨國移工運動（吳佳臻，2008）。

移工的集體力量並非只限於休假時所建立出來的社會網絡，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他們現在也能夠在網路或手機互相交換訊息，建立社群，這樣的情勢有助於移工組織工作的發展，可進而形成集體抵抗的力量。此外，主體化的轉化過程

是不斷變動的動態，主體意識的變化是組織非常重要的工作，外籍勞工在各種行動過程中經歷各種的轉化，組織工作的層次也隨之不斷的上升。透過一套有步驟的組織方法，移工自主團體面對社會體制的捆綁也能夠形成主體性社會運動。接下來本文將會進一步討論ATKI Taiwan的形成過程，以及在捆綁得勞動處境如何進行組織工作。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3-1、實踐式研究

筆者從2011年透過夏曉鵬老師的引介而參與APMM在台灣進行人口販運防制法的調查計劃，開始認識ATKI-Taiwan，也開始斷斷續續參與ATKI-Taiwan的活動。筆者為了能夠進一步認識ATKI-Taiwan成立的背景以及認識草根移工運動，於2012年9月至12月，到香港實習。筆者有幸透過APMM菲律賓組織者Ramon的引薦，直接到ATKI-HongKong實習，並且住在Bethune House移工庇護中心，與菲律賓、印尼移工組織者一起工作和生活，平日就協助ATKI-HongKong處理在Bethune House庇護中心的個案，週日就參與ATKI-HongKong的活動和培訓。透過接觸ATKI-HongKong，可以瞭解到組織理念、組織的起源與背景。

2011年，筆者剛參與ATKI-Taiwan時，只是每個月協助她們尋找活動場地以及參與活動，在不斷互動的過程中，逐漸認識ATKI Taiwan 的幹部和會員們，也慢慢的去摸索移工組織的需求。2012年筆者在香港實習看到ATKI-HongKong群眾組織的成功，回到台灣後，讓筆者更加積極投入ATKI-Taiwan的組織工作。

由於筆者在台灣結識ATKI-Taiwan的幹部，加上APMM的引薦，可以很快地

能夠進入ATKI-HongKong實習，有機會參與他們與其他組織的內部會議、組織培訓、會員大會以及各種活動。另外，筆者在實習之後回到台灣，也能夠快速的獲得ATKI-Taiwan的信任，參與組織內部的大小事務。

作為一名介入者，初期對組織的參與只是抱著來「協助」的心態，但是參與一段時間過後，發現ATKI-Taiwan仍然是個鬆散的組織，成員經常流動，難以動員，面對各種困難的狀態。但是，個人對草根組織還是懷抱一定的想像，非常期待移工自主團體能夠形成群眾力量，進行抗爭，依靠集體的力量改變體制。從馬克思觀點來看，當受壓迫者面對當權者或者壓迫者的壓制，受壓迫者唯有透過集體的力量來抵抗，組織更多的群眾，改變社會結構，受壓迫者才能夠得到解放。個人認為，外籍勞工的社群集結以及組織對於改變他們自身的處境是非常在重要的。

因此，個人開始思考移工組織如何能夠長出集體的力量？如何讓移工能夠有更多的政治意識醒覺，如何學習組織的能力和技巧等等。亞蘭·杜漢（2002）高度肯定研究者介入研究場域：「唯有透過研究認識，行動者才能由社會實體的某一層次提升到另一層次，由反應和適應式行為發展成構思計劃與衝突行為。只有在研究者親自主動介入，使行動者覺察到其所置身的最根本關係，行動者才可不再只靠對既定秩序的回應來定位自身。」（杜漢，2002：245）

筆者在組織扮演介入者的角色，不時能夠主動安排或參與活動，掌握組織運作和行動形成的過程。筆者來自馬來西亞，通曉一些馬來語，雖與印尼語有差異但是還是能夠進行一般的對話。ATKI-Taiwan的一些幹部，例如Atin和Lukman(都曾經擔任組織的會長)，曾經到馬來西亞工作一段時間，能夠用馬來語與筆者對話，因此筆者和兩人能夠較為順暢地溝通。我們經常一起處理組織的文告或書函等等，甚至進行陪同個案出席勞資協調會議等等。

筆者從2012年開始協助組織安排與策劃活動、個案服務、開會、翻譯、與外界聯繫、媒體宣傳等對外界協調的工作。個人也參與例月活動的規劃與討論，在社群群組裡，包括臉書的群組聊天室、核心成員的秘密社團、以及社團群組、手機即時通訊軟體、手機連線，觀察他們的討論以及日常生活的互動，對於組織與活動的意見、或者共同討論如何協助個案，對於議題、政策法令的想法。另外，組織大大小小的活動筆者也都會到場，包括：勞教、節慶聚會、戲劇課程、組織培訓、與印尼辦事處的對話會、國際移工日、出遊活動、募款活動、練習唱歌、籌募簽名聯署、電影分享會、記者會等等。ATKI-Taiwan的活動範圍分別在臺北（臺北車站、228公園、印尼經濟文化辦事處、或移工雇主家）、台中（台中車站、台中廣場及公園），以及宜蘭的南方澳碼頭等等。

由於地理位置相近的原因，筆者可以經常到位於台北的移工家裡串門子，吃飯、聊天、討論組織的工作，甚至有時候還在那裡過夜。筆者除了是女性的身份之外，這些移工與雇主已經建立一定的信任關係，都能夠容許她們在家中接待朋友。

1-3-2 深度訪談

這個研究的目的期待能夠達到組織提升權能和轉變，ATKI-Taiwan 從 2009 年成立至今將近 5 年，而筆者是從 2011 年才開始參與，直到 2014 年因個人因素離開台灣。雖然，筆者參與 ATKI-Taiwan 只有短短 2 年多的時間，但是也參與了這期間組織的所有活動和組織工作，並且觀察組織的發展過程。縱使筆者長時間與她們相處，但是有些資訊人需要透過深入訪談的方式，以瞭解移工們在台灣參與組織工作的經歷，以及組織成立的經過。本研究亦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對移工為何參與組織的因素進行探索，面對個體化的工作環境及限制自由的勞動體制，如何執行組織工作，以及他們個人的被培力的過程與轉變，如何學習組織經驗，

以及對移工運動或組織抗爭路線產生認同的過程。

筆者對 ATKI-Taiwan 的幹部和會員進行訪談，訪談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人參與組織的經驗

- 在印尼或者其他國家是否有參與過組織或團體？
- 加入 ATKI-Taiwan 的過程
- 參與組織的狀態
- 如何協助組織工作
- 會想參與其他組織嗎？理由為何？

二、組織層面：個人參與組織後的轉變

- 加入 ATKI-Taiwan 後生活有什麼不一樣？
- 對你個人來說，加入 ATKI-Taiwan 之後有什麼轉變？或有什麼學習？
- 有哪些行動或活動對你來說印象深刻？
- 你認為移工組織在台灣面對什麼困難？

另外，亦訪談成立 ATKI-Taiwan 的組織者，以便回溯組織成立過程以及想法。此外，為了了解其他組織，如 ATKI-Indonesia，如何協助 ATKI-Taiwan，對 ATKI-Taiwan 產生什麼影響，也訪問一位經常協助 ATKI-Taiwan 的組織者。

序	姓名	職業
1.	Ade Ipang (IP)	印尼籍組織者，出身學生運動，曾任 APMM 協調員。
2.	Retno (RE)	印尼籍移工組織者，在香港擔任家務工，擁有多年的組織經驗。2008 年回到母國成立 ATKI-Indonesia。
3.	Iweng (IW)	印尼籍移工組織者，在香港擔任家務工，擁

		有多年的組織經驗。2010 年回到母國協助 ATKI-Indonesia 的工作。2014 年成立 Serikat Keluarga Mantan Migran (移工家庭聯盟)
4.	Atin (AT)	從 2009 年參與 ATKI Taiwan 至今，擔任 2009-2014 年擔任 ATKI-Taiwan 會長。在台灣擔任看護已 9 年。
5.	Lukman (LK)	2014 年擔任 ATKI-Taiwan 會長，後因合約到期回到母國後，無法續約到台灣繼續工作。
6.	Sari (SA)	ATKI-Taiwan 幹部，任期從 2012 年至 2013 年。在台南擔任看護。
7.	Inayah (IN)	ATKI-Taiwan 幹部，在桃園、臺北擔任看護。

1-3-3 文本分析

筆者收集 ATKI-Taiwan 在網絡、台灣印尼語報章發出的聲明稿、新聞報導、文章等，了解 ATKI-Taiwan 對議題的立場、組織的論述以及組織如何與群眾溝通的媒介。ATKI Taiwan 使用的教育手冊、組織手冊，從中能夠瞭解 ATKI-Taiwan 進行組織組工作的原則和概念。

1-3-4 研究局限

在這個「田野」裡面，雖然長時間與移工互動，但未化為我做田野筆記的動力。筆者在不斷的試圖瞭解移工對組織工作的理解和調節自身在組織的身份時，不得不說組織工作會讓人著迷，忘了做為研究者應做的功課。聚會前後，腦袋浮現的是接下來該做什麼、什麼沒做好、下次該怎麼做，或者跟大家放鬆聊聊天，或者過於細節、瑣碎的情節，無法進行現場錄音，也沒有進行較完整的記錄，事後才覺得那些對話非常重要，只能靠事後回憶，以及進行事後查證，因此遺漏許多重要的訊息與細節。

此外，雖然筆者能夠稍微了解印尼語，但是移工相聚的時候還是習慣以家鄉語或爪哇語來溝通，所以還是會出現筆者完全聽不懂對話的狀況出現。但是在筆者參與組織會議或辦活動時，ATKI的幹部都會相互提醒，改成以印尼語(Bahasa)來對話。

由於個人因素，筆者在 2014 年離開台灣，也逐漸脫離 ATKI-Taiwan 的事務，直到 2015 年 7 月筆者再回到台灣時再進行訪問，就出現田野分析資料和進行訪談時間的差距。2015 年 ATKI-Taiwan 也經歷一輪新幹部的就任，這段期間，組織也產生了一些變化，出現人事糾紛和組織分裂的問題。有些受訪者已經離開台灣或離開組織的崗位，不再擔任幹部或脫離組織工作的狀態下進行訪問，ATKI Taiwan 後續的發展，已非本論文所能掌握。

第二章 台灣印尼移工社群組織

第一節 印尼政治的發展與變化

1927年蘇卡諾成立印尼國民黨，鼓吹愛國意識和民族意識，爭取印尼的獨立。荷蘭統治印尼，蘇卡諾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就是要打倒荷蘭帝國主義。1936年蘇卡諾聯合其他政黨成立印尼政治聯盟，積極推動獨立建國運動。1940年代印尼仍然被荷蘭殖民，一直到日本佔領爪哇島，蘇卡諾獲得日本人的支持下，宣佈印尼成立，組織內閣，蘇卡諾成為印尼第一任總理。1946年，荷蘭又再度殖民印尼（顧長永，2000）。

冷戰時期，世界局勢出現美國及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兩大意識形態互相對抗，兩股對峙的力量延伸到東南亞。印尼也成為蘇俄與美國欲拉攏對象，美國為了避免印尼傾向荷蘭，出面向荷蘭政府施壓要求其放棄對印尼的統治。1949年，荷蘭完全撤離，印尼正式成為獨立的國家（顧長永，2000）。印尼總理蘇卡諾執政時期，因反殖民主義的立場而採取排外的立場，反對荷蘭在印尼的殖民勢力，也與美國關係惡化，在政治立場上選擇與蘇聯和中共合作，而人民也激起一股反美情緒（郭祐全，2012）。蘇卡諾認為印尼長期被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剝削，使得印尼處在貧窮的處境。1957年，他把所有荷蘭的財產收回國有。蘇卡諾左傾的政治立場，也使他在外交上出現了變化（顧長永，2000）。1963年，馬來亞在美國的支持下，成立馬來西亞聯邦，蘇卡諾認為馬來西亞聯盟是美國介入東南亞政治下的計劃，他認為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已經違背同盟關係，蘇卡諾選擇與馬來西亞關係破裂。印尼與馬來西亞斷交後，邊境不斷發生軍事衝突，美國選擇支持馬來西亞並且提供防禦武器，蘇卡諾與美國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李美賢，2005：185）。

1966年，蘇卡諾總統被迫下台，由蘇哈托取代其政權。蘇哈托推翻蘇卡諾後接管了對軍事的領導權，對印尼共產黨進行圍剿，宣佈印尼共產黨為非法組織，消滅左派份子，印尼左派力量從此在政治上消失。蘇哈托執政後，開始了新秩序時代（New Order）。蘇哈托對待政黨的立場完全與蘇卡諾時期開放民間組織自由成立政黨的立場大相逕庭，其削弱政黨力量，壓制政黨在民間的影響力。蘇哈托採取高壓政治手段，控制言論自由以及意識形態的操控，以軍事統治滲入地方政治，藉由指派議席建立軍方勢力維持政權，加強對國內政府機關和政黨的管制(郭祐全，2012)。蘇哈托透過掌權，任命其屬政黨高卡爾成為人民立法會議（Dewan Perwakilan Rakyat, DPR）議員，以及人民協商會議（Majelis Permusyawaratan Rakyat, MPR），建立高卡爾勢力以及軍方勢力，形成個人威權政治（顧長永 2000）。

蘇哈托總統執政 31 年，利用其行政職位建立了恩寵關係網絡，以穩固個人政權也為自己建立膨大的財富，國內官僚體系貪腐問題嚴重(顧長永 2000: 68)。1997 年亞洲經濟風暴，印尼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民眾醞釀推翻蘇哈托政權的力量，最後蘇哈托被迫下臺（郭祐全 2012）。從此，印尼政治步入一個大轉變，印尼底層人民強烈要求改革，印尼才開始了自由選舉。哈比比在壓力下開始進行政治改革，減少軍人干政，以修改憲法減少總統任命議員議席，並且進行國會議席選舉（顧長永 2000）。蘇哈托下臺後，印尼政黨政治又開始發展，國會議員的自主性上升，當瓦希德上任後的無能，最後被罷免。蘇哈托的軍事執政結束後，政府對社會運動的管制也比較寬鬆，寂靜多年的勞工運動也因此得到機會逐漸發展起來。

2001 年，瓦希特被罷黜後，美嘉娃蒂（Megawati Sukarnoputri）當選為印尼第五任總統，其最大貢獻是推動總統直選的選舉制度。2004 年，印尼人民第一次

直接投票選總統和副總統，民主黨的尤多約若（Susilo Bambang Yudhoyono¹³）當任總統。尤多約若的某些政策被激進社運份子批評，認為其過於傾向美國靠攏，實行多項對印尼國民不公的政策。其中包括；掠奪土地、取消燃油補助、開放外資、國內失業率攀升、貧窮化越趨嚴重等等。此時，印尼的反對運動也非常的活躍。80年代的學生運動轉向關注社會底層議題，並且積極投弱勢群體的抗爭（李美賢，2005）。

在蘇哈托的掌權之下，印尼人民經歷了長達 31 年的威權政治的統治，印尼的左翼力量經過國家和軍方的鎮壓幾乎沉靜。一直到蘇哈托下台後，印尼才開始擺脫軍事對國家事務管理，慢慢開啟了民主制度。同時，人民的反抗力量也開始崛起。97 年印尼經歷經濟風暴後，大量輸出人口到海外當移工，也有不少印尼女性到香港當外籍幫傭，她們經過長期的組織以及各種抗爭，逐漸形成跨國草根移工運動。

第二節 印尼移工社群的多元面貌

2-2-1 移工自主團體的出現

筆者在接觸 ATKI-Taiwan 期間，也隨著 ATKI-Taiwan 的幹部遊走在台北車站、台中公園，透過 ATKI-Taiwan 接觸了不少印尼自主團體。2012 年至 2014 年期間，筆者發現印尼移工社群不同的面貌。印尼移工社群組織的類型以穆斯林宗教團體、聯誼會員之間感情的同鄉會為最大多數，其中包括：Pengurus Cabang Istimewa Nahdayatul Ulama (PCI-NU)、Keluarga Muslim Indonesia Taiwan (KMIT)、Forum Silaturahmi Muslim Indonesia di Taiwan (FOSMIT)、Ikatan Muslim

¹³ 簡稱 SBY 總統。

Indonesia di Taiwan (IMIT)、Ikatan Warga Muslim Indonesia di Taiwan (IWAMIT)、Majelis Taklim Yasin Taipei (MTYT)、Majelis Taklim Yasin Ciayi (MTYC)、Forum Kerukunan Keluarga Besar Warga Indonesia Di Taiwan (FKKBWIT)、Warga Muslim Indonesia Taiwan (WMIT)、Ikatan Keluarga Banyu Wangi(IKAWANGI)、Forum Silaturahmi Muslim Indonesiadi Taiwan (FOSMIT)、Pimpinan Cabang Istimewa Muhammadiyah (PCIM)。

另外，還有以照顧同鄉福祉聯誼的職業同鄉會¹⁴，尤其在台灣各地漁港大部分都會各自組成同鄉會，有些坐落在同樣碼頭的同鄉會結合成聯盟或者是依照台灣縣市所成立的同鄉會，例如：宜蘭南方澳的Forum komunikasi Pelaut Indonesia Taiwan (FKPIT)是由 8 個漁工同鄉會組成，包括：KOPLING ROBAN (paguyuban ABK Batang)、PASOPATI (Paguyuban ABK Pemalang)、DARMA AYU (Paguyuban ABK Indramayu)、COMBET (Paguyuban ABK Brebes)、ORTEGAL (Paguyuban ABK Tegal)、KOMPAK (Pguyuban ABK KapalKursin)、RED CORAL COMUNITY (Paguyuban ABK kapalbatukarang)、LARE CIREBON (Paguyuban ABK Cirebon)。

其他縣市的漁工團體包括：澎湖 PESPITA、金門 Forum PancingJaring FORPAJAR，大宜蘭溪 TASBE (PaguyubanTasiBersatu)，高雄 BOLO DHEWE Comunity (Paguyuban ABK Batang)。

除此之外，還有不分職業類型的各縣區同鄉聯誼會：彰化Ikatan Keluarga Changwa (IKC)、台中Paguyuban Keluarga Lombok (PAGALOK)、台中Ikatan Keluarga Ngawi (IKAWANGI)¹⁵。以上的團體比較是情感交流，加強彼此間的聯

¹⁴ 這些團體會員來自同樣的家鄉，他們在同一工作場合或漁港工作。

¹⁵ 這些組織只限於筆者在 2012 年-2014 年參與移工組織所收集到的移工組織名單，當中或許如今有些已經解散或有一些新成立的團體，因為研究的限制而沒有記錄在此論文中。

繫，有些也發揮互助的作用，在成員或夥伴遭遇到困難、職災、住院、過世的時
候及時提供金錢或物資上的援助¹⁶。除此之外，這些組織也扮演著調停糾紛、組
織合作和交換資訊的功能，並且制定共同規章，所有聯盟底下的組織成員都必須
遵守規定，明確規範成員的權利義務。這些團體也扮演維持港口治安的角色，每
當漁港的印尼漁民之間發生衝突、或滋事事件，團體代表就會出面主持公道，並
且進行集體決策後，滋事者或者涉入毆打等行為都會被免去會員資格。即使聯盟
的事務多數採取集體決策，但是實際運作上還是帶著非常濃厚的頭人領導的方
式。

筆者進入南方澳碼頭時，看到其他印尼漁工與社團領袖的互動方式發現，印
尼漁工會員都會站在社團領袖的後面，並且保持沉默，極少加入對話。這些領袖
一般稱其他的會員為「anak buah」（下屬）或「anak」（孩子）。

在印尼移工自主組織當中，ATKI Taiwan 以及IPIT的組織目的是以促進移工
自身權益為主，屬於較批判立場。IPIT 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於 2009 年協助成立
的印尼移工組織。每週舉辦中文課、音樂與電腦教學，以及文化、座談會等等活
動¹⁷，組織宗旨為提升移工以爭取在台灣的权利，與台灣印尼移工建立聯繫透過
各種活動提升自己並且更進一步瞭解勞動權益以及增加自身的才能¹⁸。除了上課
以外，IPIT主要活躍於參與宗教活動，也會進行關懷活動，也就是為由需要幫助
的移工進行募款。ATKI-Taiwan是在台灣移工社群中，屬於少數激進的社會運動
型組織，支持反對運動。這與組織成立的背景有著莫大的關係。ATKI Taiwan並
非由台灣的團體成立，其運動策略和抗爭方向是以組織群眾(印尼移工)為主，提
高群眾的政治醒覺，發展群眾力量。

¹⁶ATKI-Taiwan 也曾經以救濟的方式協助移工，但是從其他組織運作以及結合過去經驗發現，幹部
們發現經濟救濟並無法解決移工面對的問題，以及改變整個外籍勞工被剝削體制。

¹⁷<http://www.tiwa.org.tw/?itemid=273> TIWA 網站

¹⁸<http://ipit08.wordpress.com/visi-dan-misi-ipit/>

2-2-2 移工社群內部拉扯的力量

雖然，台灣有不少自立的印尼移工團體，但大部分的組織或宗教團體與印尼辦事處維持著合作關係，後者經常贊助移工團體舉辦宗教或文藝活動，提供活動的經費。大部分印尼移工團體在舉辦活動時也會特別邀請印尼辦事處官員或代表出席（許家雋，2014：27）。組織領袖需要獲得印尼辦事處的特定資源，比如：有關台灣新措施的訊息、印尼駐台活動以及接待母國官員等，對組織領袖來說都是可以用來突顯本身的領導能力；而印尼辦事處則需要獲得印尼社群的支持，建立影響力，因而形成移工社群與印尼辦事處之間的**依賴關係**。

許家雋（2014）提出移工社群就猶如「江湖」，出現不同形態的組織，移工領袖、以及其他各種不同身份的角色，包括：學生、商店業者、政府官員等等，他們作為組織的領袖，在移工社群中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而他們之間不同的立場也會在社群中引起拉扯的力量，進而影響移工集體抗爭。簡言之，印尼移工運動的樣貌無法只從單一組織的發展或行動來理解，移工組織除了面對當權者以及體制的壓迫之外，還需面對同樣是受壓迫的群眾中不同的政治立場以及社群內部的張力，還以及國家代表單位對激進力量的壓制，採取策略消解移工集體力量的形成。在台灣的移工缺乏政治議價的權力，面對勞資糾紛卻無法獲得協助時，印尼辦事處往往是移工求助的單位。移工團體也經常面對印尼辦事處「踩在他人的土地上，盡量避免鬧事，必須和睦尋求解決方案。」的息事寧人態度（田野記錄 2013/6/28），造移工難以獲得真正的協助。

除此之外，印尼社群內部帶著濃厚的尊卑關係，一般群眾對於政府官員或領袖都用長輩的尊稱：「Pak」（叔叔或伯伯的意思）或「Ibu」（媽媽的意思），多數都是以尊敬的、服從的態度來稱呼。這樣政治文化也存在於移工團體內部，作為

組織領袖，往往享有一定的尊敬和地位。同樣的，移工對政府官員也是帶著謙卑和尊敬，把後者當成較高的姿態。

由此可見，印尼社群或組織也不是鐵板一塊，反而充滿許多異質性和不同的社會關係。移工組織的集體抗爭面臨不同力量的拉扯而無法真正的團結。

第三節 跨國移工運動的形成

在參與 ATKI- Taiwan 的過程中，筆者逐漸的發現 ATKI-Taiwan 並非移工自然組成的團體。而 ATKI- Taiwan 的形成無法從單一國籍或一個國家、區域的劃界來進行理解，而是交織著左翼運動發展以及各種在地因素，因此不得不從香港移工運動的脈絡以及 ATKI-HongKong 的組織發展歷程說起，這樣我們才能理解 ATKI-Taiwan 的形成過程以及組織的特性。

2-3-1 ATKI-HongKong 印尼移工運動的崛起

2000 年一群遭受雇主不平等對待、被侵害的印尼籍家務工在 Bethune House¹⁹ 庇護中心接受庇護時，菲律賓組織者提供一連串的政治教育，並且協助她們成立組織——香港印尼移工協會（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簡稱 ATKI-HongKong）。這接受庇護期間，菲律賓的組織者及非政府組織，如 APMM²⁰，培力這群完全沒有組織與參與社會抗爭經驗的印尼籍移工，成立組織。ATKI-HongKong 成立後，長期進行服務、教育、宣導外籍勞工權益以及組織工作，週末在維多利亞公園提供流動式諮詢（mobile counseling），並且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設立櫃檯提供諮詢服務，許多面對雇主或仲介侵犯的移工都會前往該組織求助。ATKI-HongKong 除了提供適當的諮詢之外，並且提供庇護以

¹⁹1986 年由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s Worker，MFMW）成立，在香港公司條例下註冊的慈善團體，提供慈善服務和社會輔導予有需要的移民工及其家庭。

²⁰全名為：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譯名為亞太移駐勞工工作團，原名為 APMMF(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 Filipinos)，成立於 1984 年，主要研究、倡議與教育移工議題，協助亞太和中東區域的移民工組織。

及協助處理個案的申訴，提供適當的協助，以及教育、培力（empower）工作，提高個案對勞動權益以及香港勞動法規或印尼勞動力輸出政策（Labor Export Policy）的認識，以及各種勞動權益的訴求等等（Hsia, 2009）。

在香港的草根移工運動，菲律賓組織者所成立的非政府組織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分別在APMM、Bethune House以及MFMW²¹，有意識的支持草根移工組織，提供或與草根移工組織取得物質與非物質的資源，包括：辦公室空間、組織技巧的培訓或教育活動、經濟支援，支持移工母國的組織者到香港協助移工組織工作等等（Hsia, 2009：136）。

香港草根移工運動以跨國籍團結，集結各族群強大的群眾集體的力量，進行抗爭以改變全球不公平體系。香港「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AMCB）集合了印尼、泰國、菲律賓、斯里蘭卡、尼泊爾移工，菲律賓移工組織者透過培力，進行意識覺醒的政治教育形成高度政治化的組織或聯盟進行反對全球化帝國主義的運動，也培養出各國籍的移工組織者進行群眾組織工作，由下而上的跨國組織合作方式，形成跨國草根運動的力量（Hsia, 2009）。2005年香港舉辦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峰會（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亞洲移居人士聯盟」各國籍移工組織參與反對WTO的活動，進行長期的教育工作（Hsia, 2009）。在這場外籍移工參與反對自由貿易的跨國集體抗議行動的場域中，型塑了外籍移工的抗爭運動，從過去爭取自身權益的政治意識，被轉化成更廣泛的人權價值、批判全球化與批判新自由主義（Constable, 2009）。

ATKI-HongKong得到菲律賓非政府組織的協助和支援下，進行組織群眾工作。菲律賓的組織者把過去的運動抗爭經驗，以及政經分析、組織方法等經驗提供給

²¹ 全名為 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中文名為移民工牧民中心。MFMW 是一個註冊慈善組織，主要服務移工，提供教育、培訓或福利等等。Bethune House 是 MFMW 所設立的庇護中心，庇護前來救助的移工。

印尼移工，進行教育與培力的工作，讓他們成為幹部和組織者。ATKI-HongKong不但成功團結香港其他移工組織，結合成立聯盟，共同進行抗爭。同時，ATKI-HongKong也學習菲律賓移工運動的經驗和組織方式，試圖組織和發展海外的抗爭與國內的抗爭運動，並且仿照菲律賓移工國際²²的策略，在世界各地成立分會或結合當地組織，發展全球性的移工運動。這些在香港經過高度的組織化，以及擁有組織經驗的印尼女性移工組織者把移工運動連結到母國的社會運動（Hsia, 2009）。簡言之，印尼的移工運動發展，菲律賓組織者扮演重要的角色，曾經擔任APMM協調員的印尼移工組織者Ipang表示：

「在亞洲，菲律賓人民運動擁有很長一段歷史，而印尼人民運動是從98年才開始發展起來，在這之前印尼運動組織者找不到一套實踐理論，而菲律賓人民運動在60年代就開始組織和發展強大的基層群眾力量，他們這段抗爭經驗就成為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參考。而菲律賓運動組織者在80年代就開始組織移工，而我們（學生）是從2005年才開始。那時候我們才真正瞭解到移工議題和國內各種壓迫根源問題是一樣的，我們也參照了菲律賓移工運動的策略。他們的經驗使我們也加速了組織工作以及很快獲得成果。」（訪談，IP20131208）

ATKI-HongKong受到菲律賓運動政治意識的影響，建立草根運動路線，組織群眾，並且有意識的把移工議題提升至跨國層次的政治抗爭行動，建立跨國網絡進行鬥爭（Hsia, 2009）。菲律賓從過去組織經驗，以組織最底層民眾分析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其組織經驗也大大影響了印尼草根組織，他們學習菲律賓組織經驗模式，發展出緊密又有系統的結盟運動。

ATKI-HongKong的前幹部或會員在澳門成立了組織，也經常結合香港、澳門

²² 英文全名為，Migrante International，由世界各國的菲律賓移工組織所組成的國際性聯盟。

的力量，為澳門移工爭取權益。2007年ATKI-HongKong一些資深幹部回到母國後建立ATKI Indonesia²³，試圖在一些鄉鎮組織移工及移工家庭，建立組織網絡。經過長期的組織工作，ATKI-HongKong成為亞洲區域內有影響力的草根移工運動。在香港穩定建立群眾基礎後，ATKI-HongKong以及菲律賓組織者開始計劃開始協助組織台灣的印尼移工，以及協助在印尼組織與在台菲律賓草根組織形成連結，建立跨國籍移工組織。

2-3-2 ATKI-Taiwan 的成立

香港移工運動的發展成為ATKI-Taiwan一個很大支持力量，而ATKI-Taiwan的成立，APMM以及ATKI-HongKong扮演了決定性的因素。2005年Ipang代表印尼學生組織Front Mahasiswa Nasional (FMN²⁴)受邀於亞洲學生組織參與香港反對世貿的活動後，菲律賓組織者建議Ipang留在香港協助移工的組織工作。印尼學生運動與移工運動兩股力量的結合，讓草根組織力量得以擴大。這股力量的背後，由APMM協助推動並且提供資源，協助ATKI-HongKong回到母國進行組織工作並且做國際組織之間的串聯。2006年ATKI HongKong開始與母國學生運動組織FMN、INDIES研究中心、AGRA農民組織等成立聯盟。2007年，ATKI-HongKong、APMM以及INDIES在印尼舉辦一場討論推展移工抗爭的工作坊，並且建立未來在母國設立組織並且進行組織工作的基礎。2008年，當資深移工組織者Retno從香港回到母國後，ATKI-Indonesia正式運作，並且參與反對國內石油漲價運動。2009年，ATKI-Indonesia在其他鄉鎮開始設立分部，繼續組織移工家庭家屬或前海外勞工，關注移工議題，並且提供申訴等各種的協助，進行議題倡議、抗議行動等等（Apriani, 2011）。ATKI-Indonesia穩定的發展後，成為協助ATKI-Taiwan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柱。

²³ 2014年正式更名為：Serikat Keluarga Mantan Migran，主要目的擴大組織對象，並不局限於於ATKI的成員或家庭成員，而凡是海外移工及移工家庭都可以參與該組織組織。

²⁴ Front Mahasiswa National，印尼激進學生組織，關注弱勢全體議題，並且下鄉做社區服務，組織農民、勞工等。

2008年，APMM再次安排已經擔任協調員的Ipang到台灣執行社會調查，瞭解印尼籍勞工在台灣處境的處境，並且尋找組織移工的機會。期間，Ipang遊走在各個縣市火車站、印尼辦事處、印尼小吃商店，融入移工社群。2009年3月成立反對超收安置費組織——PILAR Taiwan²⁵，向母國要求處理超收費用的事件。剛成立的Pilar Taiwan的組織運作較為鬆散，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組織架構和組織模式，主要是聚集各地區的移工，共同討論台灣移工的處境。由於移工的工作場所分散在各個區域，多數家務工無法在週日休假或無法聚集，組織交流的方式則透過多人通話的方式，進行組織會員的工作，以瞭解他們在台灣處境的處境。2009年12月，組織者Ipang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印尼辦事處官員收取超額護照費用並且縱容仲介從代辦中獲益事件。Ipang透過手機社群以及在印尼媒體揭露此事，完全震撼在台灣工作的移工，即使在台灣的印尼留學生也不敢對此事吭聲，他們從未懷疑辦事處官員會從他們身上牟利²⁶。從此，印尼代表處的信用也嚴重受到台灣印尼移工的質疑，認識到官方單位無法替她們解決問題，反而趁機牟利²⁷。由於Ipang長期的運動經驗，讓他抓住這次機會，把超收費用的議題作為教育群眾的一個重要課題，並且向印尼辦事處要求對方舉辦對話會，讓出席者能夠直接與印尼辦事處對話。「當時候剛好抓到這個時期，我拒絕被印辦收買並且要求召開公開對話會要求他們直接面對移工。那次經驗後讓移工們看到集體抗爭的成功，移工也開始有信心。」（訪談，IP20131208）

25全名為 PersatuanBuruhMigran Indonesian Tolak Overcharging 或 United Indonesian against Overcharging，該聯盟主要反對職業訓練中，仲介對印尼籍勞工超收仲介費用。依照訪談第一手資料，台灣 PILAR 由數十位移工透過印尼組織者組織後成立，在台灣也開始進行反對超收仲介費的運動。

26印尼辦事處官員涉及超收護照費用，每本從 1200 至 3000 不等。一名 Indosuaru 雜誌記者 Otki Li 針對該事件進行報導並且貼在網路論壇，描述但是印尼組織這 Ade Ipang 如何揭露印尼辦事處貪污事件的過程。<http://sastra-pembebasan.10929.n7.nabble.com/sastra-pembebasan-Re-GELORA45-Taaruf-td52525.html>

27 印尼辦事處被揭發之後，轉向與在台印尼商會合作（APIT），由該商會代辦護照手續，但收費 500 台幣，而原本護照費用只需 300 台幣，仍多出 200 台幣。印尼社群批評印辦不但沒有提供海外移工的服務反而從中賺取盈利。<http://politik.kompasiana.com/2010/02/02/lanjutan-pungli-paspor-oleh-kdei-kegelisahan-tki-taiwan-kepada-pemerintah-indonesia-di-taiwan-79234.html>

在這樣的條件下，Pilar Taiwan 的成員相信組織團結的重要性，並開始積極參與組織，形成集體的力量。「他們會想一般普通人都能夠解決這樣大的問題，把這種能動性發揮出來，告訴他們：看，一個普通人可以做這麼多事，而你們這麼多人一定可以解決更多的問題。於是這樣的能動力又回到群眾身上，增加他們對組織的信心」。(訪談，IP20131208)。幾個月後反對超收安置費小組轉型成 ATKI-Taiwan，於 2009 年 12 月正式成立，組織的宗旨和目標延續 ATKI-HongKong 的抗爭，以組織、教育群眾，爭取移工權益與福祉為抗爭運動目標。

組織者 Ipang 離開後，母國的 ATKI-Indonesia 繼續培力和教育 ATKI-Taiwan 的幹部。這時候的 ATKI-Indonesia 在母國已經建立一定的網絡，並且在一些鄉鎮設立分部 (Apriani, 2011)。2009 年 ATKI Indonesia 在母國已經開始推展台灣移工議題，並且協助反對超收費用聯盟 PILAR Taiwan 在母國反映海外勞工在台灣處境，把海外移工的議題在母國進行倡議、組織的工作並且向相關政府單位施壓。Ipang 走後，ATKI Indonesia 扮演培訓組織幹部，資深移工組織者 Retno 表示：「我們主要扮演協調的角色，提供組織幹部的培訓，帶領他們認識議題。」

ATKI Taiwan 的成立過程如下圖所示：



ATKI Taiwan 成立過程

製圖：筆者

小結

在印尼社群中，不少為移工本身成立的團體，主要工作為救濟面對困難的同鄉，例如籌募醫藥費等等。多數移工組織面對社會結構的壓迫，缺乏對社會權力不平等的分析，當同鄉面對職場上的糾紛、職災等問題時，往往都是提供金錢上的救助。除此之外，印尼社群的自主團體也面對缺乏社會資源的問題，造成移工團體只能依賴官方的資源，難以獲得真正的協助。

ATKI Taiwan 的成立過程並非由印尼移工自然形成的組織，而是在跨國移工運動的策略推展下，經過長期的規劃和組織工作後所形成的底層勞工組織。因此，ATKI Taiwan 的抗爭目標和組織模式都部分吸收 ATKI Hongkong 模式。移工的覺醒，PILAR Taiwan 的成員體認集體力量和組織長期抗爭的重要性，認為應該要有一個正式的組織，最後大家一同成立 ATKI Taiwan。

第三章 草根組織的發展與行動

第一節 移工的覺醒

ATKI-Taiwan 對移工權益的關懷是移工選擇參與 ATKI-Taiwan 的最大因素，以便讓他們可以更了解移工權益和相關規定。組織提供各種有關勞動權益訊息，讓移工面對問題或糾紛時，用自己的力量抵抗。

Inayah: 「我對組織 (ATKI Taiwan) 感到興趣是因為她對移工爭取權益來說非常重要。在組織我們能夠了解我們的權益，如何應對雇主、仲介，如何掌握我們的權益，如果沒有組織我們並不會知道。……當雇主、仲介告訴 (管理) 我們某些事的時候，我們可以說『這是錯的哦。』」(訪談，IN20150705) (黑體為筆者強調。)

Sari 和 Sorgie 於 2010 年終止在台灣的合約而回到印尼，但是印尼仲介有個規定，凡是沒有完成合約的海外勞工其儲蓄金將會被沒收。Sari 在其看護的阿嬤過世後選擇回到印尼，在香港工作的同鄉建議她向 ATKI-Indonesia 尋求協助，向仲介拿回儲蓄金。Sari 最後成功拿回儲蓄金，「我記住 Retno 對我說的，並跟著她的方法去做，只要相信那是自己的權益，別人不能奪走，堅持到底就會成功。」(訪談，SA20130927)

在工廠工作的 Lukman 也是因為對移工權益知情權的需求而參與組織。移工在遷移過程中，面對許多不平等的對待以及壓迫，深覺制度的不合理卻無法深入了解相關規定的細節。Lukman: 「我很想學習有關仲介費的問題，在印尼那邊是這樣扣錢，但是在台灣又不是這樣說的，我很想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台灣勞動體制背後意識形態以「捆綁」移工為基調，不但確保雇主能夠獲得便宜勞動力甚至被賦予監控移工的義務(藍佩嘉, 2006)。台灣政府賦予雇主對移工管控的權力，使得外籍勞工處在不自由勞動處境。雇主和仲介對移工進行監控，

管理其生活，甚至干涉社交、個人行為或人身自由。移工對於雇主或仲介的管理，組織提供有關勞動權益的知識，讓移工得以從嚴謹的管理模式掙脫開來。移工擁有議價的能力，可以拒絕雇主、仲介的要求，明確改善其勞動處境。

Atin：「我剛開始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知道。仲介說什麼就跟著做，自己有什麼權益都不知道。但是，接觸 Ipang 之後，我慢慢知道我有什麼權益，我開始偷偷的用手機，因為我知道我這樣做是沒有錯的。我提起勇氣跟我雇主說『我要打電話回家，所以我需要用手機。』因為那是我們的權益。」（訪談，AT20120112）

Atin 剛來台灣時被仲介每個月苛扣新台幣 2 千塊薪資，還在各種手續上超收費用。她最後選擇把仲介過去向她超收費用的問題告知雇主，而雇主也慢慢地信任她，最後替 Atin 申請自聘。

Sari 原本的工作只是陪同阿公、為老人家煮飯、叮嚀吃藥，最主要是為過世的阿嬤每天上香，其餘都是 Sari 的私人時間。雇主曾經要求 Sari 空閒的時間可以協助下田的工作，而她直接拒絕：「我就跟老闆說我不要，就算在這裡很無聊，我也不要做。」

Sari 認為：「如果我們都不認識我們自己的權益，雇主、仲介叫我們做什麼，我們都說 OK，任由他們把我們的手機拿走等等。我們不清楚什麼事也照著做，他們叫我們變成什麼我們就跟著變成了什麼。即使那些工作並不是我們的工作範圍，但是因為我們的無知我們也照做，而他們只支付我們那麼一點點。」（訪談 SA20130927）

移工在勞動環境面對制度上的壓迫，雇主、仲介的管理，不知從何獲得協助時，組織提供有關勞動權益的知識，讓移工意識到自身的權益為何，並且取得應

對的方法，讓移工能夠勇於爭取，實質改變自身的勞動處境。移工對自身權益的意識越來越高，與雇主討價還價的過程，挑戰了原有雇主與移工，支配欲被支配的權力關係。

從自身的經驗中看到其他移工的處境，而進一步想協助同樣面對困境的移工。在遷移的過程中，移工缺乏對勞動權益的知識，面對困難或糾紛時從組織中得到協助，自身的勞動權益意識受到啟發，促使他們想進一步認識和參與組織。移工的問題實質獲得改變，讓他們對組織力量產生信心，而進一步想協助其他被壓迫的移工。從他們以往被壓迫的經驗中，也看見其他移工擁有相同被壓迫的經驗，而這個「看見」，也把他們從個人帶往集體。

第二節 組織的發展

3-2-1 ATKI-Taiwan 組織的形態

ATKI-Taiwan 並未如其他組織或社團一樣，能夠固定的開會、固定的出席討論組織事務、分配組織工作、規劃組織發展、討論議題等等，也缺乏全職的工作者處理組織的各種事務，但是他們卻運用了在雇主家工作之餘的時間來進行組織工作。ATKI-Taiwan 沒有辦公室，但是仍然有不少的行政與組織工作需要處理和協調，包括收取會員會費、撰寫活動企劃書、活動報告、應付不同雜誌或媒體的邀稿、學者的訪問、個案記錄、財政記錄、個案諮詢、協調會議等等各種大大小小的工作，運作起來與一般組織的會務工作無異，必須在零碎的時間中，尋找對外聯繫的空隙。移工一邊照料看護者，一邊對外界聯繫處理組織事務。家務工的作息、工作時間都是隨著被看護著的狀況而改變，一些組織成員因而無法參與組織工作或活動。外籍勞工就像是不自由的行動者在不自由的勞動體制，以及多重壓迫的勞動環境中進行社會鬥爭，爭奪時間與空間的自由。參與組織的移工在日

常的勞動生活中進行組織工作，爭取移工的權益。

ATKI-Taiwan 成立後的第一任會長由住在臺北的印尼家務工 Atin 擔任，組織成員還包括其他地區的幹部、會員等等。當印尼組織者 Ipang 離開台灣後，ATKI-Taiwan 就只能單靠自己的力量維持組織的運作，多數以手機通訊或網路的線上模式來組織會員。

當智慧型手機在印尼移工圈子不是很普遍時，組織成員或同鄉社群之間都是用多人線上通話的方式；申辦電訊公司門號的使用者致電給使用同一電訊公司的朋友可以免付費多人通話，但是國際通話還是需要收費。為了克服空間區隔以及無法休假聚集的問題，ATKI-Taiwan 早期就利用這種方式舉辦線上跨區域的座談，參與的朋友支付一、兩百塊新台幣給主持人作為國際通話費用，他們也曾邀請印尼或駐台灣的印尼辦事處官員進行座談，座談的議題包括各項移工政策、海外國民卡、仲介費、機場轉運站的海外勞工特別通道等議題。邀請的對象包括印尼移工草根組織者、印尼法律援助組織、海外勞工安置暨保護局、印尼駐台辦事處代表等等。從這樣的座談會中，主持人會針對移工政策和規定向各位主講人提問，而主講人則輪流回答，使移工在參與過程中更加瞭解議題。

Atin 無法每週休假，只能透過網路來做與組織會員聯繫的工作，而一些無法休假參與的會員也只能在線上「活躍」。多人通話的模式，還是存在困難：（一）成本太高，國際通話時間越長費用越高；（二）多人通話的模式會經常中斷訊號，主持人一人要維持 20 人保持通話，如果其中中斷了還要重新撥通；（三）成員必須持同一家通訊公司才能參與；（四）多人通話還是有人數限制，一個門號只能帶 20 人左右。後期，這位擁有門號的幹部脫離了組織，這種多人通話的線上座談也就沒有再持續，轉換成利用網路和即時通訊與組織會員們交流和保持聯繫。

不是所有加入組織的幹部或成員都曾經經歷勞資協調或抗爭的階段。有些移工留台時間較長，一來對基本的勞動權益也逐漸認識，二來與雇主也建立了穩定的勞僱關係，雇主在較為信任的前提下比較願意為移工提供較好的勞動條件。但是，也有部分的移工在吸收各種資訊後，得到社群或組織的支持，勇敢向雇主爭取更好的福利，例如：休假、直接聘僱、可自由外出、可使用手機或電子產品、私人寢室。一些幹部表示，瞭解自身的權益，使他們能夠和雇主討價還價，甚至可以把從組織裡學習到有關勞工法規或仲介的規定那個告知雇主。像 Sari 的雇主住在臺北，平常只有她和阿公在台南。雇主本身對於外籍勞工的相關規定都不甚瞭解，反而都是 Sari 本身跟仲介協調或把正確的資訊告知雇主，而雇主非常信任她，一切事物都由 Sari 自己決定。每天 Sari 煮完飯，剩下都是私人時間，用來學習語言、上網、電話聊天、到郵局處理包裹等等。

過去的組織運作，大多依靠會長 Atin 一人承擔。2013 年 Lukman 上任 ATKI-Taiwan 的會長後，組織開始形成**分工與集體領導**的模式，每個人在能力範圍內負責該部門的工作。Lukman 精明、謙卑的性格，能夠廣結善緣，在印尼社群和組織內、外扮演協調的角色。擁有撰寫能力的 Atin 轉而擔任組織教育宣傳，財政則由算數精明的 Diana 擔任，Dewi 對文書工作較有興趣，任職廠工的會長和副會長負責組織的外務（廠工有較多休假），策劃與執行例行活動，而每個月只有一次休假的家務工就負責組織內部的工作，在組織裡達到性別和不同領域職業的平衡，每個幹部以個人的有利條件參與組織工作。

3-2-2 實驗會員大會

ATKI-Taiwan的成員除了以家務工為大多數之外，也有包括一些漁工和工廠工人，散落在各個地區。早期的ATKI-Taiwan的組織架構非常鬆散，幹部和成員

的流動率非常的高。雖然，ATKI-Taiwan並沒有確立章程，但是從組織成立開始就規定兩年一屆。但是從2009至2014年，幾乎每一年都在更換副會長和其他幹部，只有Atin從2009年就任會長至2013年，長達四年，其他大部分幹部都是合約到期回國後沒有再回到台灣，幹部的更替是用直接交託而不是以民主選舉的方式。Atin：「我們在電話裡直接點名誰可以當就來當。」後期，組織幹部的遴選方式開始用推派和建議人選幾位幹部和成員在線上討論後，通過集體決定後就當上幹部了（多數是沒人主動願意當而被拱上去的）。候選人大部分都是由Atin認為是否適任而進行說服當事人接下任務，並非來自當事人的選舉意志。

Atin 認為組織的幹部多數無法每週休假，將錯失很多組織會員的機會，她也意識到組織也不能只停留在每個月只有一次活動的形式。Atin 說：「組織如果沒有運作很快就會解散，有適合的人來當可以讓組織培力新的幹部。」為瞭解決組織的困境，她決心把組織領導權交給另一個資歷淺但擁有相同層次的組織政治認同的會員。她期待新會長能夠每週休假，出來進行組織工作以便讓組織能夠壯大，因此加入組織不到半年的 Lukman 就從副會長轉而擔任會長。當時筆者試圖反對，認為剛參與組織的成員資歷尚淺，應該由資深的幹部帶領一段時間後才替換。但是 Atin 認為**先上任再訓練**，她相信人的能力是其次，最重要是對組織工作是否有興趣：「只要有心投入組織工作，就可以慢慢的培養技能和學習組織工作。」

過去筆者曾經參與學生運動組織，在經驗上會認為建立民主選舉機制和制定章程，讓組織可以邁向健全與監督機制，會員大會更是組織的重大節日，組織幹部必須呈報常年報告書向會員匯報，而幹部必須接受會員針對組織事務的諮詢。組織幹部都認同組織需要建立群眾對組織的參與和責任，而組織成員能夠承擔組織工作，對群眾負責。2014 年 ATKI Taiwan 的幹部開始實驗舉行會員大會。Atin 說：「你是被大家選出來，而且有其他團體見證，你不能說卸任就卸任，必須對組織和群眾有個交代。就算不是當面，也必須有個公開聲明。」

2014年1月，ATKI-Taiwan 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的演練，由擔任職務的幹部上臺報告一年來執行任務的狀況。雖然只有 10 多個會員，但是這個經驗讓組織建立一個重要的基礎。雖然出席人數只有 20 多人出席，ATKI-Taiwan 並未制定章程，人數不足也繼續進行大會。過去，組織並沒有完整的會員通訊記錄，移工經常更換電話，一旦與組織越來越疏遠或較少參與活動，就很容易斷了聯繫。組織幹部難以認定會員，使得召開會員大會的通知工作，說服會員出席，更是困難重重。即便如此，ATKI-Taiwan 努力地建立組織民主制度，為了讓會員和幹部體驗和理解正式會員大會的進行模式，也加入匯報常年活動報告的環節，向會員說明組織幹部兩年內所執行的工作。

會員大會開始前，進行了準備工作，包括制定流程，邀請其他組織出席，準備報告等等。會員大會開始時，ATKI-Taiwan與ATKI-Indonesia連線，透過網路ATKI-Indonesia致上團結訊息（Solidarity Message），之後幹部們輪流上去報告常年報告以及一年來參與的倡議議題和行動。之後，跳過選舉的環節直接進入交接儀式²⁸。

雖然，ATKI-Taiwan 仍然在現實條件下無法進行會長以及其他幹部職位的選舉，以會員一人一票投票競選。但是，他們可以做到準備常年報告以及交接，也讓組織內部運作更加透明化，邁向民主化；而會員也能履行監督的責任和參與決策，讓組織往集體領導的方式與原則運作。

²⁸當時 ATKI Taiwan 幾位幹部認為現實狀況無法進行現場選舉的環節，能夠在線上參與新任幹部的人數比能夠出席的人數多，最後採用電話線上達成共識後，現場公佈當選的幹部名單。

3-2-3 被壓迫者的批判教育

雖然 ATKI-Taiwan 缺乏具有豐富組織經驗、全職的組織者所提供的教育培訓，幹部也無法固定或很有規劃性的進行教育群眾工作，但是 ATKI 擁有一套政治經濟分析作為教育的基礎；提高移工的政治意識。該政治經濟教育的內容主要是，一) 瞭解移工問題「根源」(root cause) 的分析、二)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移工問題「根源」(root cause) 的分析是組織基礎的教育內容，讓群眾明瞭自身處境，以及為何必須到海外工作的原因。組織幹部從參與者的分享中聆聽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和困難，適時給予協助。ATKI-Taiwan 也試圖從 ATKI-HongKong 的組織方法，提高台灣的移工的政治意識。ATKI-Taiwan 進行過兩次移工問題「根源」工作坊；2013 年農曆過年筆者帶著 Lukman 和基隆的印尼漁工到陽明山。第二次則在 ATKI-Taiwan 四月份的例行活動日，大家聚集以慶生之名在台中公園進行，並且由 Lukman 來主持並帶動小組討論。這種工作坊，ATKI-HongKong 稱為「迎新活動」(Orientation)，提供給剛接觸組織的群眾，讓群眾分享自身出國工作的經驗和感受、遭遇的問題，最後進行集體討論。過程中，參與者能夠認識到組織的重要性，認同需採取集體行動改變社會結構。

資深的移工組織者帶領群眾去認識議題和教育他們如何分析事件背後的結構，使得群眾能夠對原有的世界轉變成能夠被覺察，並且進行改造的世界。在 ATKI—Hong Kong 的培訓手冊裡，提供移工組織者所需要瞭解的「勞力輸出的政策以及其帶來的影響」分析：印尼屬於第三世界國家，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國家經濟發展面對帝國主義掠奪當地的天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處於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狀態。低度發展國家的人民無法繼續以傳統的經濟方式生活，必須脫離土地、仰賴貨幣。政府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採取全面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勞動彈性化以及輸出大量廉價勞動力以賺取外匯。ATKI-Taiwan 延用

ATKI-Hong Kong 提供的培訓手冊，進行教育工作。

ATKI除了關注自身權益的鬥爭之外，其意識形態上更注重對抗全球化議題。2013年WTO會議在印尼舉辦，ATKI-Indonesia的幹部為了讓ATKI Taiwan的成員一起參與並且認識反對WTO的議題，透過網絡即使連線的方式進行反對WTO的教育課程；從資本主義以及全球經濟危機的歷史發展到國家如何變成被帝國主義殖民的分析，以及WTO協議將對移民工及其家庭所帶來的後果。ATKI-Indonesia的幹部曾經參與2005年香港WTO抗議行動以及教育課程，她們對WTO以及各種政治經濟學的概念非常的熟悉，把印尼的經濟發展過程進行透徹的分析，將資本主義全球化在最底層的人民身上如何作用進行說明：印尼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政府實行自由化、私有化與去管制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更是加劇了全球化危機。工人階級與人民面臨失業、勞動體制彈性化、與無限制的縮緊政策取消社會、教育與醫療補貼造成平民百姓無法擁有舒適生活，在WTO底下實行稅貿易總協定（GATT）以及各種不平等貿易協議等等。

ATKI 移工組織從批判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重新理解和分析社會制度，進而看到他們自身在世界真實位置以及底層人民共同的命運。有一次，我們連線進行課程時，筆者曾經擔心講述的內容過長，成員們會覺得疲累，網路突然斷線等等各種技術問題，建議直接從相關的移工議題開始說起即可，這樣可以比較快讓移工抓到重點（理解移工議題與全球化的關係）。但是資深的移工組織者認為政治課程必須深入對社會歷史發展有所瞭解，才能理解抗爭的意義，比起只是討論自身的權益來得重要。組織者 Iwenk 說：「讓他們（移工）對歷史的瞭解是很重要的，這樣他們才會明白其他底層人民的問題，才會瞭解我們也需要和他們一起抗爭。」歷史的過程對組織工作者來說更加重要，如果不認識歷史脈絡就無法瞭解改變的重要性。移工運動的抗爭也不只是單一群體的利益抗爭，而是需與其他基層群眾站在一起，才能改變這個世界

3-2-4 勞教課程

ATKI Taiwan 幹部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忙碌得沒有多餘的時間來思考或策劃組織內部的例行活動的內容。為了不讓幹部和成員只是單純聚會、交流聯誼，而能夠利用聚會的時間進行一些培訓活動，認識台灣勞動法規以及印尼的相關政策的問題等等。為了保持組織幹部本身能夠有參與感，並且由他們扮演主導的角色，每次的活動筆者都跟 Atin 討論。事實上，課程內容都是由筆者提出和安排，Atin 都是只要有人提出和執行她都沒有多大意見。但是，每次由筆者帶領的勞教課程都很難讓移工專注，幹部也不太感興趣。當筆者試圖跟幹部們討論為何對勞教課程沒有興趣時，她們都表示很有興趣學習，只是覺得聽課是很累的事情。

ATKI-Taiwan 的第二任會長 Lukman 上任後，不同於擔任家務工的 Atin，在工廠工作的他能夠每週休假，並且把休假的時間都保留進行組織工作，ATKI-Taiwan 因此變成能夠每週進行一些活動或課程，開始把人拉出來。機靈又學習能力強的他，不但可以主持和帶動移工進行工作坊，更能夠妥善安排幹部執行任務；對外又可以和其他團體保持友好的關係。為了吸引更多移工參加組織，他提出應該像 IPIT 那樣舉辦教學課程，才能夠吸引移工來參與，課程期間再讓他們認識組織並且學習有關勞動權益的知識。Lukman 認為在教學課程中穿插勞教內容，灌輸勞動意識是一個行得通的方法：「勞教的內容每週灌輸一點點就好哦。你講完之後，我有辦法接著解說²⁹，讓他們明白。慢慢的會越來越多人來上課，越來越多人加入 ATKI。」之後，筆者又提出萬一沒人來參與，或者全部都半途而廢的話會是不好的事情。Lukman 又告訴筆者他的策略，「只需要找 3 或 4 個人可以固定來上課，一定會有人想參與的，後面的事情就會很順利了。」Lukman 心思慎密，讓筆者不禁驚嘆。後來，他確找來了 3 位每週出席的固定成員，後來也變成

²⁹通常我都是用馬來語跟移工溝通，所以並不是跟每個幹部都可以溝通順暢。只有到過馬來西亞工作的 Atin 和 Lukman 可以瞭解我的「印尼話」，上課前都需要先翻譯。

ATKI-Taiwan的積極會員。其中之員Libby表示，以往休假他都是窩在家裡，但是現在出門時為了學習和參與組織，所以一定要出席。

Lukman負責組織成員以及籌辦活動的期間，幾乎都是交由他來主導週末的活動，包括：上課的方式、課程內容、時間的分配。他依照成員的作息時間以及心理需求，哪段時間上課、哪段時間為私人自由活動時間、什麼時候開會等等。而筆者就照著Lukman的指示來製作教材，配合多數家務工一個月只有一天休假，編排每個月週日分別進行一次電腦、中文、英文以及ATKI-Taiwan例行活動，三個月結束一個課程。但是筆者提出要求作為條件：ATKI-Taiwan的幹部必須要親自聯絡勞權會³⁰借用場地，作為往後ATKI-Taiwan能夠不依賴中介者與台灣團體保持聯繫。

正當筆者很懊惱設計短短三個月的短期課程必定無法讓參與者學會什麼，而Lukman非常清楚地說：「又不是真的上課」。其言下之意指教學活動只是組織工作招募會員的策略。對於如何招募更多會員和組織群眾，Lukman採取的策略：他先找到幾位信任和有承諾（commitment）的夥伴每週聚集在一起舉辦教學活動，以吸引更多移工，由於配合許多一個月只有一次休假的家務工，課程的設置則是一個月四週分別進行一次英文、中文、電腦教學，吸引新會員的加入，但也保留一週空擋時間進行組織例常性活動讓舊會員和新會員有所聯繫。Lukman認為從他過去參與組織的感受能夠理解一般移工的心態和需求；「一下子提供勞教或座談，移工們很難吸收，卻興趣不大，反而先讓他們參與活動或教學課程，慢慢熟絡之後，有興趣的移工就會繼續參與組織。」周詳的計劃，每個禮拜持續的學習熱情，Lukman所設計的課程模式，的確吸引了一些新的會員加入參與。對照由筆者來策劃和安排的活動，同樣也是進行勞教的課程，但是移工多數都不太

³⁰ 組織全名：勞動人權協會。

有興趣。只有面對勞資糾紛的移工才會認真聽，這麼一來就變成處理個案，其他的移工就會慢慢的散去到一旁去拍照、聊天、唱歌。上課時間長了會覺得沉悶，開始分心。

Lukman的灌輸勞動權益「一點點就夠了」的模式相對成功吸引到移工加入，他也非常自信，相信參與上課的移工慢慢瞭解之後，會投入組織並且參與抗爭行動。相較於外來者或知識分子移工能夠理解其他移工的想法和生活經歷，也更能夠設計出真正符合移工實質需求的活動。例如：無法長時間聽課、時間和地點的安排³¹以及上課的模式等等。這也顯示移工本身能夠站在移工的角度設計課程跟能切合到移工的需求，

移工幹部能夠完全去規劃組織和安排的活動，無疑是會增加移工的積極性。組織的領導或幹部就非常清楚活動或課程的目的，能夠把自己的落實，有機會去嘗試不同實踐的方法和可能。可惜的是，移工屬於被迫流動的身體，往往來不及把這個經驗傳承或帶領其他移工一起經歷行動的過程，時間一到就要離開。完全沒有經歷過培訓或參與的新手幹部，又必須再重新培訓幹部。回到母國的幹部，卻不因此而停頓或脫離組織，仍然參與母國的移工組織或者又再次出國到海外工作，繼續延續移工抗爭。

ATKI-Taiwan 的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組織者提供各種的支援與協助，讓 ATKI-Taiwan 本身能夠擁更多的能力進行組織工作，把移工運動的理念和意識形態教育給更多的群眾。這是透過跨國草根移工運動建立組織之間的信任基礎上，組織對組織工作擁有同樣的原則與理念；注重組織群眾，主張以教育方式發展移工的政治醒覺，ATKI Taiwan 因此獲得外來的力量而逐漸的發展起來。

³¹我曾經跟 ATKI-Taiwan 的幹部討論關於活動地點，為何不能像香港一樣在公園上課。最後我才意識到公共空間進行活動對移工來說是不自在、沒有安全感、會感覺到不安。

對於社會運動來說，組織的力量必須來自於運動的主體，也就是來自於移工群眾的力量。由移工本身的積極性去推動和策劃，比起外來者反而讓組織工作變得更有意義。移工從不同的行動中被啟蒙，經歷了「轉變」，而在下一個行動更往前推進。移工主體化的形成也不是一次就達成，而是經過多次的抗爭與行動，對議題的深化和理解，經過政治教育，讓他們看見了其他命運的共同體，共同抗爭。

第三節 弱勢發聲

3-3-1 處理勞資爭議

移工本身瞭解自身的權益後，更重要的是能夠站出來協助其他的移工，而協助移工瞭解權益，以及協助移工申訴是 ATKI-Taiwan 重要的組織工作之一。

ATKI-Taiwan 採取的方式是從經驗中學習理解台灣的法規和勞動權益。

尤其是多數組織幹部們曾經經歷被剝削、被欺壓，面對惡劣的勞動處境時卻無法獲得援助。最後透過組織的協助及鼓勵，勇敢站出來進行申訴改變自身的勞動處境。ATKI-Taiwan 的組織者與同鄉移工之間分享有關勞動權益的資訊並且提供諮詢，協助有需要的同鄉。因此，不斷的努力探究和瞭解勞動權益的法令以及移工政策是組織夥伴們重要的功課，除此之外他們還必須瞭解各個行業的勞工環境和特性。

「我們從我們自己身上以及其他同鄉的經驗中學習，當面對問題，尋找解決辦法，而這些解決問題的辦法成為我們的學習。所以處理個案是非常重要的，是我們的學習，也是我們提供給別人的教育。每當我們處理一個個案，採取的方法

和策略有用的話，我們就可以分享給其他夥伴。」(訪談 AT20150704)

過程中，他們逐漸瞭解作為台灣外籍勞工所擁有的權益，以及勞動法規的保障。由於接觸個案的數量越來越多，移工也學習書寫記錄；透過個案轉述勞動處境、或者事件的經過，能夠快速、準確的蒐集申訴案件所須具備的相關資料。相較於 2011 年筆者剛接觸 ATKI-Taiwan，在嘗試協助處理個案時候就只能從 ATKI-Taiwan 得知個案勞資糾紛的大略情況，如需進一步詢問則透過 ATKI 幹部再去與個案做進一步的資訊。後來，我們累積到一些經驗後，幹部就會開始做文字記錄，把個案的勞動處境和事發經過用文字記錄下來。幹部和會員就會依據記錄進行個案討論，並且學習總結經驗。有時候，移工幹部也會要求向組織求助的同鄉自己寫下陳請書，訓練個案透過書寫以瞭解自身的處境，同時也能夠得到更全面、準確的訊息。以下筆者試圖以三個個案來說明 ATKI-Taiwan 服務個案的方式，以便能夠具體的呈現移工的能力和局限。

個案（一）

ATKI-Taiwan 曾經處理過一宗人口販運的案件，Minal 來台前被告知從事看護的工作，但是來到台灣後卻又被告知被照顧的阿公仍健朗不需要看護，而被仲介轉去從事務農的工作。有次，仲介為了躲避移民署的查察，把 Minal 轉回原本雇主家，這時 Minal 才發現在田裡工作的老闆並非他真正的雇主。他向仲介提出轉換雇主的要求，被仲介惡意丟棄，並告知必須自行找工作。Minal 在 Atin 的建議下撥電 1955，發現他已經變成逃逸外勞的身份。Atin 除了致電給印尼辦事處以外，還在網路上留言要求印尼辦事處介入，都不得要領。最後，Atin 陪同 Minal 到印尼辦事處，Minal 才有機會陳述他的經歷。最後，被認定為人口販運受害者，接受庇護。在庇護期間，Minal 也非常積極地參與 ATKI-Taiwan 的活動。

個案（二）

一名基隆的漁工 Agus，數次要求更換雇主後被仲介惡意丟棄在路邊，馬上被查察人員逮捕而被關進收容所。該名漁工在收容所後，輾轉獲得 ATKI-Taiwan 的聯絡方式後致電給 Atin，最後 Atin 強力建議他向收容所提出他被仲介惡意丟棄一事。由於 Agus 不諳中文，最後由筆者代為與基隆移民署溝通。數天後，移民署調查此案，Agus 也成功被轉去 TIWA 庇護中心。

個案（三）

Rofiah 剛到台灣才一個星期，在雇主家打掃時不小心跌斷了腿後躺在醫院，完全沒有手機可以向外界聯繫。一名在醫院的移工看見她可憐，聯絡 ATKI-Taiwan。ATKI-Taiwan 寫了正式書函給印尼辦事處，要求出面處理，並且用網路替當事人詢問有關印尼的保險費一事。

總的來說，ATKI-Taiwan 服務個案的模式，多數是提供諮詢、寫信到印尼辦事處施壓，以及把個案的經歷進行記錄的工作。

「我們（移工）的時間不自由，我們無法直接到現場，但是我們先做記錄，之後再來申訴或者轉介給可以到現場處理的夥伴，像我交給你³³，你直接去處理。或者交給印辦，要求印辦去處理。因為我時間有限，無法出門親自去處理。」（訪談，AT20120112）

Atin 認為以她的勞動條件和能力來看就只能做到記錄個案，提供諮詢的方式。這樣的模式，雖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她認為也是一個方法。「這就是我的方法，在協助個案上有些我們會成功的，有些失敗，我們從這個過程中去學習。不過，這也是要視對方的狀況，有些很害怕申訴，沒有自信；也有些個案比較勇敢。」（訪談，AT20150704）

³³ 指筆者。

ATKI-Taiwan 有時會接到從印尼來的案子委託 ATKI-Taiwan 協助處理，例如：替遭受職災或意外死亡的個案家人索取補償，回國後追討薪資、或者需要親人被關在收容所需要協助等個案。

ATKI-Indonesia 曾經轉介一個職災的案件，一名印尼家庭幫傭在台灣雇主家被燒死，也獲得職業災害補助 30 萬新台幣以及慰問金 10 萬新台幣，其家屬卻只獲得 20 萬新台幣左右。ATKI-Indonesia 透過 ATKI-Taiwan 的協助查詢扣款明細，並且為死者家屬爭取該有的權益。最後發現有各項不合理的扣款，包括：冥紙、屍體防腐以及一些運送費用等等。最令人無法接受的是，死者是回教穆斯林而殯儀社竟然收取高達 6 千塊新台幣的冥紙費用。ATKI-Indonesia 想進一步替死者家屬提出告訴，控告兩國的仲介，但是在法律程式上需要授權書，如要打跨國官司，單單是準備文件都已經不相當不容易，還要經過台灣駐印尼辦事處的驗證手續需要由律師發出真是信函以及支付昂貴的費用。在台灣 ATKI-Taiwan 缺乏處理類似案件的經驗，也找不到施力點，最後死亡家屬在被迫的情況下收下僅剩的 20 萬新台幣，為這個案子劃下了句點。

縱然，案子並沒有爭取成功，卻一次次曝露印尼政府和駐海外單位並沒有實質保障海外國民，以及印尼政府在移工政策上任由仲介以合法代理人的身份把持、侵佔或巧立名目趁機牟利。

ATKI-Taiwan 在處理個案的實務工作上還是會面對障礙。首先，大部分的組織成員都來自於台北，其他縣市較少，然而往往案件都是集中在其他縣市，如宜蘭、台南等地區，幹部能夠提供的服務非常有限，無法自由行動的移工組織者或幹部只能扮演諮詢的角色，透過臉書、手機提供諮詢的服務，無法親自陪同參與

協調個案調解的過程，因而無法全面、直接的獲得資訊並歸結出案子的性質或勞資協調會上應該採取的策略。

在特定的個案，組織幹部並不滿足於只是停留於討論的階段，經常渴望能夠獲得更多的參與與介入，但是在客觀條件下，ATKI-Taiwan 在台灣累積的資源不多，加上個人工作勞動條件的限制，移工組織經常處於難以發動行動的狀態。

除了移工主動尋求協助的服務個案工作以外，ATKI-Taiwan也針對一些特定的案件進行介入。例如：漁工爭取廢除膳宿費³⁴、重度昏迷不醒的 Uu³⁵。即便面對行動不便的問題，ATKI-Taiwan 仍然在能力範圍以內參與這些個案。在行動策略上都會詢問和徵求ATKI-Indonesia和ATKI-HongKong的經驗。

ATKI-Indonesia 的資深幹部經常鼓勵台灣的幹部們必須經常接觸各種各樣的案件，靠著一點一滴在過程中累積經驗，就算很難或沒處理經驗的個案也要給予協助。ATKI-Indonesia 的組織者 Iwenk 說：「我們就是要學習，學習之後我們就會懂得這麼做了。失敗沒關係，最重要在做的過程中，我們才會知道案子為什麼會不成功。」在服務個案的過程中，讓個案能夠長出力量，勇敢站出來申訴或面對與雇主、仲介的勞動糾紛。透過組織意識的培養以及支持的網絡，慢慢轉化形成的勞動意識。

3-3-2 組織文告

台灣的客工體制使得外籍移工是處於社會的最底層，是沒有政治權力的一群，也相對缺乏發聲的管道。當權者的各種政策輕易影響和決定移工的生存問題。然而，移工組織不同於一般民間團體能夠直接反映他們的心聲，他們沒有擁有太多

³⁴ 詳細內容請見第四章。

³⁵ 同上。

的管道發聲、表達意見、訴說他們的處境。在台灣受到法令的限制，以及移工本身的條件有限，ATKI-Taiwan 較難像 ATKI-HK 那樣動員群眾到印尼領屬館前抗議或組織大遊行。移工組織無法直接參與或對台灣相關單位的對話、表達看法與立場，唯有透過台灣媒體與台灣社會，或與母國政府進行對話。ATKI Taiwan 以投書與文告作為集體發聲的媒介，以書寫的方式提出訴求，試圖引起台灣和海外社會的關注。

ATKI-Taiwan 提供新聞給多家台灣的印尼語雜誌以及印尼的網絡媒體平臺。例如：IndoSuarra、Holiday、Intai、BMI Times，以及由台灣的《四方報》，印尼網絡平臺Sumber Daya Buruh Migran³⁶則提供了書寫空間。各方積極的邀稿讓移工可以維持每個月進行寫作。ATKI-Taiwan把部分所接觸到的個案在台灣的遭遇或者一些議題進行報導，以突顯印尼國民在台灣遭受不公平的處境。移工擁有書寫的技能，成為ATKI-Taiwan建立論述、深入議題的一項重要元素，建立發聲、表達意見的管道。台灣印尼雜誌和公民新聞網站都是ATKI-Taiwan鍛煉討論、交流公共議題的平臺。

2011-2013 年 ATKI-Taiwan 文告

序	日期 Tanggal	Issue 議題	Penyataan Sikap 文告聲明
Tahun 2011 2011 年			
1.	Oktober 10 月	pembuatan ataupun perpanjangan	Dialog di KDEI :Berikan Perlindungan Sejati bagi BMI! Bukan pungutan Liar! 印辦對話會後聲明

³⁶印尼移工資源中心(Migrant Worker Resource Centre)，印尼非政府組織的媒體平臺，集中各國移工訊息、並且建立移工社群網絡、討論空間，互相交流訊息，擴大移工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該組織也會提供線上教學，用 google 共同協作的方式進行指導。

		paspor , KTKLN dan lain-lainnya 護照費用和苛扣薪資	稿：給予印尼移工保障。
Tahun 2012 2012 年			
2.	Maret 3 月	rencanaan Pemerintah menghapus Upah Minimum 最低薪資脫鉤	Tolak Penurunan Upah TKA 拒絕外勞最低薪資脫鉤
3.	April 4 月		Kami Butuh Perlindungan Sejati 我們需要保障
4.	May 5 月		Peringatan MayDay ,2012 Berikanlah Perlindungan Sejati Bag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BMI)勞動節，給予印尼移工真正的保障
5.	Desember 12 月	Menolak biaya penempatan yg tinggi 仲介費	Berikanlah Perlindungan Sejati, Kami butuh Bukti Bukan Janji ! 給予保障，我們需要（行動）證明而不是空頭允諾
Tahun 2013 2013 年			
1.	Maret 3 月	Tolak Kerja Keras, Gaji Rendah (PRT)拒絕過勞，與低薪	Peringatan Hari Internasional Perempuan 國際婦女日
2.	April 4 月	Menolak Overcharging 拒絕超收費用	Hapus Biaya penempatan Yang sangat Tinggi (Overcharging)dan KUR bukan Jawaban atas Overcharging!取消仲介費
3.	April 4 月	Gaji PRT dan menolak persyaratan baru dr KDEI 家務工薪資，反印辦面談新規定	Hapus Semua Persyaratan Yang mempersulita Kontrak Mandiri, Realisasikan Kenaikan Gaji Untuk Semua PRT Sekarang Juga 落實家務工調漲薪資
4.	Juli 6 月	Menolak KTKLN, Overcharging dan menuntut naik gaji PRT 拒絕海外國民年卡，超收仲介費，調漲薪資	Menyikapi Berita Atas Dukungan Juhur Hidayat Konvensi Capres, di Kiatkan dukungan 10,000 TKI Taiwan & Pembinaan Penempatan TKI ke Taiwan.反駁 1 萬台灣移工支持 Juhur Hidayat 總統候選人論壇
5.	Julai 7 月	Menolak Potongan gaji ABK 反對苛扣漁工薪資	Segara berlakukan Penghapusan potongan upah atas nama biaya makan dan akomodasi ABK Indonesia di Taiwan ! Tindakan tegas agensi yang

			masih menberlakukan pemontongan upah uang makan dan akomodasi ABK Indonesia! 立即廢除苛扣漁工膳宿費
6.	November 11 月	Asia Migran Dialogue 亞洲移工論壇	Pentingnya Buruh MIgran di Taiwan Berjuang Menuntut Perlindungan dan Kesejahteraan. Bangkit Berjuang Melawan Penindasan & Kembalikan Hak-hak Kami! 台灣移工爭取保障與福祉。站出來抗爭對抗壓迫和爭取我們的權益
7.	Desember 12 月	Hari Migran Sedunia 國際移工日	BMI Taiwan Berbersatu dan Berjuang Menuntut perlindungan dan Kesejahteraan! 在台印尼勞工團結和爭取保障與福祉
Tahun 2014 2014 年			
1.	January 1 月	聲援印尼女傭被雇主虐待案件	Menuntut Keadilan ERWIANA,UUL dan Seluruh BMI 外籍勞工也是人！為 ERWIANA,UUL 及所有印尼移民工爭取公義

製表人：筆者

移工權益的議題是否能夠引起基層的關注，首先必須讓資訊平衡，移工獲得充足的資訊，是組織移工必要的工作。當有某些移工相關議題發生時，筆者就會把資訊，尤其是台灣中文媒體針對移工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轉譯讓移工能夠瞭解，帶到組織內部討論，再由組織幹部集合各方的意見，最後討論出組織團體的立場。組織幹部就會撰寫文告親自撰寫印尼語的文告最後筆者再轉譯到中文。

2012 年 12 月 14 日，駐印尼台灣辦事處(TETO)及駐台灣印尼辦事處(KDEI)在巴厘島的會議上表示雙方同意回聘台灣印尼家務工的薪資調漲為新台幣 18,780，以及外籍漁工簽署更有保障效力的合約、禁止從薪水扣膳食費、加強聘僱需求的文件驗證、篩選營造業勞工的聘僱需求等幾項協議。2013 年 1 月印尼

(BNP2TKI)JumhurHidayat³⁷向印尼媒體宣稱該部門順利讓各國家務工薪資調漲，包括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海外勞工薪資³⁸。在台灣勞工的最低薪資，從 15,840 台幣調漲到 18,780 台幣。許多移工開始到處詢問此事是否真實，是否已經落實該項措施，而ATKI-Taiwan一方面打聽移工的狀況，一方面保持觀望的態度。一直到 4 月，印辦突然針對直接聘僱印尼家務工的雇主必須親自到印辦面試，隨後將被要求比照自聘提高家務工的薪資³⁹的措施。此事在臺灣媒體上報導後，ATKI-Taiwan的幹部馬上進行討論並且收集移工社群對於這個課題的想法和反應，發現大部分的移工聞訊調漲薪資都感到雀躍。

ATKI-Taiwan 的幹部們從過去的經驗中靈敏地感覺該措施的弊端，也驚覺到需要進行討論並且嘗試在印尼社群提出對該項措施的質疑。這樣的敏感度是建立在日常組織工作，經常對議題的關注和分享資訊，分析議題的基礎。尤其是擔任家務工的幹部們非常快速總結出措施的幾個重點以及帶來的後果，包括：台灣雇主的處境、直聘與非直聘的差別待遇可能將導致雇主以直聘方式聘僱的意願減低、調漲薪資應該納入政策全面執行而不是依照國籍而有些差別待遇等等。

Renai：「我也是有菲律賓朋友，為什麼只有印尼人有而他們沒有，這是很不公平的。即便我是直聘的，我可以調漲薪資，但是我也是要反對。」(田野記錄，20130425)

Diana：「調漲薪資如果回到勞雇雙方自行議定，那還是沒有用，對我們移工來說沒有保障。」(田野記錄，20130425)

ATKI-Taiwan對於印辦實行對直接聘僱家務工續約的新雇主進行面試並且以

³⁷該部門處長，但在 2014 年 3 月已遭到印尼總理 SBY-Boediono 開除。

³⁸新聞標題為：BNP2TKI 爭取調漲台灣、香港、新加坡家務工薪資。

<http://industri.bisnis.com/read/20130109/12/123225/gaji-tki-bnp2tki-perjuangkan-kenaikan-di-taiwan-hong-kong-singapura>

³⁹印尼喊話：印勞薪資比照基本工資，資料來源：聯合晚報苦勞網轉載

<http://www.cooloud.org.tw/node/73894>

印尼代表處單方面要求調薪的新措施，經過分析後站在反對的立場，透過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管道傳到台灣中文媒體並且獲得刊登，最後促使印辦暫停雇主面試的措施⁴⁰。

2013年，印尼接近總統選舉時，前任海外勞工安置暨保護局局長珠木胡（JumhurHidayat）也擔任總統候選人之一。該年6月，印尼媒體出現一則新聞，標題為：一萬名印尼出席在桃園的支持珠木胡（JumhurHidayat）總統候選人大會⁴¹。報導中還提到珠木胡曾為在台灣的印尼移工爭取多項權益和保障，例如：線上登記、移工保險、延長護照免收費、降低仲介費、家務工調漲薪資等多項政績⁴²。ATKI-Taiwan的幹部們看到這則新聞時都覺得非常憤怒，認為珠木胡在新聞中提到各種改善政策並非事實，批評對方試圖欺騙大眾。ATKI-Taiwan認為，其在任職期間ATKI-Taiwan也數次在他到訪台灣時呈交備忘錄要求母國關注台灣移工的處境，卻多次不得要領。文告中不但表達組織對母國的海外勞工的制度感到失望，同時一一反駁新聞中提到海外勞工安置暨保護局的政績，而且指出最讓人詬病的海外勞工安置暨保護局制定的強制性保險——海外國民卡（KTKLN），無法實質保障移工的權益，而ATKI-Taiwan與其他國家的組織夥伴們積倡議廢除該項措施。ATKI-Taiwan的一名幹部出席當天的活動，但是現場只是一般歌唱活動，完全沒有任何告示表示該項活動就是總統候選人大會等字樣。經過一輪的詢問，確認訊息的真實後明顯顯示珠木胡的新聞是對海外移工之名撈取政治利益，發表一篇「別為了政治利益利用台灣印尼移工」⁴³的新聞稿，要求母國媒體對新

⁴⁰最後改由職訓局以電話訪問的方式詢問雙方是否有仲介介入，收取額外費用；如有可疑案件將交給地方政府查察。

⁴¹ ATKI Taiwan 的幹部認為這是一則不實報導，現場除了並非如報導指出擁有 1 萬名移工出席，當天的活動只是演唱會，並非總統候選人造勢活動。ATKI Taiwan 認為，Jumhur 利用移工的名義故意製造台灣移工支持 Jumhur。因此，特別發出文告聲明，呼籲媒體針對以上報導進行查證和修正。

⁴²10.000 TKI TaiwanDukungJumhur IkutKonvensiCapres，

<http://www.tribunnews.com/nasional/2013/06/20/10000-tki-taiwan-dukung-jumhur-ikut-konvensi-capres>

43刊登於四方報印尼語版 2013 年 7 月第 21 期，以及台灣印尼語雜誌 BMI Times 2013 年 7 月第

聞作出事實的查證。

這樣的經驗並不是憑空得來，而是經過一段訓練的過程；曾經受過草根組織訓練、擁有較高政治意識覺醒和組織經驗的ATKI-Indonesia的夥伴，經常協助ATKI-Taiwan撰寫對外發表的文告，時時給予意見和參與討論。

組織文告中也開始出現批判帝國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等語彙，把移工的處境連接到的全球發展脈絡。

「摘文」

「Indonesia adalah Negara yang kaya raya dengan sumber daya alam dan sumber daya manusia, akan tetapi kekayaan tersebut dirampok oleh penjajah asing (Imperialisme) melalui pemerintah dalam negeri sebagai kaki tangannya. Agar terhindar dari kehancurannya karena krisis saat ini mereka semakin mengintensifkan penindasan dan penghisapannya terhadap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 」⁴⁴

「譯文」

「印尼是個天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富饒國家，但是其豐富資源卻遭到外來殖民者（帝國主義）透過國家當權者作為幫兇來進行掠奪。資本家為了把自己從全球危機中解救出來，進一步壓迫和從人民身上榨取利益。」

ATKI-Taiwan 的幹部從對基本資訊的掌握，以及深化本身對議題的理解，揭露移工真實的處境。ATKI-Taiwan 相對其他的印尼移工組織積極地回應移工政策與議題，並且在相關課題上爭取發言權。組織幹部經常集體討論，訓練出移工能夠對群眾對話的膽識。移工們也更加全面的認識事物的互相關聯，逐漸建立對事

24 期。

⁴⁴刊登於移工網絡資訊中心 Pusat Sumber Daya BUruh Migran , <http://buruhmigran.or.id/2011/11/07/undang-kdei-atki-dialogkan-persoalan-tki-taiwan/> , 全文請見附錄三。

物抽象思考，以及度客觀事物的具體分析，而不只是片面或表面上的認識。這樣情景脫離以往個人情緒式的吐槽、認為無法改變處境的悲情，進而轉向客觀分析。幹部之間的對話與討論，共同建立了集體的認知世界，對自身權益的表述。一些議題的推展和演變並非全然單靠組織的的推動，一定程度發生於事件偶然發生，移工對議題深化的認識，也建立在組織內部對議題的積極性討論和重視，採取主動「介入」的態度。

論述的生產過程，就是一場自我教育與教育群眾的工作。這個經驗讓移工能夠對整體結構客觀、理性的思考與分析，也體會到政策的實行對自身帶來很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聲音和意見能夠被聽見，並且產生影響。

3-3-3 網路媒體

外籍勞工在被分割及封閉的環境中，缺乏社會網絡跟難以獲得有關勞動權益的正確資訊，而手機成為了移工與母國家庭保持聯繫、獲得保護以及建立社群、增強社會連帶關係的重要工具。資訊的流能夠讓移工更容易瞭解自身的權益並且催化政治意識的覺醒，形成一股潛在積極的力量。ATKI-Taiwan 使用網路和國外的運動夥伴保持聯繫，經常互相交換訊息，進行會議或討論議題，而 ATKI-Taiwan 也經常吸收他們過去的抗爭經驗。

網路也是 ATKI-Taiwan 接觸群眾、教育群眾的媒介之一。2012 年印尼總統 SBY 政府宣佈調漲燃油價格，ATKI-HongKong 以及印尼國內的團體分別舉辦抗議遊行。ATKI-Taiwan 的組織狀況尚無法動員群眾進行集會、抗議行動，但是大家覺得還是需要表達反對的聲音。經過討論後，他們把手拿反對燃油漲價的標語的照片貼在臉書上抗議國家政策。標語包括；

(原文)「SBY rezmin Anti rakyat, SBY boneka Amerika, Kami Manusia, Kami tak sudi kauperas, Kami tak sudi kauTindas」 (譯文)「SBY 政權違背人民, SBY 是美國的傀儡, 我們是人我們不願意被你如此掠奪, 我們不願意如此被欺壓。」

(原文)「Kami BMI Taiwan Menolak Kenaikan BBM karna Potongan 9 bulan yang mencekik」 (譯文)「我們台灣印尼移工反對燃油漲價, 因為被 9 個月的仲介費扣款掐得透不過氣來了。」

(原文)「BBM selalu naik Gaji PRT gak pernah naik」 (譯文)「燃油價格一直漲, 但是外籍家務工的薪資卻不曾漲。」等等。

為了讓組織能夠不斷的運作, ATKI-Taiwan 不斷的發掘議題, 但並不是每個議題都能夠引起移工的反應。什麼事件能夠對移工來說是個議題? 筆者從他們身上發現只要是公共性的議題以及移工關心的就能夠引起大家積極的討論, 也才能促使出現行動的可能, 而所採取的行動必須是在移工能夠做到的範圍內, 才能保持組織的積極性。例如: 爭取外籍家務工調薪、出入境必須申請海外國民卡等, 反而像組織內部必須舉辦什麼列常活動, 成員們都不太有興趣進行討論。

3-3-4 「對話」作為抗爭

移工自身的抗爭過程當中與政府「對話」是移工體現個人主體。ATKI Taiwan 從接觸個案或親身的經歷加深他們對體制、國家以及政府的認識, 更深刻瞭解到體制對他們如何的壓迫、排除移工的權益。

ATKI-Taiwan 針對多項議題多次與印辦舉行對話會, 與印尼辦事處官員面對面進行詢問。印尼組織者 Ipang:「如果只是個人與官員對談, 群眾就無法了解資訊, 我們必須把時間公開讓群眾看到問題。移工本身也有自己的政治權利, 他們能夠為自己爭取保障。」(訪談, IP20131208)

2011年ATKI-Taiwan邀請印尼辦事處處長Harmen Sembiring以及負責勞動事務的Sri Setyowati親自出席，針對印尼政府實行更換晶片護照，使得許多無法親自到印辦辦理電子護照的移工必須委託仲介，而仲介又從中牟利的問題⁴⁵進行對談。ATKI-Taiwan譴責這個新措施反而讓仲介有機可乘，而印辦也表示無法制止或介入仲介收取費用，印尼官員針對移工提問的問題都是表示：「會進一步再研究」、「再去瞭解」等藉口來推搪。而當漁工Irman提出有關印尼仲介收取保證金，而當移工做滿合約回國後該筆保證金卻不再還給當事人。當時後，印辦還理直氣壯表示，其單位只是處理台灣事務，並不處理印尼或印尼仲介的相關問題。

在對話會時，Atin代表ATKI-Taiwan念了一大段聲明稿，強力批評印尼辦事處。「印尼辦事處提供國民很差的服務，作為駐國外的代表處對待國民卻猶如貿易。而這次延長護照的機制就是把服務當作賺錢的手段之一。國家領導層不曾保障我們這些海外勞工，以至於政府官員或低下的部門也如同他們一樣不會理會海外勞工。如駐外代表處糟糕的服務已經讓海外國民見怪不怪了」⁴⁶。

對ATKI-Taiwan來說，與官方對話能夠讓他們瞭解更多資訊，而來親自諮詢官方也可以讓群眾看到官方的處事態度。ATKI-Taiwan的幹部不只是在公開場合與官員對話，每當印尼官員來訪台灣時，他們都會派代表呈交備忘錄。

Atin：「我是很厚臉皮的，就算他們沒有邀請我們的組織進行交流，但是為了傳達台灣印尼移工的心聲，我都是要出席呈交備忘錄，給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裡的處境。」

⁴⁵印尼辦事處無法到台中、台南以及台灣其他縣市地區提供更新護照的服務，仲介處理代辦的過程中，收取高達6千塊台幣，比原本的300塊台幣高出很多。

⁴⁶ ATKI-Taiwan 印尼語文告 2011年10月30，請見附錄三。

Lukman 曾經針對超收仲介費一事，特別約訪印尼辦事處負責勞工事務的代表 Sri，詢問為何印尼政府把關審核支付仲介費明細，卻依然存在超收仲介費的問題。Lukman：「我的目只想搞清楚事情，要不然我們不曉得事實的真相。」筆者試圖告訴他沒有準備的諮詢很有可能被一堆的藉口打發而已，而且從過去的經驗和常理推斷印尼辦事處對此事也無法拿出什麼辦法解決。但是他語氣相當堅持：「我就是想知道，就只是這樣。」

對ATKI-Taiwan來說，對話是行動的其中一個階段，移工議題必須被拿來公開討論才能引起其他移工的共鳴，計劃進行下一步。正當我們討論有關 GORBUMITA⁴⁷ 移工聯盟與印尼辦事處的對話會時，Lukman說出了對行動的期許：「我們這次用對話的方式，不斷與印尼辦事處溝通，如果真的不行，我們也可以名正言順告訴群眾政府不理會、也不處理我們的問題，最後我們就叫大家在印尼辦事處前面抗議。即使是人數少也沒關係。」

數十個團體成立的GORBUMITA首次串聯，與官方代表進行的對話會。對許多團體來說，這也是他們第一次舉辦政治性活動。聯盟派出發言的代表，針對工作領域議題、勞動制度以及勞動條件等問題向印尼駐台辦事處官方代表進行提問。現場，移工自主團體的代表不斷針對官方的回應進行反駁和批評、大聲厲喝政府官僚的不負責任。即使有些團體對這次看起來沒有結果的對話會加上一些夥伴的「出賣」感到氣餒（許家雋，2014：66），ATKI-Taiwan卻馬上投入處理後續的工作，把對話會的過程變成文字記錄。當然，這裡並不是指ATKI-Taiwan比較厲害，而是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和態度，因此對於行動的認同層次也不一樣。

移工不斷逼問官方單位的過程中，不斷聲討官方單單位，向官方單位施壓應

⁴⁷ 全名為 Gabungan Organisasi Buruh Migran Taiwan，中文譯名為：台灣移工組織聯盟。

該更積極的與台灣政府協談。移工發聲的那一刻，反轉了被宰制的位置，從屬關係產生了變化，他們不再是被動的忍受政策對他們的被宰制，而是作為公民的角色，對國家政策和措施進行批判，表達他們的意識，展現公民權利。ATKI Taiwan 對於政策進行批判的介入，揭露事實的行動，並且教育群眾，改變群眾的意識。移工與官方單位的對話會，就是公民權力的展現。如同 Paulo Freire (2003) 所言：「所有人們都可以發展出來其對於存在世界之方式進行批判與覺察的力量，而他們正是以此力量並且在這個力量中去發現自己；他們開始不再將這個世界當成一種靜態的現實，而是當成一種不斷進行改變之過程中的現實。」

移工與官方一次又一次的對談行動，透過**檢視社會情境與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經驗**，重新檢視客觀社會權力關係；「從求助的姿態」到對自身的處境產生客觀意識，創造出覺醒意識，能夠批判認知到他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關係，逐漸長出翻轉的力量。

第四節 集體行動

4-1-1 文化抗議行動

一、一億女性站出來

2012 年 ATKI-Taiwan 也跟進香港的移工團體，參與全球一億女性反對女性暴力的快閃行動，以舞蹈的方式宣傳反對暴力。許多擔任家務工的幹部和會員一無法每週休假，所以我們原定呈現的快閃行動舞蹈，也只能在一個個月才休假一次的機會中擠出練習的時間；12 月提出的計劃，直到 5 月才有 2 次的練習機會。由於休假時間有限，ATKI-Taiwan 和菲律賓的國際移工在 3 月的國際婦女節的紀念活動中才有機會呈現。2013 年，ATKI-Taiwan 對這類的快閃行動也比較有概念，同樣主題的倡議行動，也讓筆者不必再去跟幹部和會員解釋活動內容，大家很快

達到共識，並且自行練習。

ATKI Taiwan 和移工國際台灣分會把活動名為「億起為移工爭取公義行動」(One Billion Rising Justice For All Migrant Workers) 傳達反對暴力與剝削、缺乏保障的勞動處境的訴求。活動前幾天，許多幹部都臨時有事無法參與，計算一下出席人數應該不到 20 位，筆者不禁焦慮起來，也開始思考到底要不要發媒體採訪通知。後來心想還是算了吧，有事大家一起承擔，之後再檢討就好了，如果大家能夠從中學習到教訓也是好事。筆者還是徵求會長 Lukman 擔任快閃行動的主持人，而他到了車站也是一副沒自信的樣子，畢竟大家不曾參與類似的行動。最後，菲律賓移工也拉大隊到場，一些台灣聲援團體也在現場協助，讓在場的幹部增加了一些信心。擁有豐富經驗的勞權會秘書長王娟萍也開始給予我們一些建議，Lukman 拿起麥克風後，菲律賓、印尼移工就一起呈現舞蹈快閃行動，最後高舉著「JUSTICE」的字眼，引起周圍的移工圍觀，也拿起了手機狂拍。

二、舉辦大型文化活動

組織除了舉辦例常性活動以外，也舉辦一些重要的紀念節日，例如：國際移工日、五一勞動節、Kartini⁴⁹日、國際婦女日等等。移工們在歡慶這些節日時也認識這些節日的由來，以及這些紀念勞動階級以及女性的抗爭歷程。

ATKI-Indonesia 在這些特定的節日都會寄一份活動企劃書讓 ATKI-Taiwan 參考，裡頭除了記載節日的由來，更重要提到印尼過去如何紀念這些節日，緊緊扣連印尼的政經發展歷史、政策以及勞工抗爭歷史。這些文件就會讓 ATKI-Taiwan 的幹部們傳閱。移工們籌備活動歡慶與紀念這些節日，更主要連接教育工作，提高移工勞動權益意識，也是對外擴展聯絡網與宣導的媒介之一。台灣五一勞動節的遊行，ATKI-Taiwan 從不缺席，拿著自己製作的大字報上街去。

⁴⁹ Kartini 日是印尼紀念一名名叫 Kartini 的女性，她極力爭取女性受教育權。

除了遊行，ATKI-Taiwan 也嘗試過舉辦大型文化表演活動。2013 年 ATKI-Taiwan 嘗試自行舉辦紀念 Kartini 日的活動，試圖連結其他移工團體之外，也希望文化活動可以比較有抗爭意識、比較政治性。ATKI-Taiwan 的幹部自己寫企劃書募款，租借場地搭帳篷、租借巴士把人從臺北接到台中出席活動。爲了這場活動，自己做話劇、舞蹈、還有詩歌搭配行動劇。有別於官方單位或其他團體只爲了讓女性穿上漂亮的傳統服，在臺上走臺步，或只是邀請歌手在舞臺上唱歌，ATKI-Taiwan 在舞臺上呈現制度對移工的壓迫，以及控訴政府的政策等等。這場活動吸引了數百人出席，移工幹部 Sari 很自豪的說：「就算沒有印辦，我們移工自己也可以辦得到。」

4-1-2 第一次自主發起的集會

很多時候，移工組織處於**被動抗爭**的狀態，組織幹部面對日常生活的組織工作，維持例常性的活動和聯繫，只有在特定的時候移工的積極性會容易被激發出來而形成**積極抗爭**狀態。當香港發生印尼幫傭 Erwiana 被虐事件時，ATKI-HongKong 很早就介入處理；當天收到一封來自香港的簡訊內容是尋找一名在機場傷痕累累的印尼同鄉的相關資訊、包括在印尼家人的聯絡等等。隔天，就受到消息，ATKI-Indonesia 已經在機場接到從香港返回印尼的 Erwiana 並且確定她長期被雇主虐待、最後惡意遣返一事。此事被揭露後，香港的 AMCB 和 ATKI-HongKong 大型動員的為 Erwiana 爭取權益，數千人遊行上街以及一連串的抗爭行動，Erwiana 事猶如一顆炸彈在香港爆發開來，也受到全球的矚目。ATKI-Taiwan 也進行聲援行動，積極的討論、進行聲援的行動，並且在網路上動員移工參加。這是 ATKI-Taiwan 第一次自己舉辦抗議行動。

這時，印尼STAGAS⁵⁰ 的臉書上出現一則名叫Uul的台灣外籍家務工疑似被雇

⁵⁰該工作隊成立於 2012 年，由旅台的印尼籍大學生、移工自主團體的幹部/領袖以及印尼辦事處

主虐待導致重度昏迷入院的貼文，說明Stagas處理Uul案件的過程以及介入處理後的結果。Uul事件，原本是Stagas或印尼辦事處的政績之一。但是，移工對比在香港鬧得滿城風雨的Erwiana和Uul事件，就發現印尼辦事處並沒有積極地為Uul爭取該有的正義，反而以「息事寧人」的態度來處理，而引起印尼群體的憤怒。

ATKI-Taiwan 組織者 Lukman 在群組粘貼一則 ATKI-HongKong 如何處理 Erwiana 案件的過程，表示香港移工組織公開處理 Erwiana 個案的處理手法以及所採取的行動，向群眾說明一切，反觀印尼辦事處在處理台灣案件時遮遮掩掩，私下了事。Lukman:「夥伴們處理個案非常步驟交代得非常清晰，但是印尼辦事處又如何處理 Uul 的案件。」

香港和台灣發生移工遭到雇主嚴重虐待的相同命運，但是台灣的移工卻無法獲得正義，香港移工團體舉辦聲援 Erwiana 的大型遊行，觸發移工想站出來的念頭。ATKI-Taiwan 的一些幹部對 Uul 的遭遇覺得憤慨，認為應該像香港的移工一樣站出來為在台灣的移工發聲，讓台灣社會也能看見 Uul 的遭遇以及能夠得到伸張正義的機會。即使在網絡群組許多移工對此事表示憤怒，甚至有些表示應該上街抗議，但是像 ATKI-Taiwan 真正訴諸行動的組織或移工少之又少。

線上開會時，Lukman 問大家：「大家覺得要不要針對香港被雇主虐待的 Erwiana 移工舉辦集會？」

Atin:「我們可以做的為什麼不做呢？依我的想法，我們辦 1 小時的集會。我們把 Erwiana 的照片印成海報。」

Napi:「對我來說不用辦什麼大型的集會，我們在週日的活動當中禱告就可以了，畢竟這不是在台灣發生的事情。」

工作人員所成立，專門協助印辦處理移工的勞資糾紛等問題。移工多數在臉書上與工作隊的隊員們互動，或進行勞動權益的諮詢等。

Atin：「如果發生在台灣我們也希望其他國家的同鄉支持我們啊！如果我們只是在（閉門）活動中加上禱告，哪跟 OnAir（電話線上）的禱告有什麼分別？如果我們清楚自己的目的，我們無需害怕，因為這是為了爭取公平、正義……。」（黑體為筆者補充。）

Lukman：「那就直接 12 點開始集會，時間大概 15 分鐘，我們開場，說明集會目的，然後念出我們的訴求，之後集體禱告，結束。大家覺得這樣如何？」

Devi：「我們在台北車站大廳帶著訴求的海報抗議。之後我們可以向群眾募款。」

Lukmna：「那我們就一路往活動地點去的時候一邊向群眾募款。」（田野記錄 20130116）

ATKI-Taiwan 聲援 Erwiana 行動就轉成為 Uul 事件的抗議行動，幹部非常主動地討論行動的手舉牌口號、以及積極地蒐集 Uul 的資訊、瞭解 Uul 狀況的身邊朋友或家屬、過去的工作狀況、雇主的資料以及等等，希望能夠仿效 ATKI-HongKong 處理 Erwiana 案件的方式讓 Uul 案件也能夠對台灣社會的關注，並且對違法的雇主或相關人士採取行動。抗議行動當天，ATKI-Taiwan 的動員只有 15 位左右，移工站在臺北火車站廣場前進行祈禱，之後舉牌，高喊口號抗議。

行動的形成與決策過程，儘管強調集體討論和參與，以達到組織內部的共識，仍不免發現決策過程的快速，最後由組織領議決。這樣的過程忽略了對行動更細緻的討論和聘僱，尤其是對與動員與籌備工作，都是目前移工組織較難著力處。即便如此，這每一場行動都是 ATKI-Taiwan 自主自覺的現有的組織基礎上，在一些特定議題上，ATKI-Taiwan 還是能夠動員組織幾位核心的內部幹部共同參與抗議行動，並且對抗議行動的方式也有不同的想像。

小結

ATKI 的核心價值是改變不公義的現況，爭取移工權益的保障。ATKI Taiwan

的幹部或成員從自身的經驗體認到現有的體制並無法保障他們權益，只有透過集體的力量，才有改變的可能。他們在接觸不同的個案經驗中，發現自身的處境，並在這些具體經驗中慢慢產生批判的意識。

草根移工組織的參與者或都是每一場行動的主要角色，ATKI Taiwan 的夥伴學習動員和組織的工作，發現集體的力量，提升意識，建立批判意識的世界觀。ATKI Taiwan 透過各種文化活動把意識形態和移工抗爭傳達給其他的移工，試圖讓參與組織的成員都能夠從活動中找到發揮會培養自身能力的條件。群眾同時在實際參與組織活動的過程，從中獲取經驗、面臨考驗，逐漸成為下一個組織者並帶領其他群眾，進而培養更多組織者

第四章 自主移工組織結盟的契機與困難

第一節 不同國籍移工組織的合作

ATKI-Taiwan 也積極和其他移工團體合作，包括不同國籍的組織；其中與菲律賓籍的移工國際台灣分會(Migrante International- Taiwan Chapter, MIGRANTE)、台灣伊龍戈省移工協會(Migranteng Illongo sa Taiwan)較為密切。合作的形式也逐漸從文化表演活動慢慢轉到勞動議題的討論、以及一些集會抗議的行動等等。2012年，在APMM的協助下，在ATKI-Taiwan和菲律賓團體移工國際台灣分會、台灣伊龍戈移工組織首次合作國際移工日。由於第一次舉辦的關係，許多行政上的籌備工作都是由筆者來進行協助，而移工團體的幹部們則負責宣傳、動員和現場招待、場地佈置的工作。相隔一年之後，三個團體再次聯合舉辦國際移工日活動，並轉換成論壇的形式，討論在台灣的勞動處境以及關注的議題，包括產業領域的廠工和漁工，以及家務工或家庭幫傭。這次，三個團體幹部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必須在線上開會討論，對於活動內容和形式進行討論以及負責行政文書的工作。

移工平日都在各自工作地點，只有週末時間能夠外出，對於組織來說週末是接觸群眾的日子，必須到移工週末聚點進行活動或組織工作，不同國籍之間能夠互相交流的時間和機會可說是非常少。透過聯合舉辦活動，菲律賓和印尼籍組織之間打破空間的隔閡，聚集在一起瞭解交換訊息。菲律賓和印尼的移工團體也打破長期被隔離狀態，脫離過去只在同一族群的活動聚點，開始走進彼此習慣的空間。由於舉辦活動討論籌備工作需要進行開會，而開會地點有時選擇就會遷就對方選擇在中山北路的雙城公園、臺北車站以及228公園進行。

印尼組織幹部也看見和更瞭解菲律賓移工的處境；ATKI-Taiwan 的幹部也改變過去她們對於菲律賓籍家務工每週日都有休假、工作比較輕鬆的認知，而發現原來許多菲律賓籍家務工的勞動條件也非常差。有一次，ATKI-Taiwan 和移工國際台灣分部的幹部相約活動之後一同前往出席南洋台灣姐妹會舉辦的春酒，路途中一位菲律賓幹部接到雇主的電話要求馬上回去，無法與我們同行。一名印尼籍移工說：「我以為菲律賓家務工每個週末都能夠出來逛街、放鬆，她們的處境比我們好很多，原來不是這樣的。」

活動籌備過程，菲律賓和印尼移工組織經常互相支援和協助，有時候活動移工朋友迫不得已遲到、或無法把交代工作完成，大家都能夠體諒而不是相互指責。透過多次合作的關係，組織幹部之間也對彼此加深了瞭解；菲律賓籍移工 Sheila 經常讚歎在 ATKI-Taiwan 前任會長 Atin 的毅力，即使沒有休假但是非常積極投入組織工作。此後，菲律賓和印尼組織之間頻密的來往，互相分享資訊以及抗爭的經驗、相約出席抗議行動，並且互相聲援與支持的行動；例如，印尼辦事處發函要求雇主不得扣除膳宿費，菲律賓團體也一起加入簽名聯署的行動，而菲律賓團體發起為颱風募物資，印尼團體也加入協助。另外，也會在彼此舉辦重要紀念活動時，送上「團結訊息」(Solidarity message) 傳達支持組織之間的團結與合作。

台灣會長在 ATKI-Taiwan 與移工國際台灣分會、台灣伊龍戈移工組織都是屬於相同運動路線的移工組織，雖然兩個組織一年只有一、兩次的合作聯辦活動的機會，但是在思想上或行動操作都能夠很快達成共識，甚至快速地成為緊密合作的戰友。在 ATKI-Taiwan 的前會長 Atin 表示：「雖然菲律賓移工多數說英文，經常很難和他們溝通，但是相比起跟印尼團體合作，我更加喜歡跟菲律賓移工組織合作，他們是真正為移工抗爭，爭取權益的組織。」另一個具體例子，當 2013 年印尼辦事處提出直聘續約面談雇主的措施，面談過程中印辦將代移工要求雇主提高薪資，作為部分、階段性調漲外籍家務工調漲薪資的策略。然而，在

ATKI-Taiwan 強烈反對該項政策，Renai：「這樣的政策如果真的可行，也只限於印尼籍的有機會調漲薪資，菲律賓的朋友卻沒有，所以我們應該反對。真的要調漲就要部分國籍全部一起調漲。」

印尼移工與菲律賓的相互看見，讓移工運動朝向認異政治，而非只為「我族」、「我群」的抗爭運動。這也是Touraine所指的運動主體化的過程，強調「歷史質」，並且超越身份認同政治，朝向認異政治的過程。ATKI-Taiwan和移工國際台灣分會每年的活動和一些聚會的邀請，相互交流，看見了彼此相似的處境，創造了更多彼此合作與信任的基礎，為了相同的使命，一同抗爭。

第二節 印尼移工團體結盟的契機

2011年，Sogie在台灣工作回到印尼領不到當年仲介公司強制儲蓄金，輾轉向ATKI-Indonesia申訴，進入庇護中心。經過ATKI-Indonesia的同仁努力後，Sogie成功領回被扣押的錢又進入台灣工作。回到台灣之後，他積極參與ATKI-Taiwan的活動，負責關注漁工的權益並給予協助。由於Sogie在庇護中心受到的政治教育和啟發，瞭解到組織的重要性。他和另一位夥伴Ali在南方澳港口組織印尼籍漁工，鼓勵他們依照各自的出身區域成立同鄉會，並且把同鄉會結合成為聯盟，也就是FKPIT⁵¹。2012年Soghie的船隻轉到屏東，就無法再處理FKPIT組織事務，轉由Ali⁵²擔任。

2013年5月印尼辦事處發出一封中印文的通知函（請見附錄四）給各地僱印尼籍漁工的雇主，要求台灣雇主於5月1日始不得在移工薪資裡面扣除膳宿費。由於此指令並未獲得台灣政府的同意也未納入法令，仲介和雇主都不予理會。

⁵¹印尼語全名為：Forum komunikasiPelaut Indonesia Taiwan，由8個同鄉會組成。

⁵² Ali原本在南方澳當漁工，後來船主的船隻不定期到台灣個碼頭停靠，Ali在宜蘭的時間減少，也較少接觸和組織在宜蘭的漁工。

一直到 6 月期間，部分印尼籍漁工因此與雇主起爭執，並且向仲介爭取不得扣除膳宿費。FKPIT 也積極組織漁工商討，並且要求印尼辦事處在宜蘭南方澳與漁工們進行公開對話。但是，印尼辦事處臨時無故缺席。部分移工深覺不滿，而在仲介公司前進行抗議，最後引起媒體和當地警方的關注。FKPIT 的幹部經過討論後，決定派 15 名代表直接到臺北辦事處進行抗議。FKPIT 前任會長 Ali 帶領團體的代表們來到臺北，基於對 ATKI Taiwan 的信任而首先聯絡以尋求協助，陪同他們與印尼辦事處代表進行會談。會中，印尼辦事處代表許諾將對不配合指令或沒有為移工積極協調爭取終止膳宿費的仲介公司採取行動，將終止聘僱許可及吊銷執照作為懲罰。現場，中華民國人力仲介協會代表也承諾將在一個月內與雇主溝通，試圖取消從移工薪資扣膳宿費。

這事件，讓宜蘭一帶的印尼籍漁工開始團結，積極的聚集及討論接下來的行動。ATKI-Taiwan 開始串聯與漁工團體成立聯盟⁵³——在台印尼漁工聯盟⁵⁴，繼續關注議題。首先，聯盟的成員以及 ATKI-Indonesia 經過線上和會面的幾次討論後，先針對台灣媒體針對和平集會的錯誤報導⁵⁵做出回應；ATKI-Taiwan 相對擁有書寫的能力和發新聞稿的經驗，而負責草擬新聞稿。ATKI-Indonesia 則協助討論，以及規劃行動。在台印尼漁工聯盟為了讓印尼社群能夠進一步瞭解扣除膳宿費的議題，更希望藉此能夠團結同樣面臨扣除膳宿費的工廠工人，最後決定進行簽名運動。數日後，宜蘭大溪 150 名印尼漁工也開始自行集結，與仲介及雇主針對廢除扣膳宿費進行會談，其訴求卻遭到否決，卻仍極力爭取本身該有的勞動權益而在公園集結罷工 3 天。在台印尼漁工聯盟輾轉下得知消息後，馬上前往協助⁵⁶。

⁵³ 這個聯盟只是針對爭取廢除膳宿費議題而設立，印尼語全名為 Komubita Bersatu。

⁵⁴ 全名為；Koalisi Buruh Migran Nelayan Indonesia Bersatu，簡稱 Komubita Bersatu。共有 15 個移工自主團體聯合組成。原本計劃要串聯基隆、屏東、以及離島的移工成立組織並且加入聯盟，但是移工本身長期在海上工作以及經常更換手機門號的關係，難以取得聯繫。

⁵⁵ 台灣媒體報導移工要求調漲薪資。漁工們憂慮將誤導台灣社會的觀眾，而且模糊了集會的訴求。（見附錄）

⁵⁶ 由於個人缺乏對現場的評估，沒有驚覺到對方可能採取的策略，造成我被逮捕後，雇主們現身，

事後，有 10 名參與者被雇主終止契約，遭仲介鎖在宿舍，並將於 16 日被強制遣返印尼。ATKI-Taiwan 緊急聯絡台灣人權以及移民工團體⁵⁷協助和聲援，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前陳請抗議⁵⁸，最後成功讓這些移工恢復人身自由並且回到工作。

經過一連串的事件，移工自主團體的聯盟逐漸形成當中。但是，移工運動的發展並非直線發展，不同組織結合的初生聯盟經過抗爭之後面臨瓦解或鬆動的情況。組織之間是否建立深厚的信任基礎，以及組織之間對議題的討論機制，聯盟的運作機制等等都是重要的議題，也決定了聯盟的發展。在台印尼漁工聯盟的漁工組織領導在未成立之前，已經存有芥蒂，防備對方並且認為對方並未為組織或移工爭取權益，甚至指責對方只為了個人名利。尤其與印尼辦事處來往頻密的意見領袖或團體幹部，都會被質疑。印尼辦事處為了應對國民在台灣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以及各種移工案件而成立了工作隊——STAGAS⁵⁹。FKPIT 的會長 F 也就是 STAGAS 的成員，被懷疑瓦解了大溪漁工抗爭的主謀，跟經常指責他無法領導組織帶領組織爭取移工的權益。組織領袖之間的關係連帶影響了聯盟的運作。當民進黨立委提案將外籍漁工排除勞保和健保⁶⁰並且已經一讀通過時，台灣移工團體關注並且討論此事並且要求印尼漁工組織站出來，而筆者把相關消息翻譯並且讓移工瞭解。台灣立委陳淑芬試圖協助推動廢除移工膳宿費的議題召集關心移工團體出席會議，而筆者也把這樣的訊息告知漁工，希望他們能夠親自出席並且提出自己的想法。筆者認為，這樣的過程是把發言權交還給移工本身。但是，影響最

變成印辦在現場主導最後導致集會瓦解。之後，FKPIT 的現任主席更被指責背後與印辦合謀，瓦解了這場行動。

⁵⁷ 參與團體包括：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在台印尼移工協會、在台印尼漁工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南洋台灣姐妹會、台灣國際家庭互助會、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

⁵⁸ 印尼漁工抗議爭取廢苛扣膳宿費將遣返，<https://www.peopo.org/news/113960>

⁵⁹ 2012 年 ATKI-Taiwan 曾經受邀加入該工作團隊，但是經過討論，認為移工組織應該自立並且獨立，持續監督官方單位而拒絕。早期，Stagas 經常受到移工的批評，尤其是其社群臉書充斥各種批評。2013 年，印辦轉變策略，把這些意見領袖納入工作隊伍，過去積極批評 STAGAS 和印辦的移工領袖就變得「沉默」。

⁶⁰ 最後在台灣移工團體的施壓，該法案已經撤除。

深的印尼漁工組織領袖對此事沒有太大的反應，也不參與討論。在台印尼漁工聯盟無法發揮角色，聚集漁工關注此事。最後由Atin只以ATKI-Taiwan的名義草擬出新聞稿發布出去。台灣移工團體的抗議行動，ATKI-Taiwan以及印尼漁工聯盟的成員都因為工作的關係都無法出席。更主要原因是，上次的行動之後移工領袖之間的不滿情緒帶來的消極。組織領導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團體之間的信任問題仍然持續影響印尼社群，同樣的問題出現在接下來成立聯盟中。

2014年ATKI-Taiwan會長Lukman跟筆者提到移工團體想成立聯盟，命名為GORBUMITA。筆者說：「很好啊。但是大家是否討論過聯盟的運作和遴選幹部的機制？已經準備組織章程？聯盟的使命和宗旨等等？」但是，Lukman告知GORBUMITA主要舉辦與印尼辦事處對話會，也想趁機團結移工團體，一切還只是初步籌備，仍等待IPIT的前任幹部AF的召集。這次對話的重點仍然主列印辦，移工認為許多資訊都是印尼辦事處一言堂，有時針對移工的提問歸咎於台灣政府的方式隨意打發而已。因此移工組織想邀請台灣勞委會的相關人員也一起參與，試圖想聽聽印尼辦事處在台灣官員面前的回答移工們的提問。如果印尼辦事處還是沒有作為的話，以後就要把行動升級到印尼辦事處前進行抗議。這原本是移工主動推展成立聯盟，移工自主團體對權益議題建立共識並且能夠形成集體行動的契機。

由於這是移工自主團體主動發起的聯盟，加上ATKI-Taiwan並非主要策劃人，只是告知可能需要筆者協助邀請勞委會事宜，所以就沒有多加提供意見或進行集體討論，只有在ATKI-Taiwan內部會議詢問有關事項的進展。到了後期，召集人並未積極召開會議，大家對此事的熱情也漸漸的消退。後來，ATKI Taiwan 被告知雜誌Holiday有意願提供經費和場地，甚至在飯店舉辦，讓更多的移工可以參與。期間，該雜誌社臨時退縮表示不願意提供經費了，但是被各團體批評和施壓後，最後選擇在臺北火車站前的YMCA大廈。透過過去ATKI-Taiwan曾經與印尼辦事處對話的經驗，避免對話會變成個案式的回應而模糊了焦點，最後總結籌

備單位必須設定議題，參與的核心團體或發言人必須針對負責的議題，包括進行書寫、收集相關資料和個案，以作為發言的依據。但是，其他團體都沒有呈交報告書，更沒有為對話會準備文字工作，只有 Atin 準備好的報告書，但也沒有印和派發給出席的參與者。在現場筆者又詢問 Atin 不是要派發報告書嗎？她說後來大家又決定不用報告書。

對話會當天，出席的移工並不多，由 IPIT 的移工夥伴 FD 主持，說明對話會討論的議題範圍，以及時間限制。主持的過程中，FD 並沒有傾向移工反而在對話的過程中任由印尼辦事處代表浪費時間一堆敷衍。筆者一看不對勁，筆者問 Lukman 究竟怎麼回事啊，而 Lukman 也很主動地趕緊找機會直接插入仲介費的議題。直接逼問印尼辦事處代表：「一直口口聲聲說仲介費是「買工作」，但是我堅決相信雇主並不會「賣工作」到印尼仲介，所以問題並非出在台灣這裡！」除了這段對話，以及 Atin 試圖批評印尼辦事處無作為，全場對話會沒有任何的火花，過程中移工團體的戰鬥力都非常的弱。

對話會之後，聯盟也沒有進一步的行動，移工團體之間沒有團結反而有被分化的狀況。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參與幹部的聯盟缺乏行動的討論和全盤的規劃。這些來自不同性質的移工團體過去也鮮少合作策劃活動⁶¹，過去並沒有累積出組織之間的信任和合作關係，更別論短時間形成集體行動。加上，部分印尼社群的意見領袖在期間加入印尼辦事處SATGAS行列事件，嚴重打擊了組織的士氣和團結的氣氛。除此之外，這場對話會，移工組織之前並沒有討論出策略和做好準備，沒有預想對話會後如何收場，造成移工組織士氣低迷，不但對試圖建立起來的聯盟或社群組織來說是個挫折，再次擴大引發對組織領導不信任的氛圍。無論如何，台灣印尼移工團體的數量不少，散佈在台灣各地卻無法形成一股團結的力量。印

⁶¹只有合辦一些活動宗教祈禱或節慶時，各自分配工作。移工自主團體也比較少舉辦比較政治性、抗議行動、倡議或教育的活動。

尼移工自主團體之間有時會出現政治路線不同或者組織宗旨的差異而出現張力、猜疑。

第三節 官方勢力的「收編」

從印尼移工組織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台灣移工組織的關係處在變動的狀態，沒有明顯的路線，移工的抗爭和組織方向也隨著領導人的特質而有所不同。後面的部分將會進一步分析，為何台灣移工聯盟並沒有如香港那樣發展下去，反而快速、輕易的被瓦解。

由於地緣關係，宜蘭的移工組織和臺北的移工組織交流相交頻密，他們當中更是社群中的意見領袖，像IPIT的前任會長FD、協助基隆漁工協會印尼家務工TAN⁶²，甚至包括原本與ATKI-Taiwan合作的FKPIT會長和PASOPATI會長NP等等⁶³。他們除了擁有一定的支持者之外，有些也具備優勢條件，能言善道、思考敏捷、有行動力。他們擁有主見和立場，也經常抨擊印尼辦事處⁶⁴。儘管他們曾經擁有激進的形象和言論，最後還是被印辦收編，加入印辦籌組SATGAS專案工作隊。

印尼籍勞工在台灣經常面對權益受到侵害的案件不斷增加，加上移工組織的施壓，印尼政府為了應對而在台灣設立BNP2TKI的海外分部，讓該部門能夠直接處理案件。另一方面，印辦籌組SATGAS專案工作隊專門負責處理移工案件，成員多數是印尼籍旅台生⁶⁵、移工或兼職記者。SATGAS設立了臉書公開群組⁶⁶，

⁶²曾經在印尼仲介公司服務，組織基隆漁工，因此被稱為基隆漁工之母。擁有流利的中文，可以為移工與雇主協調。另外，她不但為基隆漁工設立活動空間，甚至設立閱讀角落籌募書籍。雖然擔任家務工但相對由時間可以聚集漁工，或者在家做廢物利用手工，印辦也邀請她培訓其他移工做手工的課程。

⁶³還有很多沒有這篇論文具名的移工。

⁶⁴過去 ATKI-Taiwan 與印辦協調幾個個案（護照，漁工、運送職災死亡屍體回國的案件）的經驗中發現印辦明顯沒有替移工據理力爭。當香港 Erwiana 事件香港移工萬人遊行討回公道時，印辦處理一個被許可外工作的家務工懷疑被虐重傷至重度昏迷，而 SATGAS 和印辦只安排家屬和雇主私下和解，而受到嚴重抨擊。

⁶⁵例如 AP 或 HK 就讀臺北一帶大學，也在台辦事處“工作”多年。除了印辦的活動和工作之外，

有需要諮詢或協助的移工都可以在臉書上與這些成員或印辦工作人員互動。SATGAS的主要工作則是協助印辦陪同個案出席勞資協調會，或探訪病重、職災的同鄉。為了拿出成績來說服移工社群，SATGAS成員經常把任務和接觸到的個案貼在臉書群組作為宣傳。SATGAS也開始吸納一些比較活躍、有影響力的組織幹部或社群中的意見領袖。SATGAS的成員只要每個月服務的案件達到印辦規定的數量就會獲得印辦處提供一筆補助金額。這些組織領袖關心移工的福祉，但是面對各種局限經常出現力不從心的狀態。當印辦邀請他們加入SATGAS，不但可以得到勞動權益的法規知識和資訊⁶⁷，在面對仲介或台灣官方單位、雇主，印辦能夠成為支援的對象⁶⁸。相較於單打獨鬥，對移工組織領袖來說，眼前是個不錯的選擇。同樣的，進入體制的結構引發其他移工對他們的批評，認為他們出賣移工權益。尤其是過去非常極力批評官方以及專案小組的組織領袖們，但是一旦有機會被邀請時，這些組織領袖還是應邀，並且聲稱自己不會被印辦影響。但是他們對印辦或官方單位的批判也的確減少，也轉向參與積極印辦的活動。無論如何，對於移工來說由，官方提供有金錢利益的補貼，對薪資低的移工來說是非常大的幫助，加上以「代表官方服務移工」的名義可以在印尼社群中獲得好名聲，也能夠得到官方認可的權力，以施壓仲介公司等。因此，他們花更多的時間在服務和尋找服務個案，與印辦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這造成移工自主團體組織越來越傾向中立或協調的角色，形成侍從的社會關係。

曾經一度，數位積極的移工組織領袖和ATKI-Taiwan的夥伴認真地討論如何加強台灣移工運動的實力，而他們採取的策略是：團結所有台灣的移工組織成立聯盟並且對印辦施壓，要求正視和解決幾個移工的課題，如得不到回應就把行動

他們也參與穆斯林宗教團體，在印尼移工社群中享有特殊地位。他們周旋在移工自主團體、宗教團體、以及印辦的圈子裡，其中一位 AP 跟常常現身在 IPIT 的活動或辦公室。

⁶⁶每當相關移工議題出現時，移工紛紛在群組上留言，甚至批評印辦。

⁶⁷他們相信進入體制能夠挖掘出更多「內幕」，並且監督印辦。

⁶⁸印辦提供授權信函讓他們代表官方處理勞資爭議等個案。

升級到印辦抗議⁶⁹。依照當時的移工自主社團的氣勢，加上這些組織領袖的組成，能夠形成大聯盟。但是，這批積極的社團領袖被印辦收編加入SATGAS後，原本計劃的行動策略和移工組織大串聯的契機隨之被瓦解。

小結

移工組織之間體認到需要團結的必要性，結合各組織的力量，要求印尼政府積極地面對他們的處境。然而，從以上的經驗，移工組織領袖沒有清楚的運動路線，在議題和處理方式上比較容易動搖，從犀利的批判的態度也會因為權力單位釋出的「善意」而轉變方式。移工團體向主流價值觀靠攏，選擇站在中間或妥協的立場，官方單位介入的方式也可能分化移工運動，移工組織領袖被收編或進行壓制，以至於激進社團被邊緣化。移工組織對於問題的根本、社會結構分析，掌握的資訊有限，勞動意識也處於萌芽狀態狀態。

⁶⁹這是來自 ATKI-Taiwan LK 的說法，他希望台灣的移工組織也能夠學習香港那樣團結，嘗試稍微激進的手法。但是他認為，理性對話是行動的前提，讓所有移工看到對話只換來空頭支票，最後移工組織只好和平抗議為同鄉們爭取福祉。

第五章 總結

第一節 移工組織的啟發

ATKI-Taiwan 成立的過程，菲律賓移工組織者扮演催化和推動的角色，是在跨國移工運動策略下所進行的一項長期的規劃和推動的組織工作，逐漸形成的草根組織。香港印尼移工運動是 ATKI-Taiwan 一個重要的支持網絡和參照，印尼組織者的政治意識與運動背景型塑了 ATKI-Taiwan 成立時的運動論述和精神面貌。透過資深組織者的組織工作，以及採取的策略，逐漸推進移工的政治覺醒，體認集體力量和組織長期抗爭的重要性，針對特定議題的 PILAR Taiwan 轉型成正式一個移工自主的團體 ATKI-Taiwan。

ATKI-Taiwan 仍是一個正在發展的組織，學習行動、建立論述、服務群眾、建立組織路線和抗爭經驗。ATKI-Taiwan 許多擔任家務工的幹部，也只能維持一個月一次出席組織的活動。一個月一次的週末時間對組織來說非常有限，一方面需要顧及會員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不斷找機會推動會員對議題的認識，學習如何深入的分析。有些移工無法休假，或者區域性的距離，使移工無法經常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活動或組織會議，只能利用網際網絡和手機科技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繫、進行組織工作與外界聯繫。移工經常使用線上開會，也成為了移工組織運作的基本媒介和動員模式。透過網絡科技打造出民主討論、傳遞訊息、辯論的公共領域空間。然而，移工使用網絡科技進行動員工作效果並不彰顯，無法引起移工的集體行動。

ATKI-Taiwan 的幹部和會員幾乎全部都沒有組織經驗，擁有政治意識、抗爭經驗的成員也少之又少，組織的行動較多傾向從突發的個別事件以及移工相關議題，進行回應、向台灣社會表達意見，提出他們自身的訴求。擁有書寫的能力，

讓移工能夠在印尼社群中掌握輿論，相對官方一向保守的言論，ATKI-Taiwan 的文告或者活動報導，不斷在媒體上提出各種議題，多少也引起了移工群眾的矚目。ATKI-Taiwan 成立以來，不斷的舉辦各種紀念文化活動，並且在聚會中扣連議題，教育其他的移工。

雖然 ATKI-Taiwan 在面對客觀環境的限制，但是透過長期的組織工作以及對海外運動的參照，推動移工議題，逐漸建立移工運動的主體性。組織多數以應對偶發的議題和行動，從中慢慢學習組織長期的規劃和發展組織的工作。由移工本身的積極性去推動和策劃，比起外來者更能讓組織工作變得更有意義。移工從不同的行動中被啟蒙，經歷了「轉變」，而在下一個行動更往前推進，移工主體化的形成也不是一次就達成，而是經過多次的抗爭與行動，對議題的深化和理解，以及各種政治教育，讓他們看見了其他命運的共同體，共同抗爭。

第二節 反省與成長

5-2-1 身份的局限

在移工組織內，筆者經常思考自身究竟應該處於什麼位置，哪些事情應該介入，哪些事情代替移工幹部們處理，而又有那些事應該讓移工幹部自行承擔，筆者經歷了一段非常長的時間去思考究竟要如何面對自身在移工組織內的位置。一方面需要以移工為主體，也必須要避免移工產生依賴而不願意自行學習的現象發生。曾經有位資深的組織者告訴我：「移工需要培力，但那人不是你。」在組織底層的工作中，確實需要比較資深和擁有相當能力的組織者來協助。前輩的「提醒」的確指出了沒有事前規劃和方向的介入帶來的困境和危險性。如果一不小心，有可能會破壞好不容易才建立的組織，讓筆者在協助移工組織工作時，更加小心

翼翼。

文化背景以及國籍身份的不同曾經讓筆者在組織內產生很大的激盪，組織者與移工來自不同的身份背景或經常出現不一樣的想法，有時甚至會完全被排除在外。2013年，ATKI-Taiwan第一次舉辦大型文化活動，並且邀請其他組織參與成立籌委會，而每次籌委會會議時，筆者詢問組織幹部們是否可以參與，而組織幹部都會認為他們自行討論即可，筆者無需參與⁷⁰。

在台灣組織移工時，一些活動必須要確定出席人數，移工都會很「慣性」回答：「InsyAllah」（願真主庇佑）。這樣的情況造成，移工幹部經常發生爽約、遲到、無法準時等問題，原本規劃的時間和活動卻經常變動。這種無預警地變化，造成活動經常無法準時結束或沒有時間進行下個活動，使筆者覺得不知如何適從。組織活動和聚集的時間充滿不確定性，也讓人深覺不滿。有次，忍不住在電話中生氣，多次反復的詢問移工這樣的回答的明確到底是什麼？之後才慢慢的發現，InsyAllah 的回答，其實也包含了移工對自身處境的無奈，即使面對休假但是還是必須先滿足雇主的需求，例如，先把家務做好，等雇主允許後才能出門，或雇主臨時不能照顧被看護者，往往都會要求移工放棄休假。

有時，筆者和組織幹部對一些議題有不同意見時，他們會認為筆者不是移工身份的關係無法完全了解移工的處境。ATKI 組織者 Lukman 剛上任不久時，試圖與印尼辦事處官員私下詢問有關超收仲介費的問題，但是對筆者來說，私下對話極有可能陷入官方的邏輯反而被說服而選擇相信官方的說辭。並且試圖從個人對議題的理解向 Lukman 分析議題的過程中，Lukman 憤怒的表示：「你又不是移工，你不會懂的。」筆者馬上警覺到自己過於干涉。移工本身有自己理解處境的

⁷⁰ 幹部們認為，來自其他組織的移工會聽不懂筆者的「印尼語」會造成討論的混亂，而拒絕讓筆者參加。

一套方式和步驟，強加在移工身上的知識反而不被接受。

由於筆者通曉中文，台灣組織或團體都會透過筆者聯繫 ATKI-Taiwan，或要求筆者代表組織。為了達到以移工作為主體的組織工作，筆者採取盡量開拓組織幹部在對外事務上的參與。即使在不諳中文的情況下，移工幹部仍然有接觸台灣社運團體的機會。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所有對外的聯繫都必須回歸到組織幹部的討論和參與。外來介入者必須體認到移工才是作為組織的主體，除了提供實質的陪伴，還必須學習觀察組織成員的狀態，如何在局限的環境中採取有效的行動推動組織運作，依照團體成員的認知層次創造共同的行動，開拓移工的參與。

5-2-2 組織經驗的參照

ATKI—Taiwan 的成立並非移工自然團結而形成的組織，而是經過跨國移工運動長期的積累和運動策略上的規劃，結合各個有利的因素而形成。香港印尼移工從菲律賓的移工組織經驗中學習組織工作的方法，ATKI HongKong 組織群眾的工作一直擴展到台灣，協助台灣的移工組織。ATKI—Taiwan 的組織模式也承續了菲律賓草根運動組織方法，成為較有批判意識、較為激進的印尼移工團體。

ATKI-Taiwan 也學習草根組織的領導原則，強調為「走向群眾、服務群眾」（dari massa untuk massa），在倡議的議題和抗爭方法都會參照 ATKI-HongKong 的做法、論述。網路的便捷使得跨國之間的聯繫更緊密。ATKI-Taiwan 的組織方法，主要還是來自於 ATKI-Indonesia，ATKI-HongKong 的協助，提供材料，或者直接提供經驗的交流。

跨國移工運動的擴大，相對也提供提供ATKI-Taiwan發展的物質基礎；ATKI-Taiwan未成立之前，菲律賓移工組織者在台灣建立組織網絡，以及組織之

間的信任基礎，例如，台菲友好協會⁷¹、台權會⁷²、勞權會⁷³和桃園縣服務群眾協會⁷⁴...等等組織，都讓ATKI-Taiwan能夠快速的與這些本地組織建立關係，而這些組織也非常願意協助ATKI-Taiwan的需求，聲援抗議行動，舉辦活動接場地等等。如果沒有這些長期建立下來的網絡以及組織信任，ATKI-Taiwan的發展可能會較緩慢。

5-2-3 轉譯者的角色

移工自主團體組織需要更多適當的介入，扮演「轉譯者」和「協助者」的角色，成為移工組織與在地組織之間橋樑，提供組織需要的養分。在組織，移工才是主體，也必須讓移工明白到只有靠他們的力量移工的抗爭才會成功。有知識並不代表有權力左右組織的決策，而是協助移工開創出他們的視野和經驗。在每個行動中，讓移工處在扮演最重要的位置，協助其發現自己的潛力，以及組織行動帶來的轉變。

作為轉譯者，必須善用自身的語言的優勢協助移工組織時時跟蹤台灣的時事、勞工或與移民工議題相關的新聞。移工獲取台灣社會的資訊，能夠增加對議題的敏感度，甚至可以貼近議題的局勢變化、進行分析，採取適合的運動策略。把麥克風遞到他們面前，讓他們可以說出自己的話，除了期待外籍移工組織內部出現積極份子之外，也需要擁有豐富組織的工作人員協助穿針引線、傳遞相關知識經驗才容易達成組織目標。

⁷¹ 英文全名為：Taiwan Committee for Philippine Concerns，簡稱 TCPC，是由台灣關心菲律賓議題的個人所組成，關注的議題包括和平、人權與發展，並且聲援菲律賓社會各面向的議題。

⁷² 全名為：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英文全名：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簡稱：TAHR，是台灣的人權組織，成立於 1984 年。

⁷³ 全名為：勞動人權協會成立於 1988 年。

⁷⁴ 主要協助桃園底層工人的勞資爭議，提供勞動法令諮詢和籌組工會等工作。

5-2-4 移工團體之間的張力

在這個研究場域中，有不少印尼自主團體，也有不少移工團體對自身權益固然關心，也試圖開展不同的行動。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尼社群組織裡不管是哪種類型的組織，往往女性家務勞工扮演主要的角色，甚至是推動者。她們建立社群網並且協助移工，例如，進行勞資爭議申訴，翻譯有關勞動權益的資訊，甚至有些設立專門募款提供給必須就醫或死亡的移工或移工家屬。有些則選擇利用印尼官方提供的平臺，為移工爭取權益。其中不少組織或家務工擁有一定的資源和網絡，也有少數擁有中文閱讀能力，他們用他們自身的方式來協助台灣的同鄉，即便是這些方式都是比較消極、或依賴於在官方勢力，但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移工團體內都樂於助人，而助人的方式也不盡相同，但是這些移工組織仍延續頭人政治、精英的領導模式，甚至相互中傷，只注重本身的政治影響力。這些現象造成組織之間難以團體，錯失集體抗爭的機會。

參考文獻

英文文獻

- Abdul Rahman B.S.A. Yeoh and S. Huang N. (2005) . 'Dignity Overdue' : Trans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in Singapore. Asian Women as Trans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Singapore : Marshall Cavendish.
- Betti Apriani (2011) .Peran Asosiasi Tenaga Kerja Indonesia (ATKI) Dalam Memperjuangkan Hak TKI.Unibersitas Islam Negeri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Constable, Nicole (2009) .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many states of protest in Hong Ko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41(1):143-164.
- Ford, Michele (2006) . Migrant Labor NGOs and Trade Unions: A Partnership in Progres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15: 299-311 .
- Hsia, Hsiao-Chuan (2009) . The making of a transnational grassroots migrant movement: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s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1(1):113-141.
- Hugo, G. (1995) . Labour export from Indonesia.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12(2):275 – 298.
- Loveband, Anne (2004) . Positioning the product: Indonesian migrant women workers in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34(3).

中文文獻

- 亞蘭杜漢著 (2002)。行動者的歸來 (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台北：麥田。
- Bultron, Ramon (2008)。移工運動的奮鬥與發展：菲律賓經驗 (張星戈譯)。收錄於夏曉鵬等編，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

Freire, Paulo. (1993) .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受壓迫者教育學（三十週年版）（方永泉譯）2003，臺北：巨流）

王宏仁、白朗潔（2007）。移工、跨國仲介與制度設計：誰從台越國際勞動力流動獲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5），35-66。

丘延亮（2002）。希望的主體——杜漢的社會性運動論詰與台灣社會性蛻變，行動者的歸來.中譯本導讀，7-46。臺北：麥田出版社。

李美賢（2005）。印尼史：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臺北：三民書局。

郭祐全（2012）。後蘇哈托時期印尼政黨政治發展之研(1997-2009)，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家雋（2014）。印尼移工團體 IPIT 的組織與發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佳臻（2002）。天生愛組織？菲律賓移工自主團體在臺灣的組織經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挺鋒（2002）。「外勞」休閒生活的文化鬥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顧長永（2000）。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公司。

夏曉鵬（2006）。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差異政治、主體化與社會性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1-71。

陳秀蓮（2011）。「公」「私」雙綁外籍家務勞動者的勞動處境，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熾芬（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台灣社會學刊（32），1-58。

劉淑菁（2012）。被忽略的過客-在台印尼伊斯蘭教家庭看護工宗教踐行的困境，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藍佩嘉（2006）。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勞工的控制與出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5），107-150。

藍佩嘉 (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出版社。

網路文章與媒體報導

ATKI-Taiwan (2013). Juhur Hidayat dan Programnya Di Kritik ATKI”, 四方報, (21)

Atin Safitri (2011). “Undang KDEI, ATKI Dialogkan Persoalan TKI Taiwan”, Sumber Daya Buruh Migran, (<http://buruhmigran.or.id/2011/11/07/undang-kdei-atki-dialogkan-persoalan-tki-taiwan/>). 2015/5/20

Atin Safitri (2012) “Upah Minimum Dihapus, TKA Taiwan Terancam”, Sumber Daya Buruh Migran, <http://buruhmigran.or.id/2012/11/05/tka-tki-taiwan-tolak-penurunan-upah-minimum-dan-diskriminasi-buruhmigran/>. 2015/5/22

Atin Safitri (2013) “Pernyataan Sikap BMI Taiwan Di Hari Perempuan International”, Sumber Daya Buruh Migran, <http://buruhmigran.or.id/2013/03/10/pernyataan-sikap-bmi-taiwan-di-hari-perempuan-internasional/> 2015/5/17

Atin Safitri (2013). “BMI Taiwan Korban Kebakaran Asuransi Kematian Masih Dipotong Kertas Sembayang!” , *Indo Suara*, Vol 4/96 February 2013.

Atin Safitri(2013). “Kisah Sedih Nikmatual Tragis , Kerja baru Seminggu Kaki Patah”, *Holiday*, Edisi 52, Januari 2013.

Atin Safitri (2012). “Kasus Minal Dan Agency Nakal 1955 Terima Laporan Palsu”, *Holiday*, Edisi 46, August 2012.

Atin Safitri (2013). “Jangan Jadikan BMI Sebagai Tameng Politik,” *BMI TIMES*, Edisi 24, Juli 2012.

附錄

附錄一：ATKI Taiwan 2008-2014 年活動記錄

時間	事項
2008	APMM 印尼籍協調員 Ipang 到台灣進行移工議題的調查
2009.2.22	<u>PILAR Taiwan 成立，約有 15 位會員</u>
2009.8.27	PILAR 台灣向印尼政府單位印尼海外勞工安置暨保護局 PPTKLN 呈交廢除超收仲介費 <u>聯署備忘錄</u>
2009.12.20	PILAR Taiwan 從鬆散的組織轉型成正式組織，ATKI 台灣正式成立，Atin 擔任主席。
2009.12	與印辦對話會有關護照以及扣薪的議題。ATKI 台灣第一次發表聲明。
2009.12	APMM 協調員 Ipang 回印尼，結束 APMM 的工作。
2010.8.19	ATKI Indonesia 針對台灣移工反對強制儲蓄在印尼人力資源與移民部辦公室前舉行抗議行動
2011.10.23	APMM 舉辦倡議與遊說工作坊
2011.12	印尼 Indies 舉辦移工論壇邀請 17 個來自不同在地國移工組織代表出席會議。ATKI-Taiwan 也是受邀團體之一。
2012.4.15	紀念 Kartini 女英雄紀念日，討論有關印尼保險及台灣健保
2012.5.1	參與台灣勞動日五一遊行
2012.5.27	APMM 提供幹部訓練
2012.6.15	公園聚會討論有關印尼保險及台灣健保
2012.8.19	歡慶穆斯林開齋節 介紹組織及移工各種議題
2012.09.16	參與抗議台鐵紅龍事件
2012.10.7	與印尼辦事處對話會
2012.10.28	參與反對本勞外勞脫鉤集會遊行
2012.11	參與印尼雜誌舉辦服裝表演活動
2012.12.23	移民工組織聯辦國際移工日
2013.1.	移工教育課程-認識遷移
2013.2.10	基隆漁工迎新活動-移工教育課程—「認識組織」
2013.2.24	台中迎新活動-「認識遷移」
2013.3.3	參與 Migrante 國際婦女節，舉辦 2013 年「一億女性站起來」
2013.3.17	勞動權益教育課程 邀請勞權會王娟萍討論有關印辦面試直聘印僱雇主片面調漲薪資新規定
2013.4.21	台中舉辦印尼 Kartini 女英雄紀念日大型文化活動

2013.5.1	參與台灣五一勞動節遊行
2013.5.19	移工教育課程, ATKI-HongKong「美好生活」電影分享討論會, 介紹 ATKI-Taiwan 成立過程
2013.6.16	印尼組織者 Retno 來台, 提供培訓課程-「遷移的社會根源問題」
2013.6.28	宜蘭南方澳 300 漁工抗議 30 位代表北上印尼辦事處與仲介協會集體協商
2013.7.8	宜蘭大溪 150 漁工罷工, 事後 6 位漁工被仲介限制自由
2013.7.15	勞動部抗議, 印尼漁工爭取廢除出膳宿費
2013.8.11	與其他印尼移工團體聯合開齋聚餐
2013.9.15	參與自煮公民號召台北車站吃喝躺行動
2013.9.22	移工戲劇訓練課程 邀請本地劇團陳淑慧
2013.10	移工戲劇訓練課程 II
2013.11.11	認識 WTO 教育課程 ATKI-Indonesia 組織者 Iwenk 網路連線主講
2013.11.17	與菲律賓團體聯合舉辦亞洲移工論壇
2013.12.15	台灣移工團體舉辦移工大遊行 (衛生福利部遊行至凱道)
2014.1.19	1. 聲援香港印傭 Erwiana 和台灣印傭 Uul 被許可外工作被虐台北車站集會 2. ATKI 第一屆會員大會
2014.2.9	與 Migrante International 聯辦「一億女性站起來」跳舞快閃
2014.2.16	英語、中文、電腦教學課程
2014.2.23	英語、中文、電腦教學課程
2014.3.2	英語、中文、電腦教學課程
2014.3.16	英語、中文、電腦教學課程
2014.3.23	APMM 文化活動計劃寫作工作坊
2014.4.6	英語、中文、電腦教學課程
2014.4.20	英語、中文、電腦教學課程
2014.4.27	英語、中文、電腦教學課程
2014.5.4	英語、中文、電腦教學課程
2014.5.11	參與 APMM 移工文化活動計劃戲劇工作坊
2014.5.18	ATKI 出遊
2014.5.25	印辦對話會
2014.6.8	台中擺攤義賣, 設諮詢櫃檯
2014.6.15	英語、中文、電腦教學課程
2014.7.7	拜訪群眾服務協會庇護中心
2014.8.3	歡慶穆斯林開齋節 北車撿垃圾活動



Pernyataan Sikap

ASOSIASI TENAGA KERJA INDONESIA di TAIWAN (ATKI-TAIWAN)

Berikan perlindungan sejati bagi BMI!

Berikan pelayanan sejati bagi BMI, bukan pungutan Liar!

Ditengah situasi krisis dunia yang semakin mendalam dan kronis, tak elak Indonesia sebagai Negara setengah jajahan dan setengah feodal tentu terkena imbas dari krisis yang dilahirkan karena sistem kapitalis monopoli atau Imperialis. Sistem ini telah melahirkan suatu kondisi yang kontradiktif atau kondisi yang berlawanan. Antara melimpahnya barang-barang produksi kapitalis(over produksi) dan lemahnya daya beli masyarakat karena tidak adanya jaminan dari sistem kapitalis ini untuk mendapatkan kehidupan yang layak bagi kaum pekerja.

Indonesia sebagai Negara setengah jajahan dengan populasi penduduk yang tinggi adalah Negara yang menguntungkan bagi pasar yang dikembangkan oleh sistem kapitalis yaitu sebagai pasar untuk menjajakan barang produksi yang mereka ciptakan dan sebagai pemasok tenaga kerja murah.

Salah satu upaya Pemerintah Indonesia untuk menopang krisis adalah dengan melakukan peningkatan pengiriman buruh migran Indonesia ke Luar Negeri. Hal ini dilakukan tentu sebagai upaya untuk mengurangi beban krisis yang semakin memburuk dengan dalih pengiriman buruh migran bisa mengurangi pengangguran dalam negeri. Namun pada hakekatnya masifnya pengiriman buruh migran dilakukan selain mengincar devisa yang telah dirasa dapat membantu keuangan dalam negeri secara signifikan juga sebagai usaha “**perdagangan manusia**” yang sangat menguntungkan yang secara tidak langsung dilegalkan oleh Pemerintah Indonesia.

Kenapa? Karena, peningkatan pengiriman buruh migran semata mata hanya untuk kepentingan mengeruk keuntungan sebesar-besarnya bagi Pengusaha dan Pemerintah, tanpa diimbangi dengan adanya perlindungan sejati bagi buruh migran.

Menurut catatan Pemerintah Taiwan saat ini sedikitnya **169,000** Buruh Migran Indonesia(BMI) bekerja di Taiwan, yang bekerja disektor formal dan informal. Sampai saat ini, berbagai macam bentuk penindasan dan penghisapan dialami oleh BMI di Taiwan, hal ini terjadi karena berbagai kebijakan atau undang-undang yang diberikan untuk mengatur pengiriman dan penempatan terhadap buruh migran tidak pernah berorientasi kepada kesejahteraan dan keadilan yang dibutuhkan oleh buruh migran Indonesia itu sendiri.

Biaya penempatan yang terlalu tinggi(**Overcharging**) masih menjadi momok bagi BMI di Taiwan. Tingginya biaya keberangkatan yang diberlakukan oleh PJTKI menjebak Calon BMI pada “**perbudakan hutang**”, belum lagi di tambah dengan banyaknya upah yang dipangkas untuk biaya-biaya yang diterapkan oleh Agency dan majikan yang tidak rasional dan tidak manusiawai. Hal semacam ini semakin menjadi metode perampasan upah yang ampuh bagi PJTKI dan Agency yang tidak bisa diterima oleh buruh migran karena hal ini terjadi juga atas legitimasi pemerintah Indonesia melalui undang-undang yang disusunnya.

Sudah menjadi kepastian jika, pemimpin pemerintahan Indonesia yang tidak pernah membela kepentingan rakyatnya, akan memberi contoh yang buruk bagi perwakilan pemerintahannya atau susunan pemerintahan di bawahnya.

Contohnya saja, buruknya pelayanan yang diberikan perwakilan pemerintah seperti KBRI/KJRI ataupun KDEI menjadi sesuatu yang sudah “**biasa**” diterima oleh buruh migran Indonesia di Negara penempatan.

Tidak hanya sistem pelayanan yang buruk, pelayanan-pelayanan yang diberikan perwakilan pemerintahan Indonesia di Luar Negeri terhadap BMI dijadikan sesuatu bisnis yang menguntungkan baik secara oknum ataupun secara lembaga itu sendiri. **Mahalnya** pembuatan ataupun perpanjangan paspor yang diterapkan KDEI adalah salah satu bentuk dari pelayanan yang dibisniskan untuk keuntungan saja.

Jam kerja yang panjang, tidak ada libur, gaji tidak dibayar, penahanan dokumen paspor, pelanggaran kontrak kerja, tidak ada jaminan keselamatan kerja, tidak adanya kebebasan berkomunikasi, tidak adanya kebebasan berserikat atau berorganisasi, perlindungan yang mahal melalui asuransi dan **KTKLN**, pembiaran terhadap Agency-agency yang nakal tanpa ada sanksi, adalah bentuk dari pelanggaran yang

dilakukan oleh Pemerintah dan perwakilannya. Maka, tidak ayal jika BMI juga mendapatkan perlakuan yang buruk dan diskriminasi dari Pemerintahan Negara setempat.

Dari situasi objektif diatas kami menuntut kepada perwakilan Pemerintahan Indonesia di Taiwan dalam hal ini adalah **KDEI** untuk:

- 1. Di Berlakukan system pembuatan dan perpanjangan paspor MELALUI AGENCY dengan harga yang murah,(sesuai dengan prosedur yang di keluarkan kdei taipei) bagi BMI.atau TKI**
- 2. Berikan jaminan pemegangan paspor dan pembayaran gaji setiap bulan pada BMI.atau TKI**
- 3. Hapuskan biaya penempatan yang terlalu tinggi(Overcharging)!**
- 4. Tindak tegas agency-agency yang melanggar hukum dan berikan laporan atau informasi rutin tentang daftar-daftar agency yang melanggar hukum.**
- 5. Tolak KTKLN! Tolak kewajiban Asuransi!**
- 6. Berikan jaminan libur seminggu sekali bagi BMI!atau TKI**
- 7. Berikan perlindungan sejati bagi BMI!atauTKI.**
- 8. Cabut UUPPTKILN No.39 tahun 2004! Bentuk Undang-undang yang memangku kepentingan BMI!atau TKI**

Taiwan, 30 oktober 2011

Asosiasi Tenaga Kerja Indonesia Taiwan (ATKI Taiwan)

Koordinator

Atin Safitri: 0973213624/ 0988887476

附錄三： ATKI Taiwan 文告 印尼語版



Pernyataan sikap

Asosiasi Tenaga Kerja Indonesia di Taiwan (ATKI)

TOLAK PENURUNAN UPAH TKA

Taiwan merupakan salah satu Negara tujuan yang di pilih oleh para Tenaga Kerja Indonesia (TKI) untuk memperbaiki nasib. Apabila di lihat dari sisi kuantitas angka ini mengalahkan jumlah buruh migrant yang berasal dari Negara-negara asing lainnya seperti : Filipina, Vietnam, dan Tailan.

Buruh Migran Indonesia menduduki ranking peratama dari tenaga asing yang ada di Taiwan. Sama halnya dengan beberapa bidang pekerjaan lain seperti : buruh Pabrek, Pekerja Rumah Tangga (PRT) dan Anak Buah Kapal (ABK) sebagai nelayan, karena upah dengan di bayar lebih murah.

Bekerja di luar negeri sebagai buruh migrant termasuk di Taiwan bukanlah satu pilihan yang mudah. Hidup di negeri orang mempunyai karate yang berbeda dan aspek-aspek kehidupannya terpisah dengan keluarga, tentu menjadi problematika tersendiri bagi buruh migrant. Belum lagi aturan yang di terbitkan oleh Pemerintah dalam memberikan perlindungan TKI ketika bekerja di luar negeri masih sangat jauh dari harapan . Hal ini dengan banyaknya masalah yang menimpa TKI yang bekerja di Taiwan.

Bermigrasi melewati bata-batas Negara yang di tempuh demi menopang kebutuhan perekonomian keluarga. Hal tersebut dapat melakukan demi memperbaiki kehidupan keluarga. Akan tetapi niat mulia ini tidak jarang berbenturan dengan kebijakan pemerintah yang tidak menempatkan keberpihakkan terhadap nasib TKI. Biaya penempatan yang tinggi dan potongan gaji yang menjadi dilema, dan lainnya di tanggung oleh TKI semua.

Menurut catatan Pemerintah Taiwan saat ini kurang lebih 180.000 Buruh Migran Indonesia bekerja di Taiwan. Berbagai bentuk perampasan dan penindasan di alami oleh buruh migrant di Taiwan. Hal ini terjadi karena

ketimpangan-ketimpangan UU yang di atur tidak sesuai dengan faktanya, tidak ayal lagi jika TKI mendapatkan perlakuan yang tidak adil dan **Diskriminasikan** oleh Pemerintah setempat seperti Taiwan ini.

Dari situasi obyektif di atas kami TKI menuntut Pemerintah Taiwan :

- 1. Tolak Penurunan Gaji TKA**
- 2. Lawan Diskriminasi RAS**

Asosiasi Tenaga Kerja Indonesia (ATKI) di Taiwan, Maret 2012

附錄四：ATKI Taiwan 文告 印尼語版



Pernyataan Sikap, May Day 1 May 2012 ASOSIASI TENAGA KERJA INDONESIA di TAIWAN (ATKI TAIWAN) Berikanlah Perlindungan Sejati Bag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Berada di tengah situasi krisis dunia yang semakin rumit dan kronis, tak elak Indonesia sebagai sebuah negara yang belum secara utuh merdeka dan berdaulat tentu terkena imbas dari krisis yang di lahirkan oleh sistem kapitalis yang monopolistik atau menjajah. Sistem ini telah melahirkan suatu kondisi yang berlawanan antara kekayaan sumber daya alam Indonesia dan kesejahteraan masyarakat dan kaum pekerja.

Kesenjangan perekonomian yang terjadi di beberapa dunia, mengakibatkan deret panjang proses migrasi manusia atas alasan ekonomi dari negara-negara miskin, menuju negaranegara maju.

Pola migrasi atas dasar tekanan ekonomi ini kemudian berkembang bak jamur di musim hujan. Negara-negara industri mendesak negara miskin untuk menyediakan buruh murah. Pola inilah yang menjadikan proses migrasi manusia lebih tepat untuk dinamakan tragedi ekspor manusia.

Pekerja migran kemudian menjadi tulang punggung ekonomi di beberapa negara industri, seperti Taiwan ini. Mereka bekerja dengan gaji murah untuk memenuhi kebutuhan buruh pada sektor formal dan informal, di pabrik (sebagai buruh industri), pelayaran (sebagai ABK), sektor domestik (sebagai PRT), serta buruh perkebunan dan peternakan.

Pada lain sisi, Pemerintah Indonesia tidak memiliki gagasan pembangunan ekonomi. Pelbagai aset sumber daya alam dijual pada perusahaan asing, privatisasi atas sektor-sektor vital, serta pengiriman besar-besaran tenaga kerja ke luar negeri. Alih-alih memberi mereka gelar "Pahlawan Devisa", pemerintah seolah-olah justru menjadi pengirim pasukan ke medan perang tanpa senjata, tanpa perlindungan,

tanpa hak mendapatkan kesejahteraan.

Hal ini dilakukan dengan dalih mengurangi beban krisis nasional yang semakin memburuk dan sebagai solusi versi pemerintah untuk mengurangi pengangguran di dalam negeri. Namun sayang, persoalan demi persoalan seolah tak ada hentinya mendera Buruh Migran Indonesia dan Pemerintah Indonesia tidak kunjung memiliki mekanisme perlindungan.

BMI selalu menjadi ironi dalam bangsa yang kaya sumber daya alam ini. Peningkatan pengiriman buruh migran semata-mata terus menambah komoditas dan pundi-pundi agen serta mafia tenaga kerja di Indonesia. Lebih parah aparat-aparat Pemerintah turut mengeruk keuntungan dari proses penempatan buruh migran. Menjadikan BMI sebagai bulan-bulanan aksi pemerasan dari pra hingga purna migrasi.

Menurut catatan Pemerintah Taiwan saat ini kurang lebih sekitar 175.000 Buruh Migran Indonesia bekerja di Taiwan. Buruh Migran dari Indonesia menduduki ranking pertama jumlah kerja migran di Taiwan.

Lantas apakah mereka sejahtera?, dapat dipastikan jawabannya adalah “TIDAK”. Hingga saat ini pelbagai bentuk penindasan dan pelanggaran hak dialami BMI di Taiwan. Hal ini terjadi karena berbagai kebijakan atau undang-undang yang diberikan untuk mengatur pengiriman dan penempatan buruh migran tidak pernah berorientasi kepada kesejahteraan dan keadilan yang dibutuhkan oleh buruh migran itu sendiri.

Biaya penempatan yang terlalu tinggi (overcharging) masih menjadi momok bagi BMI di Taiwan. Tingginya biaya penempatan yang diberlakukan oleh PPTKIS menjebak calon BMI pada ‘Perbudakan Hutang’. Hal ini belum lagi ditambah pemotongan gaji untuk biaya-biaya yang diterapkan oleh agensi dan majikan yang tidak rasional dan tidak manusiawi. Hal ini menjadi semacam metode perampasan. Semua biaya dan hutang yang dibebankan BMI dilakukan secara semena-mena tanpa proses yang terbuka. Pemerintah pun diam, seolah tak memiliki kemampuan melarang tindak pemerasan pada BMI tersebut. BMI pada akhirnya terjerembab hutang, menderita akibat potongan gaji yang semena-mena oleh agen dan PPTKIS.

Jika pemimpin-pemimpin di Indonesia tidak membela kepentingan rakyatnya, maka hal ini akan preseden dan stigma buruk bagi gerakan perlindungan buruh di dunia Internasional. Sementara perwakilan pemerintah di negara-negara penempatan BMI akan senantiasa berjarak dan lemah dalam memberikan peran perlindungan pada

BMI. Hal ini disebabkan mereka sudah menganggap persoalan BMI sebagai sesuatu yang biasa dan lumrah di negara penempatan.

Jam kerja yang panjang di luar kontrak, tidak ada hari libur, gaji tidak di bayar, penahanan dokumen paspor, pelanggaran kontrak kerja, tidak ada jaminan keselamatan kerja, tidak ada kebebasan berkomunikasi, tidak adanya jaminan kebebasan bersarikat atau berorganisasi, perlindungan yang mahal melalui asuransi dan KTKLN, pembiaran terhadap agensi-agensi nakal tanpa ada sanksi, kesemuanya adalah bentuk pelanggaran yang dilakukan oleh agensi, PPTKIS, majikan, serta pemerintah dan perwakilannya. Maka tidak ayal lagi jika BMI juga mendapatkan perlakuan buruk dan diskriminasi dari Pemerintah Taiwan.

Kami selaku Buruh Migran Indonesia (BMI) mengajukan beberapa perubahan sistim tata kelola yang selama ini dirasa merugikan bagi BMI. Kami berharap dari pihak utusan Pemerintah Indonesia yang berada di Taiwan menyampaikan tuntutan dan keganjalan kami kepada Pemerintah Taiwan maupun Pemerintah kita sendiri di Indonesia.

Berdasarkan situasi objektif di atas, kami menuntut kepada perwakilan Pemerintah Indonesia di Taiwan untuk:

1. Hapuskan biaya penempatan yang terlalu tinggi (overcharging)
2. Berikan jaminan hari libur seminggu sekali bagi BMI
3. Berikan jaminan pemegangan dokumen (paspor, daftar gaji, ARC, Askes, dll) bagi BMI
4. Tindak tegas Agensi dan PJTKI yang melanggar hukum sesuai dengan sanksinya
5. Hapus terminal khusus TKI
6. Berikanlah perlindungan sejati bagi BMI
7. Hapus kewajiban KTKLN
8. Perjelas status prosedur penempatan dan perlindungan BMI ABK di luar negeri
9. Berikanlah kebebasan bersarikat bagi BMI
10. Berlakukan kontrak mandiri bagi BMI
11. Cabut UUPPTKILN 39/2004, bentuk undang-undang yang memangku kepentingan BMI
12. Berikanlah pelayanan bagi BMI Ilegal

-Salam Juang

Ketua ATKI Taiwan Atin Safitri

附錄五：ATKI Taiwan 文告 印尼語版



ASOS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DI TAIWAN (ATKI-TAIWAN)

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 , 台灣印尼勞工協會

“Hapus Semua Persyaratan yang Mempersulit Kontrak Mandiri”

“Realisasikan Kenaikan Gaji Untuk Semua PRT Sekarang Juga”

Berita kenaikan gaji yang disampaikan oleh Jumhur Hidayat Kepala BNP2TKI melalui berita Tribunnews (Rabu, 9 Januari 2013 jam 14:48 WIB), belum menjadi kenaikan gaji resmi di Taiwan. Hal ini sesuai dengan berita yang disampaikan Taiwan News (23 April 2013, 05:32 sore).

Isu kenaikan gaji yang dinyatakan Jumhur Hidayat berasal dari hasil pembicaraan KDEI dengan TETO pada bulan Agustus di Bali, serta pertemuan Jumhur Hidayat dengan KDEI pada tanggal 14 Desember 2012 di Taipei. Adapun hasil pembicaraan tersebut antara lain: Gaji PRT Re-Entry naik menjadi NTD 18,780 yang di tuangkan dalam perjanjian kerja, membuat Technical Arrangement untuk ABK dan penandatanganan, pemotongan gaji untuk biaya makan dihapuskan, verifikasi terhadap document penempatan harus dilakukan oleh unit kerja yang bertanggungjawab di bidang ketenagakerjaan, rekomendasi *Job Order* dari BNP2TKI akan dilaku secara selektif untuk kerja sektor konstruksi.

Namun sampai sekarang kesepakatan ini belum ada yang dijalankan. Pembicaraan kenaikan ini baru akan dibicarakan secara resmi antara pemerintah Taiwan dan Indonesia bulan Juni 2013. Pernyataan bohong dari Jumhur Hidayat ini, semakin mengukuhkan bahwa pemerintah kita tidak sungguh-sungguh dalam melindungi BMI di luar negeri dan bentuk politik pencitraan pemerintah SBY – Boediono, yang ingin mendapat pujian dari masyarakat luas.

Ironisnya yang akan dibicarakan hanya gaji bagi pekerja yang memperpanjang kontrak secara mandiri (direct hiring). Sementara yang menggunakan agensi/PJTKI tidak bisa menikmati kenaikan gaji ini. Ide sepihak dari pemerintah Indonesia melalui KDEI dan BNP2TKI ini sangat meresahkan. Bagaimana tidak untuk meyakinkan kenaikan gaji BMI harus diskusi dengan majikan, kemudian harus mengadakan wawancara/interview dengan KDEI untuk pengurusan kontrak mandiri, hal ini bertujuan untuk meyakinkan kepengurusan tidak melalui agen.

ATKI Taiwan menolak persyaratan interview (dikeluarkan Maret 2013) oleh KDEI. Persyaratan Interview akan semakin mempersulit pengurusan kontrak mandiri. Sudah tentu majikan pasti akan memilih pekerja baru, daripada harus memperpanjang kontrak kerjanya. Selain harus menambah gaji menjadi 19,047NTD, juga harus datang ke KDEI untuk wawancara (interview). Para majikan pasti tidak mau direpotkan dengan mendatangi KDEI, apalagi mereka harus meninggalkan pekerjaannya yang belum tentu semua majikan bisa mengambil cuti. Alhasil, BMI harus menanggung beban peraturan baru ini. BMI harus pulang ke tanah air karena majikan tidak mau mempekerjakan lagi dan harus mulai proses dari awal, dengan membayar 9 bulan potongan gaji.

Saat ini jumlah Buruh migran terbesar berasal dari Indonesia berjumlah 188,00 BMI (sektor formal & informal). Meliputi, Pabrik, Pekerja Rumah Tangga (PRT) dan Anak Buah Kapal (ABK) dengan jumlah terbesar Pekerja Rumah Tangga (PRT). Dari semua total buruh migran, sekitar 38,585 melakukan kontrak mandiri.

Namun, besarnya jumlah pengiriman BMI tidak dibarengi dengan perlindungan. Sampai saat ini, berbagai macam bentuk penindasan dan penghisapan dialami oleh BMI di Taiwan. Akar dari berbagai permasalahan ini berasal dari UUPPTKILN No.39/2004. Dimana undang – undang ini hanya mengatur penempatan yang dilimpahkan sepenuhnya kepada PJTKI/Agensi dimana notabene pembisnis yang hanya ingin mendapatkan profit/keuntungan.

Sehingga berbagai permasalahan dihadapi BMI baik dari keberangkatan, penempatan hingga pemulangan. Berbagai permasalahan yang dihadapi BMI diantaranya: gaji rendah, tidak ada libur mingguan dan Nasional, tidak mendapatkan cuti tahunan, cuti sakit, tidak diperkenankan hamil dan melahirkan, tidak mendapatkan upah lembur, jam kerja panjang, akomodasi yang tidak manusiawi, pemotongan gaji yang tinggi (overcharging), tidak ada transportasi ke daerah asal BMI, penahanan dokumen

(Kontrak kerja, paspor, daftar gaji, ARC, Askes, akte kelahiran, surat nikah, KK, sertifikat dll), tidak diberi uang pesangon, tidak diperbolehkan menggunakan alat komunikasi (HP dan Telepon Rumah), tidak ada kebebasan berserikat/berorganisasi), terminal khusus, penampungan seperti dipenjara, dll.

Krisis global yang di alami oleh negara-negara maju terutama Amerika Serikat semakin menambah berat beban hidup kami. Harga-harga kebutuhan pokok baik di Taiwan maupun di Indonesia semakin melambung tinggi sementara upah kami tidak mengalami kenaikan yang memadai. Melalui berbagai cara Pemerintah Taiwan terus mempertahankan agar upah kami tetap murah dan mengeluarkan pekerja informal (PRT) dari upah minimum pada tahun 2007. Hingga kini kami hanya di upah pokok sebesar **NTD 15.840**

Kami sudah tidak mau lagi dijadikan sapi perahan dan barang dagangan, kami menuntut ke Pemerintah Indonesia untuk segera membuat perjanjian dengan pemerintah Taiwan (MoA). Didalam MoA tersebut harus mencakup adanya kontrak kerja standar, dimana semua hak dasar BMI harus dipenuhi. Pemotongan gaji selangit (overcharging) harus segera dihapuskan. Kontrak mandiri dengan syarat yang mudah dan training harus diberikan secara gratis oleh negara disetiap daerah asal BMI. Sehingga kami tidak harus menanggung biaya penempatan selangit.

Lebih dari itu pemerintah harus memberi sanksi pidana terhadap PJTKI/Agen dan pihak yang telah menindas hak BMI dan keluarganya. Pemerintah harus menyediakan mekanisme penuntutan bagi BMI dan keluarganya, jika terjadi perselisihan antara PJTKI/Agen/Lembaga Pemerintah/perseorangan dengan BMI.

Untuk ini kami menuntut pemerintah Indonesia, untuk segera merealisasikan:

1. Hapus segala isi revisi UUPPTKILN No.39/2004 yang tidak berpihak kepada BMI!
2. Berlakukan Kontrak Mandiri, Berikan Perlindungan Sejati Bagi BMI!
3. Hapus Overcharging!
4. Hapus Mandatori Asuransi dan KTKLN!
5. Ciptakan MoA yang berpihak kepada BMI dengan Pemerintah Taiwan!
6. Ciptakan Kontrak Kerja Standar yang Melindungi BMI!
7. Hapus Terminal Khusus TKI!
8. Ciptakan Lapangan Kerja di Tanah Air.

Tuntutan kami untuk Pemerintah Taiwan:

1. Masukkan kerja PRT dalam UUPTK Taiwan (Taiwan Labor Standard Law)!
2. Naikan Upah sektor PRT menjadi **NT\$19.047**, Sekarang Juga!
3. Berlakukan Kontrak Kerja Standar yang Melindungi Pekerja!
4. Berikan Hak Libur Buruh Migran di Taiwan!
5. Berikan Kebebasan Berserikat Bagi Semua Buruh Migran!

Taiwan, 26 April 2013

Asosiasi Tenaga Kerja Indonesia Taiwan (ATKI Taiwan)

Koordinator

Atin Safitri: 0973213624/ 0988887476

附錄六：ATKI Taiwan 文告 印尼語版



ASOS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DI TAIWAN (ATKI-TAIWAN)

“Menyikapi Berita Atas Dukong Jumhur Hidayat Konvensi Capres, di Kaitkan Dukungan 10.000 TKI Taiwan & Pembinaan Penempatan TKI ke Taiwan”

Menyikapi pemberitaan beberapa media terkait adanya dukungan TKI Taiwan terhadap Jumhur Hidayat selaku kepala BNP2TKI maju ke konvensi Capres 2014 yang akan di gelar dua bulan ke depan, apalagi di dalam berita tersebut mengaku berjumlah 10.000 orang TKI Taiwan, maka kami dari ATKI Taiwan memohon kepada media yang memberitakan tersebut untuk mengklarifikasi kebenaran berita tersebut. Catatan ATKI Taiwan pada tanggal 16 juni 2013 rapat akbar yang di beritakan adalah hanya panggung hiburan Nada dan Dakwah yang hanya di hadiri oleh sekitar beratusan orang saja mayoritas adalah TKI Taiwan.

Pada dasarnya ATKI tidak keberatan dengan berita tersebut apabila pemberitaanya itu benar dan tidak membohongi publik apalagi mengatas namakan TKI Taiwan yang jumlahnya puluhan ribu.

Selain itu ATKI juga menilai bahwa berita tersebut sangat jauh dari kenyataan yang ada, selain dukungan konvensi terhadap Jumhur Hidayat ataupun kesuksesan kesuksesan program Jumhur hidayat seperti program online demi meminimalisasi dokumen palsu dan human trafficking, padahal ATKI menilai sistem online tidaklah berpengaruh sama sekali dengan human trafficking.

Online ataupun offline tetap saja calo broker atau sponsor PPTKIS bergentayangan ke daerah mencari CTKI dengan segala cara termasuk memalsukan document dan memasukan CTKI ke perangkapnya dengan dalih training, (padahal itu di kurung).

Janji Manis Tanpa Ada Bukti

Terkait asuransi TKI, ATKI menilai kinerja-kinerjanya dari staf asuransi, bagaimana susahnya TKI mengklaim asuransi apabila mengalami musibah. Kalaupun

pengklaiman meminta bantuan ke BNP2TKI, entah itu dalam pelaporan langsung ataupun melalui media call center, tetap saja klaim asuransi berbelit- belit dan susah mencairkannya, jika asuransi tersebut cair tidak sesuai dengan pertanggung jawaban dari jenis resiko yang di jamin oleh asuransi TKI.

Terkait dengan perpanjangan pasport tanpa biaya ,gratis darimana?? Silahkan cek di lapangan berapa biaya yang di tanggung BMI Taiwan dalam memperpanjang pasport,yang resmi saja tarif yang dibebankan oleh BMI yang perpanjang sesuai ketentuan KDEI Bagian Imigrasi disebutkan untuk foto biometric Nt.200 dan di tambah biaya ganti buku Nt.250, itupun jika TKI datang sendiri ke KDEI tanpa agensi, di sisi lain jika TKI membuat paspornya melalui agensi biayanya mencekik leher daerah Taipei Nt.3000 sampai Nt.5000, belum lagi daerah pinggiran Taiwan Nt.5000 sampai Nt.10.000 per orang.

Apakah itu yang di namakan gratis,,,?? (*kami berharap dengan kenyataan gratis,,,!!!*)

Biaya Penempatan TKI Tujuan Taiwan :

Yang mana biaya penempatan sampai saat ini masih mencekik leher BMI, CTKI harus menanggung beban biaya penempatan setinggi langit, dengan potongan gaji perbulannya selama 9 bulan bagian sektor Informal (PRT), dan di bayar secara tunai 38juta sampai 60juta untuk bagian Formal (Pabrik) di tentukan oleh PJTKI di Indonesia.

Kami BMI di Taiwan sudah berupaya untuk melakukan dengan banyak macam cara kepada pemerintah Indonesia supaya biaya penempatan TKI tujuan Taiwan harus di turunkan dan di sosialisasikan maksimal 1bulan gaji.Namun kita menemui jawaban yang sama (*akan kita tindak lanjuti dan akan saya revisi biaya penempatan TKI tujuan Taiwan*) ***Apakah kita di suruh makan janji-janji tiada bukti,,??***

Re-Entry Hiring / tentang kenaikan gaji PRT :

Isu kenaikan gaji yang dinyatakan Jumhur Hidayat berasal dari hasil pembicaraan KDEI dengan TETO pada bulan Agustus di Bali, serta pertemuan Jumhur Hidayat dengan KDEI pada tanggal 14 Desember 2012 di Taipei. Adapun hasil pembicaraan tersebut antara lain: Gaji PRT Re-Entry dari NTD.15.840 naik menjadi NTD 18,780 yang di tuangkan dalam perjanjian kerja, membuat Technical Arrangement untuk ABK dan penandatanganan, pemotongan gaji untuk biaya makan dihapuskan, verifikasi terhadap document penempatan harus dilakukan oleh unit kerja yang bertanggungjawab di bidang ketenagakerjaan, rekomendasi *Job Order* dari BNP2TKI

akan dilaku secara selektif untuk kerja sektor konstruksi.

Ironisnya yang akan dibicarakan hanya gaji bagi pekerja yang memperpanjang kontrak secara kontrak mandiri (direct hiring). Sementara yang menggunakan agensi/PJTKI tidak bisa menikmati kenaikan gaji ini. Ide sepihak dari pemerintah Indonesia melalui KDEI dan BNP2TKI ini sangat meresahkan. Bagaimana tidak untuk meyakinkan kenaikan gaji BMI harus diskusi dengan majikan, kemudian harus mengadakan wawancara/interview dengan KDEI untuk pengurusan kontrak mandiri, hal ini bertujuan untuk meyakinkan kepengurusan tidak melalui agen, itu semua hanya harapan kosong saja.

Intinya adalah, bahwasanya semua yang ada dalam pemberitaan tersebut adalah bentuk kebohongan publik atas nama TKI Taiwan untuk kepentingan politik. Jadi ATKI Taiwan memohon dengan tegas terhadap media yang memberitakan tersebut untuk mengklarifikasi kebenaran dari rilis berita tersebut.,!

附錄七：ATKI Taiwan 文告 印尼語版



Penyata Sikap ATKI Taiwan

Tolak Potongan Uang Makan dan akomodasi bagi PRT NT\$.2.500

Ciptakan Undang-Undang Pokok Pekerja (UUTKP) di Taiwan Yang Melindungi Bagi Buruh Migran di Sektor Informal (PRT)

Menyikapi pemberitaan yang kini sangat memanas bagi buruh migran di Taiwan, yang terkait tentang Pemerintah meentukan Rancangan Undang-Undang Perlindungan Pembantu Rumah Tangga (UUPPRT atau draf of Domestic Workers Protection Act) Taiwan, Pemerintah Taiwan akan menggodok UU untuk sektor Informal (PRT).

Kami sebagai buruh migran di Taiwan sangat gembira atas munculnya berita ini, artinya Pemerintah Taiwan sudah mulai tanggap apa yang selama ini kami perjuangkan.

Karena selama ini yang kami tunggu-tunggu, supaya pekerja informal (PRT) mempunyai payung buat pelindungnya. Di dalam Undang-Undang tersebut akan di tuangkan untuk mengatur atas hak-hak buruh migran seperti halnya :

- Kenaikan upah minimum
- TKI wajib libur seminggu sekali
- Istirahat tidak kurang 8 jam
- Cuti tahunan
- Cuti pernikahan dan cuti berduka

Pada dasarnya kami sangat menghargai atas berita ini, akan tetapi kami juga mempertimbangkan kebijakan yang nantinya terdampak buruk bagi buruh migran, karena selama ini buruh migran di jadikan obyeknya saja, tinggal menerima keputusan dari pemerintah tersebut. Kami juga mendapati RUU PPRT dari kementerian tenaga kerja (MOL) tidak memberi perlindungan yang sejati dan tidak adil bagi para PRT migran dengan membentuk upah sebenar rendah dari gaji minimum dengan mengizinkan kerja 16jam tanpa bayar lembur, dan masih di bebani potongan uang makan dan akomodasi perbulannya NT\$.2.500.

Berita di Taiwan kemarin (17/6) menyatakan bawasannya kenaikan gaji PRT migran; gaji minimum sangat beda dengan naik gaji, sebaliknya adalah hak asasi yang wajib memberi gaji kepada pekerja. Malah kami perlu memperhatikan upah PRT migran ditahan Nt.15.840 selama kurun waktu 17 tahun, Tidak mempunyai hak hak pekerja setara seperti di sektor lain. khususnya gaji minimum, hari libur, batasan waktu kerja dll. Hingga kini kami hanya di upah pokok sebesar **Nt.15.840**, dengan potongan selama 9 bulan dan di tambah potongan-potongan lainnya yang di bebaskan kepada kami, belum lagi di tambah pengeluaran pribadi. Jumlah yang tidak seberapa jika di ukur dengan melambungnya kebutuhan pokok, sampai saat kami terjerumus ke perbudakkan hutang yang harus kami bayar, dan menerima sisa gaji yang tidak memadai.

Konsep gaji minimum adalah gaji sebenarnya yang diberikan dengan wajib mendapat hak-hak seperti makanan, tempat tinggal dan perlindungan tanpa di potongan apapun. Kenaikan gaji bagi pekerja PRT dari **Nt.15.840** menjadi **Nt.19.273** itu sudah menjadi hal yang wajar, dan sudah menjadi hak pekerja di sektor informal yang sampai saat ini di nanti-nanti. Namun dalam peraturan tersebut ada yang menjadi keganjalan bagi kami tentang "pekerja di kenakan potongan uang makan dan akomodasi sebesar " **Nt.2.500** ". Selain itu, kebanyakan PRT migran tidak dapat makan yang layak di rumah majikan terpaksa membeli makanan sendiri. Harusnya Pemerintah Taiwan mempertimbangkan lagi dan memikir dampaknya terhadap buruh migran jika rancangan undang-undang ini di sahkan. Yang pastinya menambah beban buruh migran yang semakin berat, resah dan kecewa. Hal ini kami sebagai buruh migran sangat keberatan dan kami untuk menolaknya, tentunya para majikan akan pasti memotong uang makan dengan potongan gaji setiap bulannya. Hal ini bisa kami katakan memberikan gaji minimum,,? atau naik gaji cuman bohongan,,? Karena tidak ada bedanya, malah membuat beban .

PRT Migran Bukanlah Robot, bukan saja butuh waktu tidur/istirahat, kami juga butuh refreshing, liburan sekedar memulihkan kesegaran untuk melanjutkan kerja kembali biar tetap segar/fit. dibebaskan waktu harus kerja untuk membangun diri pribadi. Selain itu, buruh migran di Taiwan telah banyak membantu pembangunan ekonomi Taiwan dengan melaku pembelanjaan kebutuhan pokok pribadi seperti : makanan, baju, pulsa, internet, barang-barang harian dan sebagainya. Kami juga menanggung inflasi, kenaikan harga barang-barang seperti orang lokal. Selain itu kenaikan harga barang-barang di Indonesia juga menambah beban dari kebutuhan hidup tidak layak.

Dengan semua ini upah yang sebenarnya dari PRT migran masih rendah, dari gaji minimum dan RUU PPRT tidak diberikan perlindungan dan hak gaji minimum dengan potongan uang makan yang harus bekerja 16 jam tanpa lembur dalam RUU tersebut. Kami juga mendapatkan RUUPPRT dari kementerian ketenagakerja dibentuk selama tiga tahun . Namun masih ditahan di Eksekutif Yuan, artinya kenaikan gaji dan lain lainnya belum menjadi pembahasan MOL kepada media dengan kenaikan gaji PRT migran . Kini telah mengakibatkan kesalah pahaman antara orang Taiwan dan para buruh migran . Seharusnya Pemerintah Taiwan membentuk mekanisme yang mengurangi beban keluarga miskin dan kebutuhan PRT migran.

Pada tahun 2009 Negeri Taiwan telah meratifikasi Dua Kovenon Pokok, yaitu konvenan Hak-Hak Sipil dan Politik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dan kovenan Internasional Tentang Hak-Hak Ekonomi, Sosial dan Budaya(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 Pemerintah harus mengadopsi perjanjian ini ke dalam berbagai peraturan perundang-undangan termasuk RUUPPRT . Malah kami melihat RUUPPRT dari pihak MOL telah gagal berlaku pada dua konvensi yang telah diratifikasi dengan memberi hak hak asasi dan perlindungan kepada PRT migran.

Perhitungan Biaya Hidup PRT Migran di Taiwan

Gaji PRT Migran	15,840NTD
Biaya hidup bulanan	
1.Potongan Jasa agent di Taiwan (tahun pertama 1800, kedua 1700,ketiga 1500)	1500/bln
2.Potongan ChinaTrust bank	*9525 x 9bln
3. Pulsa	1000/bulan
4.Internet	1000/bulan
5.Astek	283/bulan
6.Keperluan Peribadi	1000/bulan
SISA GAJI	1200~2500
Menerima sisa gaji yang tidak memadai (*potongan China Trust lebih kurang 9525~8500NTD)	

Pekerja Rumah Tangga (PRT) sebagai tenaga kerja yang murah dan mudah di eksploitasi

Sampai saat ini, berbagai macam bentuk penindasan dan bentuk penghisapan yang dialami oleh BMI di Taiwan, hal ini terjadi karena berbagai kebijakan atau undang-undang yang diberikan untuk mengatur pengiriman dan penempatan terhadap buruh migran tidak pernah berorientasi kepada kesejahteraan dan keadilan yang dibutuhkan oleh buruh migran Indonesia itu sendiri. Harga-harga kebutuhan pokok baik di Taiwan maupun di Indonesia semakin melambung tinggi sementara upah BMI tidak mengalami kenaikan yang memadai. Melalui berbagai cara Pemerintah Taiwan terus mempertahankan agar upah BMI tetap murah dan mengeluarkan pekerja informal (PRT) dari upah minimum pada tahun 2007, sampai saat ini masih di luar UUTKP.

Layaknya sapi perahan yang diperas tenaganya, kami adalah buruh migran dari Indonesia yang tersingkir dari tanah air sendiri, karena dengan terbatasnya pekerjaan dan meningkatnya pengangguran dan maraknya kemiskinan, di jual melalui devisa dan diperas melalui macam-macam peraturan yang merampas upah dan merendahkan buruh migran di sektor informal, layaknya barang dagangan dan sapi perahan. Lebih dari itu kami juga di perlakukan layaknya budak kasar dengan kerja tiada batas waktu dengan gaji yang rendah.

Menjadi buruh migrant bukan sebuah keinginan tapi keterpaksaan. Akan tetapi pemerintah justru memanfaatkan keterpaksaan kami untuk menindas berlipat ganda dan menciptakan sebagai buruh migrant yang menerima apa adanya, dan di butakan dengan hak- haknya. Jika kami miskin, pengangguran, dan berpendidikan rendah, bukankah itu kegagalan dari pemerintah sendiri, untuk melindungi rakyatnya,?

Kontrak Standart

Kontrak kerja yang BMI inginkan adalah kontrak kerja standar, dimana ada pengajuan yang setara atas hak dan kewajiban dari majikan dan pekerja. Didalam kontrak kerja BMI harus mendapatkan gaji sesuai dengan upah minimum negara penempatan (tanpa potongan), hak libur mingguan dan hari besar nasional, hak cuti tahunan, hak cuti hamil dan melahirkan, hak cuti sakit dan haid, hak kebasan berserikat, hak mendapatkan akomodasi yang layak (termasuk tiket, uang makan, uang saku perjalanan, tempat tinggal dll), jam kerja, hak pemutusan kontrak kerja secara sepihak serta mekanismenya, didalam kontrak kerja harus diterangkan secara detail jenis pekerjaan. Didalam kontrak kerja harus mencantumkan mekanisme penuntutan jika terjadi pelanggaran kontrak kerja dan peraturan.

Kami terus akan memperjuangkan dan turut memantau peraturan-peraturan dari

Pemerintah yang merugikan bagi buruh migran di Taiwan.

Berdasarkan situasi objektif di atas, kami buruh migran di Taiwan menyampaikan tuntutan dan keganjalan kepada Pemerintah Taiwan dalam hal :

- Ciptakan UUTKP yang memihak perlindungan Buruh Migran
- Berikanlah Hak Upah Minimum
- Batalkan potongan uang makan dan akomodasi bagi sektor informal dan formal
- Berikan hari libur pasti seminggu sekali
- Turunkan biaya Penempatan
- Kurangkan biaya jasa agen
- Menciptakan mekanisme membantu Keluarga Miskin yang ambil PRT migran
- Berlakulah Standar Kontrak sesuai dengan Konvensi PBB Tahun 1990 tentang Perlindungan Buruh Migran dan Keluarganya dan konvensi ILO 189.

Kami Buruh Migran adalah manusia, bukan hewan perahan,,,,!!

附錄八：ATKI Taiwan 文告 印尼語版



BMI Taiwan Bersatu dan Berjuang Menuntut Perlindungan Sejati dan Kesejahteraan !!!

***Kami Adalah Pekerja, Kami Bukan Budak,
Buruh Migran Bukan Komoditi/Barang Dagangan***

Kami adalah Buruh migran yang bekerja di Taiwan. Kami bersama buruh migran diseluruh dunia bersama-sama memperjuangkan hak-hak kami dan melawan dominasi pemilik modal (penjajahan gaya baru)

Indonesia adalah Negara yang kaya raya dengan sumber daya alam dan sumber daya manusia, akan tetapi kekayaan tersebut dirampok oleh penjajah asing (Imperialisme) melalui pemerintah dalam negeri sebagai kaki tangannya. Agar terhindar dari kehancurannya karena krisis saat ini mereka semakin mengintensifkan penindasan dan penghisapannya terhadap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

Melalui skema penjajahan gaya baru mengakibatkan penghidupan rakyat semakin miskin dan sengsara. Dipedesaan anak-anak kaum tani dipaksa menjadi buruh migrant karena monopoli dan perampasan tanah yang semakin luas, mereka tidak mampu lagi membiayai hidupnya dan pendidikan yang semakin tinggi, di perkotaan sebagian besar harus bekerja menjadi buruh pabrik dengan tidak mendapatkan kepastian kerja karena sistem kerja kontrak/outsourcing. Para pengusaha lokal dan pedagang kecil semakin tidak mampu bersaing dengan pengusaha asing karena skema pasar bebas yang dijalankan oleh pemerintah.

Buruh Migran Bukan Komoditi/Barang Dagangan

Melalui UU No 39/2004 Buruh Migran telah dijadikan komoditi atau barang dagangan yang bisa menghasilkan keuntungan negara dengan cara diexport keluar negeri mereka di tindas dan di peras tenaganya melalui berbagai peraturan diantaranya adalah peraturan satu jalur pintu dan dipugut biaya penempatan (Overcharging) serta kewajiban membayar asuransi

melalui KTKLN. Sampai saat ini BMI tidak diberi perlindungan serta dijadikan ajang pemerasan atau barang dagangan, terutama perempuan yang harus bekerja menjadi PRT, mereka diesploitasikan dalam kerja tidak ada batas waktu, tidak ada libur, diperbudakkan dan harus menghadapi risiko pelecehan seksual yang selalu mengancam setiap saat, banyak diantara buruh migran di Taiwan yang mengalami gangguan psikis atau penyakit depresi dan membutuhkan perawatan, namun mereka terpaksa harus menjadi buruh migran di Taiwan hari ini.

Mayoritas BMI adalah tulang punggung keluarga dan masyarakat, akan tetapi sebagai Warga negara Indonesia mereka tidak pernah mendapat perlindungan dari Pemerintah Indonesia maupun Pemerintah Taiwan, mereka di eksploitasi di berbagai sektor jenis pekerjaan, tanpa ada jaminan keselamatan dan hak-hak dasarnya.

Perempuan sebagai tenaga kerja yang murah dan mudah di eksploitasi

Krisis ekonomi yang semakin tajam dan berskala internasional semakin menambah berat beban hidup BMI. Harga-harga kebutuhan pokok baik di Taiwan maupun di Indonesia semakin melambung tinggi sementara upah BMI tidak mengalami kenaikan yang memadai. Melalui berbagai cara Pemerintah Taiwan terus mempertahankan agar upah BMI tetap murah dan mengeluarkan pekerja informal (PRT) dari upah minimum pada tahun 2007.

Hingga hari ini BMI hanya di upah pokok sebesar **NT 15.840**, dengan potongan selama 9 bulan dan di tambah potongan-potongan lainnya yang di bebankan kepada kami. Jumlah yang tidak seberapa jika di ukur dengan melambungnya kebutuhan pokok, Selain itu BMI dipaksa bekerja dengan kondisi yang tidak manusiawi. hingga saat ini BMI tidak diperbolehkan melakukan kontrak mandiri, hal ini bertujuan untuk menjadi alat pencetak uang (potongan agen dengan bunga selangit). Tidak hanya itu, agensi dan PJTKI dengan mudah merayu majikan untuk memecat pekerjanya, sehingga BMI harus membayar potongan agen yang semakin tinggi, terjebak dalam perbudakkan hutang.

Pelepasan tanggungjawab oleh pemerintah

BMI di Taiwan bekerja menjadi nelayan yang seharian bekerja di laut, selama ini masih mengacu pada regulasi pekerjaan di sektor industri atau formal, sektor formal di ketahui telah memiliki undang-undang dan peraturan yang jelas sebagai mana tertera dalam surat perjanjian kerja. Perjuangan BMI Nelayan telah di rintis sejak lama akan tetapi tidak ada penyelesaiannya yang sesuai dengan harapan. Berbagai keluhan muncul hak-hak yang terkait dokumen seperti : ARC, Askes, Surat perjanjian kerja, daftar gaji, pasport, kerja yang panjang tanpa ada batas waktu, tidak ada hari libur, potongan uang makan faktanya BMI Nelayan itu makan dan tempat tinggalnya adalah potongan gaji yang tidak adil, hal ini di alami oleh BMI

Nelayan di Taiwan.

Pemerintah melepaskan tanggungjawab dengan tidak memberikan perlindungan sejati pada warga Negeranya yang bekerja di luar negeri. buruh migran dimanfaatkan sumber tenaga kerja murah, kontrakan dan sementara (tidak ada hak menetap). Sebaliknya peluang pekerjaan diperjual belikan oleh PJTKI atau agency maupun Negara yang bisa mendapat keuntungan tanpa memberikan perlindungan terhadap BMI itu sendiri.

International Migran Day – Hari perjuangan Buruh Migran

Tanggal 18 Desember adalah hari migran sedunia (International Migrant Day) Selama ini telah diperingati dengan khidmat oleh rakyat di berbagai negeri, sebagai hari untuk mengenang jutaan pekerja migran yang telah berjuang untuk kehidupan yang lebih baik. Kami Sebagai organisasi Buruh Migran sejati yang memperjuangkan dan mempertahankan hak-hak kaum pekerja dari bangsa manapun turut berjuang untuk melawan penindasan.

Kami BMI tetap semangat dalam garis perjuangan, bawasannya kami tidak sendirian, kami telah bersatu kepalkan tangan dengan erat, bekerja sama dengan organisasi buruh dari kalangan, kaum laki-laki, perempuan, tua, muda dan mahasiswa, dan juga kaum professional di Taiwan, kami sangat bersyukur di beri dukungan untuk mengadakan aksi buruh migran di Taiwan hari ini untuk melawan dari segala bentuk penindasan dan perbudakan,,!!!

Kami selaku Buruh Migran Indonesia (BMI) mengajukan beberapa tuntutan untuk perubahan sistim tata kelola yang selama ini telah merugikan bagi BMI. Kami berharap dari pihak Pemerintah Indonesia yang berada di Taiwan (KDEI) dan Pemerintah Taiwan untuk membuat kebijakan dalam perlindungan sebagai berikut :

Tuntutan Kepada Pemerintah Indonesia dan Pemerintah Taiwan :

1. Hapuskan Overcharging (biaya penempatan);
2. Berlakukan Direct Hiring Dengan Syarat Yang Mudah untuk sektor formal;
3. Hapus mandatory Asuransi dan KTKLN;
4. Hapus Penahanan Dokumen oleh agensi dan PJTKI/PPTKIS;
5. Berlakukan Standar Kontrak sesuai dengan Konvensi PBB Tahun 1990 tentang Perlindungan Buruh Migran dan Keluarganya dan konvensi ILO 189;
6. Hapus Biaya Makan & Akomodasi Bagi ABK untuk keseluruhannya;
7. Hapus servis agensi tiap bulannya;
8. Masukan ABK/sector pelaut kedalam UU Perlindungan BMI;
9. Berikan hari Libur tetap Kepada semua buruh Migran di Taiwan;
10. Hapus Diskriminasi Terhadap Buruh Migran ;

11. Masukkan semua sektor Buruh Migran kedalam Upah Minimum Standar Taiwan;
12. Naikan Gaji Buruh Migran Bagi PRT;
13. Berlakukan kontrak mandiri;
14. Masukkan kerja PRT dalam UUTKP Taiwan, (Taiwan Labor Standard Law);
15. Berlakukan Kontrak Kerja Standar yang Melindungi Pekerja;
16. Berikan Kebebasan Berserikat Bagi Semua Buruh Migran.

Demikian rilis pernyataan sikap ini kami buat dan sampaikan dalam rangka memperingati hari Migrant Sedunia yang jatuh pada tanggal 18 Desember 2013.

Taiwan, 15 Desember 2013,

Hormat Kami;

Asos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di Taiwan /(ATKI-Taiwan)

附錄九：駐台北印尼辦事處公告

